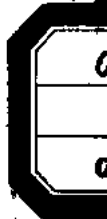




斯格恩·思克馬 國中論

社 放 解



●	01:3
●	07:98

基本定價 (甲) 7.80

斯格恩·思克馬
國中論

社 放 解

4522

出版編號 0368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

著者 馬克思 恩格斯

出版者 解放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〇年三月初版

根據一九三八年解放社版本重印

1—20,000(京)

譯者的話

『馬克思與恩格斯論中國』一書，是由這兩位人類偉大思想家關於中國的專門論文及其他著作中關涉到古代東方與中國的片段摘錄所彙集而成的。第一章和第三章都是片段摘錄，這些摘錄大半是從下列幾種書籍中摘出來的：（一）『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聯共黨出版局俄文版；（二）馬克思著：『資本論』，聯共黨出版局一九三六年俄文版；（三）馬克思著：『剩餘價值學說史』，聯共黨出版局一九三六年俄文版；（四）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聯共黨出版局一九三五年版；（五）『馬克思與恩格斯文庫』，俄文版。本書第二章乃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和『潑萊塞報』上所發表的關於中國的論文，

都是由俄文版『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十一卷（第一冊與第二冊）以及第十二卷（第二冊）上所編入的譯文譯成中文的。書中『編輯部註』，乃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編輯部在俄文版原書上所加的附註。當我們從事翻譯這本書的時候，因為缺乏中文參考書，無法找到書中所引證的一切文件原文，所以有幾條引證，只得譯出大意。這是本書很大的一個缺陷。我們希望重版時能夠找到這些引證的原文，以補上這個缺陷。

譯者 一九三七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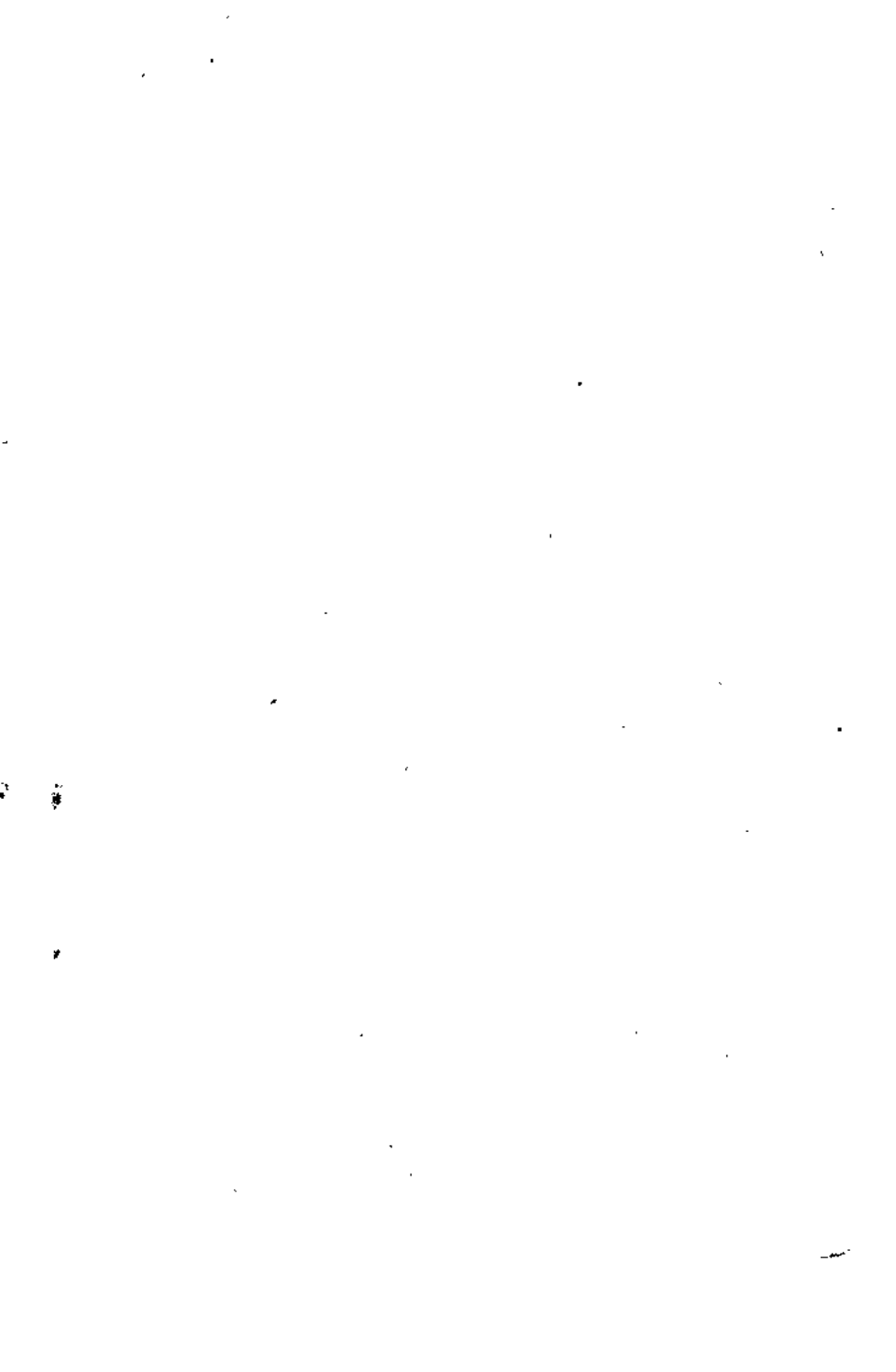
目 錄

第一篇 古代東方的特點與中國	一—六
『生產力。村社』	三
『國家。土地所有權底形式。地租』	三
『商業。高利貸。貨幣』	三
第二篇 關於中國的論文	一—六
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	六
國會關於對華軍事行動的討論	三
中英衝突	六
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	六

英人對華的新侵略	三
波斯與中國	九
鴉片貿易(第一篇)	九
鴉片貿易(第二篇)	九
中英條約(第一篇)	一〇
中英條約(第二篇)	一〇
俄國在遠東之成功	一三
新的對華戰爭(第一篇)	一三
新的對華戰爭(第二篇)	一六
新的對華戰爭(第三篇)	一七
新的對華戰爭(第四篇)	一五
對華貿易	一六
中國事件	一七
第二篇 世界商業與對華政策	一七——三三

歐洲人之「發現」中國	一九
『對華商業』	二八
『列強與太平革命』	三三
『俄國與中國』	三七

第一篇 古代東方的特點與中國



『生產力。村社』

資本主義以前的、民族的生產方法，其內部的穩固和結構，使商業所具有的破壞力受到阻礙，這種阻礙在英國人同印度及中國的來往關係上表現得十分明顯。在中國和印度，生產方法的廣大基礎就是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成一體，而且在印度還有那種建立在土地村有制上面的農村公社底形式，這種形式過去在中國也是一種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國人以統治者和地租佔有者底資格，立刻就使用了自己直接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勢力，以破壞這些小規模經濟的村社。在這裏，他們以廉價商品來消滅紡紗業和織布業，消滅這種工農業生產合一所形成的歷來就有的組成部分，並這樣來破壞農村公社；只是在這個意思上講來，他們的商業

對於生產方法才有革命化的影響。可是，就在這裏，他們的這種破壞影響也只是很慢才得到成效。他們這種破壞影響在中國所得的成效更少，因為中國本國的政權不來幫忙。在中國農業與手工工場業直接結合，這就大大節省錢財又節省時間，因此就給大工業生產產品以最頑強的抵抗，因為大工業生產產品的價格是包含着這些生產品的流通過程中處處所耗去的不生產的費用。俄國的商業與英國的商業相反，俄國的商業並不使亞洲生產的經濟基礎發生變動。○（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一部，二九九頁）

在從前的時候，中國舊式犁頭……像豬仔或田鼠一樣，只掘開泥土，但沒有作田溝，且沒有將泥土翻轉。（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一四五頁上的註解）

- 後來俄國力謀發展本國資本主義的生產，這種生產專指導於國內市場和邊境上的亞洲市場，自從那時候起，這種情形也就開始改變了。

——恩格斯註

原料漲價當然就推動人們去利用廢物。

一般說來，這種利用廢物的條件如下：（一）大批排泄物之積累，這種積累，只有在大规模組織生產的條件下才有可能；（二）機器底改良，由於機器底改良，從前沒有用處的東西，現在改變形式，可以應用於新生產中；（三）科學底成績，尤其是化學底成績，化學發現這類廢物底效用。固然，以治園方法來耕種出地的小農業（例如在倫巴底、中國南方及日本就是如此），也達到這一類的很大的經濟化。然而，一般說來，在這種耕種制度之下，農業生產率的代價，就是腐害耗費人類的勞動力，使這些勞動力不能參加其他的生產部門。（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一部，九一百）

構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的，並不是土壤底絕對肥沃，而是土壤底級差及其自然生產品底種類不同；人經營經濟的自然條件底變更，就促進入自己的需求、才幹、勞動工具及勞動方法底增多。要共同控制某種自然力量以適合於經濟利益，要利用人工的建築物來大规模地利用自然力量或制止它的破壞作用，這種需

要在工業史上起着決定的作用。埃及^①、倫巴底、荷蘭等地的水利調節，或印度、波斯等地的水利調節可作實例，在這些地方，人工河道的灌溉不僅供給植物所需要的水分，而且從山上得到了污泥帶來的礦物肥料。西班牙和西西里，在阿剌伯人統治時代，其工業與旺底秘訣就在於人工河道之開鑿^②。（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四二八頁）

在造紙業上，一般地可以仔細認清以各種生產工具和資料為基礎的各種生產

- ① 因為需要推算尼羅河水漲落的時期，於是創立了埃及的天文學，同時也建立了僧侶們這種農業指導人等級底統治。『夏至時節就是一年之內尼羅河水開始氾濫的時節，埃及人曾應當特別注意觀察它……。他們很需要查明這個時節以調節農務，因此他們應當向天空尋找這個時節重透底痕徵。』（丘維爾著：『地球革命史』，一四一頁）——馬克思註
- ② 統治印度那些彼此不相聯系的小生產體系的国家政權，其物質基礎之一就是調節水利。統治印度的回教人比他們的繼承者——英國人更瞭解這一點。我們只要指出一八六六年的飢荒就夠了，在這次飢荒中，孟加拉省阿里斯府有一百萬以上的印度人餓死了。

——馬克思註

方法之間的區別，以及社會生產關係與各種生產方法之間的聯系：古代德國的造紙業是手工業底模範，十七世紀的荷蘭與十八世紀的法蘭西給予真正的手工工場業的模範，而現代的英國給予機器造紙業底模範，可是中國和印度，在造紙業上至今還存在着兩個不同的古代亞洲的形式。（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三〇九頁）

原始時代的工作人與生產工具和資料之一體（這裏姑且不講奴隸制度下的關係，在奴隸制度之下，工作人本身就是勞動底客觀條件之一）有兩個主要形式：亞洲的農村公社（原始共產主義）以及各式各樣的小規模的氏族的農業（家庭工業與此種農業相結合）。這兩個形式都是原始的形式，都同樣不能用來把勞動作為社會勞動來發展，且不能用來發展社會勞動的生產率。（馬克思著：『剩餘價值學說史』，俄文版第三卷，三〇八頁）

古代亞洲民族、埃及人和愛特魯人等等，建立了偉大的工程，這些偉大的工程表示簡單的合作就有極大的意義。『在古代，這些亞洲國家，除了支付民政費

和軍政費之外，有時還擁有一些剩餘的生活資料，它們可以把這些剩餘資料用來建築華麗的或有公益意義的大廈。因為全部非農民的勞動力差不多都在它們支配之下，又因為這些剩餘資料完全由帝王和僧侶支配，它們就有了人力和物力來在國內到處建造巨大的紀念碑……。建立巨大石像和搬運重大驚人的東西，差不多完全使用人工，最浪費不過地使用人工。只要有大批工人並把他們的力量集中起來，就足以做到這點。海底的大珊瑚礁就是逐漸升漲起來而構成海島、構成陸地的，雖然參加這個過程的各部分是極微小極薄弱的。亞洲君主國內的非農業工人，他們所能使用於工作上的，差不多只有個人的體力，可是人多則力大，因此統治這些羣衆的勢力，就能够開始建立上述那種偉大工程。當時只有把勞動者所賴以生存的收入集中於一人或少數人之手，這樣的工程才有可能。

亞洲帝王和埃及帝王或愛特魯僧侶等等底這種權力，在現代社會內已轉於資

本家之手，這種資本家，是個別的資本家還是合股的資本家，如股份公司那樣，這都沒有關係。（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二六八頁）

在實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社會內，社會分工的無政府狀態和手工工場分工的專制現象，彼此發生連帶關係，但比較早期的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各工業部門間的分工，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然後就完全固定起來，最後還用法律規定出來——一方面表明社會勞動底組織是有計劃的和有人主宰的，另一方面却完全沒有作坊以內的分工，或者呢，使這種分工在很小的範圍內發展着；或者只是部分地和偶然地發展着。（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二八九頁）

村社底結構，表現出有計劃的分工，可是像手工工場業那種分工是不可能有的，因為鐵匠、木匠等等所需要的市場仍舊沒有變更，至多也不過隨鄉村的大小為轉移，不止有一個鐵匠和缸匠等等，而是有兩個或三個。調節村社分工的定律，在這裏是和自然界底定律有同樣不可抗拒的勢力：每個單獨的工匠，例如鐵

匠等等，按照嚴格規定了的傳統方法執行他本行職業以內的一切工作手續，然而完全獨立執行，不承認作坊以內有任何權威能够牽制他。這些自給自足的村社經常以同一形式重新恢復起來，它們被破壞了，又在原處用原有名稱重新產生，它們的生產結構底簡單就足以解釋亞洲社會不變性底秘密。亞洲社會的不變性，與亞洲國家之經常被破壞而重新建立，與它們朝代之迅速更換，恰恰相反。這個社會基本經濟成份底結構，並不被政治範圍內所發生的風暴所驚動。（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二九〇頁）

……這些家庭式的村社建立在家庭工業底基礎上，同時，手工織布、手工紡紗、手工種田這三種東西以特殊的形式互相結合起來，而這種結合會使得這些村社具有自給自足的性質。英國人把紡紗匠安置在蘭加雪爾，把織布匠安置在孟加拉，換言之，就是把印度原有的紡紗匠和織布匠完全消滅，這種干涉行動就消滅了這些小規模的、半野蠻的、半文明的村社底經濟基礎而破壞了村社，這樣就實行了亞洲所從未經過的一次最大的，而且的確可說是唯一的社會方面的革命。

我們看見這些成千成萬的、勤懇的、宗法的、安分守己的社會集團被破壞和瓦解，心裏自然非常感動；看見他們沉淪苦海，其中個別分子失去其古代的文明形式，又失去其歷來的生活來源，心裏多麼悲痛，——然而我們到底還是不應當忘記，這些閉關自守的村社，無論其怎樣純良，它們始終是東方專制政體底穩固基礎，它們使人的理智拘泥於最狹隘的範圍內，把理智變成迷信底馴服工具，使它服從傳統慣例，使它不發生什麼影響，使它不能努力於歷史上的活動。我們不應忘記野蠻人底自私自利，他們集中在極小的一塊土地上，安然觀看大帝國怎樣被破壞，難以形容的慘禍怎樣發生，大城市居民怎樣大批遭受屠殺——他們安然觀看這一切現象如同觀看自然界底現象一樣，並不加以多大注意，並且自己也成了一切侵略者底魚肉，祇要侵略者賜予光顧的話。（馬克思著：『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一八五三年六月十號。『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三五—頁）

無論什麼地方，從印度起到俄國止，凡是古代村社習俗還保全着的地方，這

種習俗便做了數千年來最橫暴的東方專制政體底基礎。只有在這種習俗崩壞了的地方，獨立的發展才有了進步，藉奴隸勞動來加強並發展生產，才是經濟生產道路上的第一步。恩格斯著：『反杜林』，『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一八三頁）

『國家。土地所有權底形式。地租』

現在理應發揮下列各點：（一）由封建土地所有制過渡到別一種的、爲資本主義生產所調節的、商業性質的地租制；（二）像美國這種國家裏，土地原先不是私有財產，並且至少是在形式上從最初起就是由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佔了統治地位，這種國家內的地租是怎樣發生的；（三）現在還繼續存在着的亞洲式的土地所有權形式。（馬克思著：『剩餘價值學說史』，俄文版第二卷，第一部，一三九頁）

要有土地所有權，就要有某些人的壟斷權：他們壟斷地球上的某部分土地，作爲完全由自己個人意志所支配的勢力範圍，而排除其他一切人。在這種前提之

下，問題是在於查明經濟的價值，即查明怎樣在資本主義生產基礎上從這種壟斷權方面取得價值。這些人在法律上的權力，他們使用和濫用地球上某些部分土地的權力，是不能給我們解釋什麼的。使用完全隨經濟條件為轉移，而經濟條件是不以這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法律觀念的本身，至多不過是這樣的意思，就是說，土地所有主可以處置自己的土地，像一切商品所有主可以處置自己的商品一樣；而且這種觀念——自由的土地私有權的法律觀念——在古代世界，只是在原始社會制度瓦解的時代才發生，而在現代世界中只是與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同時出現。在亞洲，這種觀念是由歐洲人輸入的，而且僅限於某些地方。（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二部，五四三——五四四頁）

假定直接生產者在這裏（即在工役地租制之下——譯者註）有自己本身的生活資料，有勞動底物質條件，這些條件是為實現他的勞動及生產他的生活資料所必需的；他獨立經營自己的農業及與農業相聯系的鄉村家庭工業。這種獨立性並不因下面這種情形（例如印度就有這種情形）而消滅，就是，這些小農彼此聯合

成爲多少是自然發育起來的生產村社；這裏所說的，只是他們對名義上的土地所有主是獨立的。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名義上的土地所有主主要從小農身上榨取剩餘勞動，只可以用非經濟的強制手段，無論這種手段的形式是怎樣。這種形式與奴隸經濟或墾殖經濟所不同的地方，正在於奴隸是依靠別人的生產條件而工作的，並不是獨立工作的。總之，這種形式所需要的東西，就是：人身底依賴關係，人身在某種程度上的不自由，人被束縛於土地上作爲土地的附屬品，真正的附屬品。要是與他們直接對立的，不是土地私有主，而是國家，以土地所有主資格同時又以君王資格出面的國家，如在亞洲那樣，那末，地租與地稅就相符合，或者，更正確些說，那時便沒有什麼與這種地租形式不同的地稅。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許依賴關係所採取的形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並不比該國家底一切臣民對該國家的關係所採取的形式更嚴厲些。國家在這裏是最高土地所有主。主權在這裏，就是在全國範圍內集中起來的土地所有權。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便沒有任何私人的土地所有權，雖然，私人的土地管理及土地使用和村社的土地管理

及土地使用都是存在着。（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二部，六九六頁）

歷史上私有權底產生絕對不是欺騙和暴力底結果。反之，私有權在一切文明民族底古代原始村社中就已存在了，雖然它只包括某種物品。它在這些村社中就已經以商品形式，經過與外界的交換而發展起來。而且，村社的生產品越是採取商品的形式，即是說越是不爲生產者自己的消費而生產，越是爲出賣而生產，則這個村社內部那種原始的自然產生出來的分工便越是迅速地被交換所排擠，個別社員之間的財產地位便越是不平等，村社土地公有制便破壞得越是深刻，村社越是迅速地變爲小私有農民的鄉村。東方專制政體和歷來侵略的遊牧民族底更迭的統治，在數千年的過程中未能消滅古代的村社制度；而大工業却漸漸破壞那自然發育起來的農村手工業，使村社制度日益瓦解。這裏也同毛塞爾及哥瓦爾德地方至今還在實行的分割村社土地的事情一樣，談不到什麼使用暴力；農民自己認爲用私有制來代替村社土地公有制，這對自己是有利的。就是建築在村社土地公有

制基礎上面的原始貴族等級之造成，起初也絕不是依靠於暴力，而是依靠於習慣與自願的服從，這在克爾特人、德國人當中以及在印度的彭家埠就是這樣。私有制始終只是在由於生產和交換條件已經改變而需要施行私有制以加強生產和擴大通商關係的地方才形成；因此，它是由經濟原因所造成的。暴力在這裏沒有起絲毫作用。很明顯的，必須先有私有制而後搶掠者才有掠奪別人財產的可能；所以，暴力只可以把財產從一個人手裏轉到別個人手裏，但不能產生私有制的本身。（恩格斯著：『反杜林』，『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一六四——一六五頁）

……要是我們單是講到經營大規模的地產的問題，那末，就應當首先知道這種地產是屬於什麼人。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一切文明民族底歷史初期所遇到的，也不是像杜林先生用他所謂『自然辯證法』的慣用的魔術手段所表演給我們看的大的土地私有主，而是實行村社土地公有制的民族的和農村的村社。從印度到愛爾蘭，大規模的地產之耕種原先就是由這種氏族公社和農村村社進行的，——

或者由整個鄉村共同耕種，或者由各家耕種公社，在一定期限內撥歸各家使用的土地，同時，如果由各家耕種，則森林、牧場還留歸公用。杜林先生『在法律與政治科學方面』有『極認真和專門的研究』，這種研究底標本特點就是他對於以上這些東西完全不知道，他的一切作品都充分表明他完全不知道毛烈爾轟動一時的關於日耳曼原始村社組織（這是全部日耳曼法權底基礎）的著作，也完全不知道那種多半是由毛烈爾所引起的面且不斷增多的著作，這種著作從事考察原始的村社十地公有制，考察歐亞一切文明民族裏面這種土地所有制存在和瓦解底各種形式。杜林先生在法國和英國的法權問題上所表現的那種只可埋怨自己的不學無術，已屬荒謬，可是他在德國法權問題上那種同樣只能怪自己的無知無識，則愈加昏聩。這樣痛罵大學教授眼界狹小的人自己在德國法權問題上却總是拘泥於二十年來教授們所抱的觀點。

杜林先生斷定說，要耕種大規模的地產，就必需要地主和奴隸，這種話完全是『憑空撰造和意想』。在土地所有主是村社或國家的那些東方國家，『地主』

這個名詞在它們的語言上找不出來，這一點可以由英國法律家委員會告訴杜林先生，因為這個委員會也在印度白白地考過誰是地主的問題——正如已故的亨利第七十二、林斯——格林茨——石林斯——洛賓石頓——額布爾司瓦斯基考是誰是守夜者的問題一樣。在東方，只有土耳其人才在他們所掠取的地方施行了特種的地主封建制。（恩格斯著：『反杜林』，『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一七八——一七九頁）

（一）在一切東方民族中，自從這些民族土著的一部分與繼續遊牧的他部分離開以來，我們能夠找到這兩部分中間一般的相互關係。

（二）到護罕默德時候，歐亞通商道路已大大改變，而且以前顯然參加與印度等地通商事務的阿剌伯各城市，此時在商業上處於衰落狀況，這當然對於護罕默德的侵略也給了一種推動力。

（三）至於宗教，那末這個問題溶化在一個比較一般和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之內：即東方史何以採取宗教史底形式。

關於東方城市底形式的問題，最出色、最醒目和最母容爭論的作品莫過於法蘭蘇·伯爾尼底一部舊書了，此人曾在奧速則伯門下當過九年醫生……。

……伯爾尼就土耳其、波斯及印度斯坦來講，正確地認定東方一切現象底基本形式是在於那裏沒有土地私有制之存在。這一點，甚至可以作爲了解東方世界的真正的關鍵。（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一八五三年六月二號。『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一卷，四八八——四九〇頁）

沒有土地私有制之存在，這的確是了解全東方情形的關鍵。政治史和宗教史的根源都在這裏。可是東方何以沒有進到私有制，連封建式的私有制都沒有進到呢？我以爲主要原因是在於氣候，且與土壤底性質有關係，尤其是與廣闊的沙漠地帶有關係，這些沙漠，從非洲撒哈拉起，經過阿剌伯、波斯、印度及蒙古，綿延到亞洲最高的高原。這裏的農業，主要的是建立在人工灌溉底基礎上的，而這種灌溉却已經是村社、地方當局或中央政府底事情。東方的政府向來只有三種職司：財政司（收括本國人民的資財），軍務司（搶掠國內外人民）和公務司（注

意再生產事宜)。在印度的英國政府用一種庸俗的辦法組織了第一種和第二種職司，但完全忽略了第三種職司，因此，印度的農業也就日益衰落。自由競爭在那裏完全失敗了。這種人工灌溉法，只要水道一壞，便立刻停止作用；這種灌溉法足以解釋本來就很值得注意的一種現象，就是有許多地方，過去草木遍地（如帕米爾、彼特拉、約門的廢墟、埃及、波斯及印度斯坦的許多地方），現在却變成了一片荒涼的沙漠。這一點也可以解釋下述的事實，就是只須一次破壞的戰爭，就能把國家變成了數百年內杳無人煙的沙漠地帶，將它的全部文明毀滅乾淨。（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一八五三年六月六號。『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一卷，四九三——四九四頁）

波斯和印度的專制帝王，興亡起伏，不知多少次，他們都始終不忘他們最首要的責任，就是注意江河流域底灌溉工程，沒有這種灌溉工程，就不能在這些國家裏從事農業。只有開通的英國人才沒有見到印度的這種情形。在他們統治下，灌溉的水道及水閘歸於破壞。只是由於定期發生的飢荒，他們結果才看清他們對

於這一項工作的疏忽，只有此項工作，才能使他們至少得到他們的前輩所享受過的那種統治印度的權利。（恩格斯著：『反杜林』，『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一八二頁）

亞洲自從有史以來只在過三個管理部門：財政司，或稱搶掠本國人民的機關；軍務司，或稱搶掠鄰國人民的機關；最後，就是公務司。氣候和土壤條件，特別是廣闊的沙漠地帶，由撒哈拉經阿剌伯、波斯、印度及蒙古綿延到亞洲高原，——這些情形會使利用水道及水利工程來實行人工灌溉的辦法成爲東方農業底基礎。在埃及和印度利用河水氾濫來灌溉田地，在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及其他國家也是一樣，利用河水高漲來灌滿人工水道，人們需要節省水份和共同使用水源，這種初步的需要，在西方，如法蘭德、亞和意大利，曾推動私人企業家聯合爲志願協會；在東方呢，却因爲文明程度太低，地域太廣，不能產生志願協會，這種需要便絕對要求政府底集中力量出來辦理此事。由此便產生一切亞洲政府所不得不担任的經濟職務，即組織公共事業的職務。這種人工灌溉法是依賴於中央

政府的，如奧中央政府對灌溉工程表示冷淡，這種灌溉法就立刻廢弛下去。這一點足以解釋那件不能用別的方法來解釋的事實，就是有許多地方，如帕米爾、彼特拉、約門底廢墟、埃及、波斯及印度斯坦底幾大省區，從前曾是良好田園，現在都成了不毛之地。這一點也足以解釋下述的事實，就是只須一次破壞戰爭，就使國家在數百年內杳無人煙，並消滅它的全部文明。你看，英國人在印度從其前輩統治人手裏承受了財政司和軍務司，可是完全忽視了公務司。因此，不能按照英國的自由競爭底原則，『自由動作，自由行動』底原則來發展的農業趨於衰落，然而我們却常常看到，亞洲各國的農業在一個政府底管理之下趨於衰落；而在另一個政府底管理之下又復興起來。在亞洲收穫依靠政府之優劣，猶如在歐洲依靠天氣之好壞一樣。（馬克思著：『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一八五三年六月十號。『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三四七頁）

……不管政治上層發生了無目的的變動，而亞洲這一部分（指印度而言——譯者註）依然具有停滯的性質，其原因完全可以由下面這兩種彼此互相加強的情

形來解釋：（一）公共事業由中央政府辦理；（二）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全國（除兩三個大城市不算外）都分爲許多村社，這些村社構成完全各自獨立的團體，各自成爲完全閉關自守的小天地……。（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號。『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一卷，五〇〇頁）

『從土地上所得的增餘收入，曾經是除了農民底收入之外唯一的大宗收入，這種收入，曾經是由國家及其官吏分配的（在亞洲，即在印度就是如此）。在這一點上，主要城市自然是主要中心。』（七五頁）

『我們可以考究撒馬甘以及撒馬甘南部的比家坡和西寧哥巴達地方已經覆滅的大城市底廢址，這些城市，在皇家收入（即是從土地上所得的增餘收入）之新的分配中心一出現的時候，便馬上被居民所拋棄（不是像其他國家那樣，由於逐

● 馬克思在括弧內所加的數目字，是指明他所引證的那本書上的頁數，他所引證的是約翰士教授的關於各國政治經濟的講演備忘錄。

漸衰落底結果——馬克思註）。」（七六頁）。

請參看伯爾尼博士底書，他把印度城市比作軍營。這就是由於亞洲土地所有權形式的緣故。（馬克思著：『剩餘價值學說史』，俄文版第三卷，三一—九頁）

約翰士考究地租之一切變化——由最簡單的工役地租到現代的農場地租。他到處看出，一定的地租形式即土地所有權形式，適合於一定的勞動形式，及勞動條件底形式。他依次考察勞動地租，或稱農奴地租，考察勞動地租之過渡到物品地租，考察對分制、印度拉伊阿地租等等——這種考察的詳細情形對於我們這裏所講的問題是絲毫沒有用處的。在較早的一切制度中，直接佔有別人剩餘勞動的是土地所有人，而不是資本案。地租（如重農主義者歷來所瞭解的那樣），在歷史上看來（在發展階段較高的亞洲民族中也是這樣）是剩餘勞動，即無代價的勞動底普遍形式。這裏，不是像資本案那樣用交換手續來佔有這種剩餘勞動；這裏

佔有的基礎是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暴力統治，亦即是直接的奴隸制，農奴制，或者是政治上的依賴關係。（馬克思著：『剩餘價值學說史』，俄文版第三卷，二八九——二九〇頁）

……在以上所述的從前的生產方法之下，商人所發生關係的剩餘生產品主要佔有人，是奴隸主、封建主、國家（例如東方專制帝王），他們也就是商人張網漁利的消費財富底代表……。 （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一部，二九七頁）

約翰士所謂拉伊阿地租，就是從土地上得到工資的工人所繳給土地所有主——君王的那些物品地租（第四章）。

這種地租，主要的存在於亞洲。

▲拉伊阿地租常與勞動地租及對分地租相混淆。（一三六頁）

● 約翰士：『論財富分配和稅收的來源』，第一部，『地租』。一八三二年倫敦出版。

——譯者註

在這種制度之下，君王是主要的土地所有人。

『亞洲城市的興旺，或者說得更好些，亞洲城市的存在，完全與政府的消費有連帶的關係。』（一三八頁）●（馬克思著：『剩餘價值學說史』，俄文版第三卷，二九〇頁）

在作工的農民中間有（一）自己耕田的世世代代都享有土地使用權的農民，他們存在於古代的希臘和現代的亞洲，特別是在印度；（二）土地私有的農民，他們存在於法國、德國、澳洲及古代的巴勒斯坦；（三）承租采地的農民。

……約翰士沒有講到兩個主要形式：第一是沒有講到農業與工業結合在一起的亞洲村社。第二是沒有講到在中世紀存在過而在古代也局部存在過的城市行會。（馬克思著：『剩餘價值學說史』，俄文版第三卷，三〇三頁）

……財富底一定的積累發生於經濟發展底一切階段上，即是說，部分地由於

生產之擴大，部分地由於寶庫之組成等等。當工資和地租居統治地位的時候，——即是按照以上所說的，大部分剩餘勞動和剩餘生產品根本不落於工人之手，而為土地所有者所得（在亞洲為國家所得）的時候，在這種社會狀況裏，工資與地租是積累底主要來源^①。（馬克思著：『剩餘價值學說史』，俄文版第三卷，三〇六頁）

關於阿拉比的事，我們知道得不多，可是十個有九個說，他是一個平常的總督，他不願意讓財政家去收稅，因為他自己想依東方習慣中飽私囊。這又是農民國家底一貫的舊歷史。從愛爾蘭到俄羅斯，從小亞細亞到埃及，農民國家底農民之存在，為的是讓人家來剝削他。從亞西里帝國及波斯帝國時代起就是這樣。總督之類的暴主是主要的東方式的剝削者，而商人與律師則是現代的西方式的剝削者。（恩格斯給伯因施坦的信，——一八八二年八月九號。『馬克思與恩格斯文

● 此地馬克思用工人和工資等名詞，去說明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關係。——譯者註

庫』，俄文版第一卷，三二〇頁）

無論地租的特殊形式是怎樣，它的一切形式底共同之點就是：地租之佔有是土地所有權實現底經濟形式，要有地租必須先有土地所有權，即是要有一定的對於一定的土地面積的所有權，無論所有主是村社底代表，如在亞洲、埃及等地那樣，或是土地所有權只是由於一定的人對於直接生產者底人身所有權之結果，如在奴隸制或農奴制之下那樣，或者呢，土地所有權純粹是不生產者對於自然界的私有權，純粹是一種名義上的土地私有權，再或者是這樣一種對土地的關係，這種關係大概是以直接生產者在某部分土地上主有和生產農產物爲直接條件的，而這種生產者底勞動是與外界隔絕的，其社會關係是不發展的，如移民和主有土地的小農那樣。（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二部，五五九頁）

在亞洲，——這裏地租的自然品形式同時又是國稅的主要因素，它所根據的生產關係，如像自然界的關係一樣，不改變樣子而重複產生，——這種支付形式的本身又反過來影響舊的生產形式而鞏固舊的生產形式。它是土耳其帝國自保的

秘訣之一。如果歐洲所強迫日本進行的對外貿易會使日本的自然品地租變爲貨幣地租，那末，日本模範式的農業生產就要趨於絕滅。這種生產的狹隘的經濟基礎也要崩壞。（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九五頁）

因爲這種形式，即物品地租形式，是與生產品及生產本身底一定性質有聯系的；因爲在這種形式之下，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結合是必要的；因爲在這種形式之下，農民家庭由於不依靠市場，不依靠生產的變遷以及不依靠外界的歷史運動而差不多有完全自給的性質；總而言之，因爲一般的自然經濟底性質，這種形式最容易成爲社會停滯狀況的基礎，例如我們在亞洲所看到的就是這樣。這裏，也如在比較早期的工役地租形式之下一樣，地租是剩餘價值底通常形式，因此也就是剩餘勞動底通常形式，這種剩餘勞動就是直接生產者迫不得已而替自己勞動底最主要條件之所有主、即替土地所有主白盡義務的全部剩餘勞動，——雖然這種對於直接生產者的強迫已不是帶着舊有的嚴厲的形式了。（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二部，七〇—頁）

我的推測，以爲亞洲的或印度的所有權形式，最初在歐洲到處存在過，這種推測在這裏（在毛烈爾底書上——譯者註）又得到證實（雖然毛烈爾絲毫不知道這一點）。因此就在這一點上，俄國人也完全喪失了以獨創者自命的權利。他們現在還保存着的東西，可以歸結爲他們的鄰族所早已拋棄了的形式。（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四號。『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四卷，二八頁）

『商業。高利貸。貨幣』

在古代亞洲的、古代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生產方法之下，生產品之變為商品，亦即人們之變為商品生產者而過着商品生產者的生活，這只有附屬的作用。但是村社制度愈趨於衰落，這種作用也愈增大。真正的商業民族，正如享樂之神或波蘭社會毛孔裏的猶太人一樣只是古代世界中虛無飄渺的事。這些古代的社會生產機體，按其構造，比資產階級的機體不知要簡單和淺顯多少，然而它們所依據的基礎，或者是還沒有與別人脫去原始氏族聯系的個人之未成熟性，或者是統治與服從直接關係。（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四〇頁）

從前的觀點，過於輕視亞洲的、古代的及中世紀的商業底規模和意義，現在

則相反，過於誇大它們。

要免除這樣的觀念，最好是考察十八世紀之初，英國的進口和出口，並與現代的進口和出口比較。然而當時的進出口比過去任何商業民族的商業不知要發展多少。（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一部，二九八頁上的註解）

工業資本（工業資本或用貨幣名義或用商品名義而起作用）底週轉，在自己的流通過程中——無論它以貨幣資本底資格或是以商品資本底資格出來活動——與那些以各種各樣的社會生產方法所製造出來的商品流通相錯綜結合，如果這些社會生產方法是商品生產的話，商品或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生產底出品，或是農民（中國人、印度的拉伊阿人）生產底出品，村社生產底出品（荷屬東印度），國家生產底出品（如古代俄國史上所遇到過的以農奴依屬關係為基礎的生產），或是半野蠻的打獵民族底生產等等，——這都是一樣的：它們以商品和貨幣底資格與工業資本所藉以表現的貨幣和商品對立，並加入工業資本底週轉過程和加入包含於商品資本中的剩餘價值底週轉過程，既然剩餘價值是作為收入來消費的

話，——因此它們加入商品資本流通底兩個分支。（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二卷，九四頁）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生產方法之下，高利貸者只是在下述意義上才可以說有革命的作用，就是他毀壞並消滅這樣一種所有權形式，而這種所有權形式的鞏固根基及不斷重演，便是國家政治制度之所以始終不變的基礎。在亞洲的形式之下，高利貸制可以存在很久，而同時只是引起經濟衰落和政治腐敗。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其餘的條件具備的時候和具備的地方，高利貸者才是創造新生產方法的工具之一，他一方面使封建主及小生產者破產，另一方面使勞動條件集中並將它們變為資本。（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二部，五二七頁）

在亞洲，例如在印度，寶庫底組成並不像在資產階級經濟中那樣是整個生產過程機體中的附屬職能，可是在那裏這種形式的財富保存着最終目的的意義；在這些地方，金銀商品其實不過是裝飾品而已。（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

俄文版，一三二頁)

純用金屬做流通工具的各民族中，例如在古代民族中，寶庫的組成是到處皆有的。一種過程，個別的人們和保管國有寶庫的國家都實現這種過程。在更古的時代，在亞洲和埃及，這些帝王和僧侶所保管的寶庫，首先就是他們威權的一種證據，而在希臘和羅馬，寶庫却是經常有担保的、宜於使用的一種剩餘財富的形式，所以寶庫底組成便成爲政治底任務。(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俄文版，一二六頁)

在信貸制完全不發達的各國，如在中國，虛價紙幣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出現了。

『皇帝(中國皇帝)可以任意浪費，不加計較。因爲他除了皮幣和紙幣以外，並不花費也並不鑄造什麼其他的貨幣。而當這些貨幣使用太久而開始損耗的時候，人們便把它拿到國庫裏去，從那裏換得新的貨幣。這些貨幣就通行於全國，通行於各省……他們不製造金幣，也不製造銀幣。』正如孟德維爾所推想的

那樣，「他因此可以毫無限制，任意揮霍。」（約翰·孟德維爾著：『遊行記』，一七〇五年倫敦出版）（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俄文版，一一七——一一八頁）

真正的紙幣是從貨幣作為流通工具的這種功用中產生出來的，同樣，信貸貨幣底自然起源在於貨幣作為支付工具的這種功用。

附註：中國的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居然向天子上條陳，暗中想把官票鈔變為可兌現的錢莊鈔票，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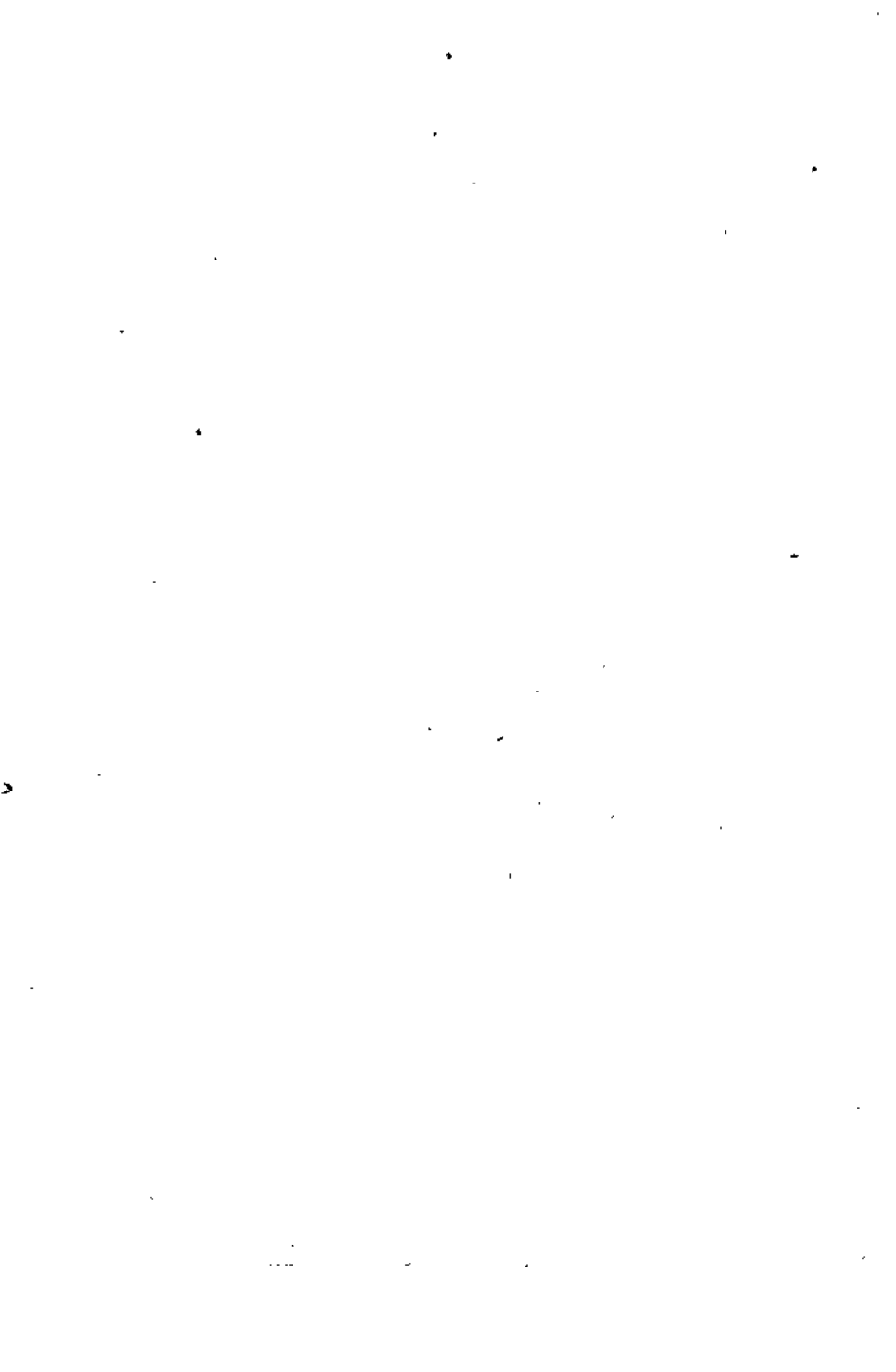
他在一八五四年四月鈔法核議會的奏呈中，受了相當申飭。他是否受了竹板笞責，則無消息。

該奏書之結尾有云：「本核議員等曾將其條陳詳加審核，覺其中所言，專利商賈，於朝廷毫無

一列。」（見俄皇派駐北京大使館關於中國的著作，第一卷，由阿塔爾博士及梅克林堡譯成

總文，一八五八年柏林出版）（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八二頁）

第二篇 關於中國的論文



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

有一個觀察很深刻而同時又富於熱烈理想的研究家考察了支配人類發展的基
本原則以後，認爲自然界底基本秘訣之一就是他所謂兩極相逢律。「兩極相逢」
這句著名的格言在他看來是全部實際生活中偉大和重要的真理，這種真理，哲學
家也不能漠視，如天文學家不能漠視克白萊底定律或牛頓底大發明一樣。

『兩極相逢』是否是這樣萬應的原則——要明白這一點，可以看中國革命對
於文明世界所大概發生了的影響。說歐洲各民族最近將來的起義和它們爭取共和
自由及比較廉潔政體的這種鬥爭底最近將來的階段，其有賴於『天朝』——歐洲
底正反面——目前所發生的事件，比有賴於現時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比有賴

於俄國底威嚇及很有發生可能的全歐洲戰爭，大概要多得多，——這種話，說來好像很奇怪荒謬。然而，這絕不是謬論，細心考察這個問題底實質，就可以相信這點。

在中國，起義連綿不斷，已有十年之久，而且現在已匯合成爲一種強有力的革命；不管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不管這些起義帶有何種宗教的、朝代的或民族的形式，而起義爆發底本身毫無疑義地是由英國的大炮引起的，英國用大砲來追迫中國輸入那種名爲鴉片的催眠劑。清朝一遇到英國的槍砲就喪盡了自己的聲威，迷信『天朝』萬古不朽的這種幻想也就消失了，與文明世界隔絕的那種野蠻的絕對的閉關陋習也被打破了，通商關係底基礎也就奠定了，這種關係從那時候起，特別是在加里佛尼亞與澳大利亞黃金底影響之下已有迅速的發展。同時中國底銀幣，——這是它的命脈，——開始輸出到英屬東印度。

一八三〇年以前，當中國人在對外商業上常佔優勢的時候，銀子不斷地由印度、英國及美國流入中國。可是從一八三三年起，特別是從一八四〇年起，由中

國輸出到印度的銀子這樣多，致使『天朝』發生銀源竭的危險。因此皇帝便下詔嚴禁鴉片貿易，結果他的辦法引起更劇烈的反抗。除了這種直接的經濟影響之外，與私販鴉片有關的賄賂行爲，使中國南方各省的官僚完全腐化。中國皇帝通常被尊稱爲國父，而他的官僚也就算是皇帝對各地方施行父權底支柱。可是這個家長權，這個大國機體內各部分間的唯一的倫常上的聯系，却被那些寬待鴉片奸商、從中取利的官僚們底賄賂行爲所逐漸破壞了。這種情形，主要地正是發生於首先起義的南方各省。鴉片漸漸取得對中國人的統治權，皇帝及其拘泥的官僚們，也就漸漸失去自己的統治權，這是未必須要證明的。我們可以認爲歷史之所以須要麻醉該國人民，爲的是要把他們從歷來的愚昧狀態中喚醒起來。

英國的棉織布和——數量不多的——毛織布底輸入，從前是極少的，從一八三三年起，當對華貿易壟斷權由東印度公司手上轉到私商手上的時候，此項輸入就迅速增長了，而從一八四〇年起，當其他各國，特別是我們的國家也開始與中國通商的時候，此項輸入愈加增長。外國布疋之輸入，對於中國工業的影響，與

這種輸入過去對於小亞細亞、波斯及印度工業的影響一樣大。中國紡織匠因外國的這種競爭而大受其苦，這一點就在全國引起了相當的震動。

一八四〇年戰爭失敗以後中國所付給英國的賠款，大宗的鴉片消耗，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溢，外國競爭對地方生產的破壞影響，全部國家行政機關的腐敗——這些情形就引起了兩種結果：舊捐稅更加繁重而難以担負，舊捐稅外又加上新捐稅，因此，一八三三年一月五號，北京皇帝下了一道聖旨，命令武昌總督及漢陽巡撫免徵一部分欠稅和延期徵收稅捐，並命令他們最重要的，是絕對不得於應繳數目外再事苛求，聖旨中說不然『貧民何堪忍受？』。又說：『如此，吾民當災患頻仍之際或可免於稅吏之勒索。』●我們記得，在一八四八年，在奧地利——這是日耳曼的中國——也有過這樣的言論，這樣的讓步。

這一切對於中國底財政、禮教、工業及政治結構同時發生影響的破壞因素，

● 此地引證，由俄文譯成中文。

在一八四〇年，在英國大砲底威脅之下，已經完全發展起來了；英國大砲消滅了皇帝底權力，迫令『天朝』與外洋接觸。與外洋完全隔絕，這會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當這種隔絕情形，在英國強迫之下而歸於消滅時，便必然要發生腐爛，正如小心保存在緊密封閉的棺材內的木乃伊一樣，只要與外界新鮮空氣一接觸，便一定要腐爛。可是現在，當英國引起了中國革命的時候，便發生一個問題，即這個革命，過些時候，對於英國以及——經過英國——對於歐洲會發生什麼影響？這個問題是不難回答的。

我們常常叫讀者注意一八三〇年以來英國工業空前發展的情形。當時在最驚人的興旺當中就已不難看出若千日益迫近的工業危機底明顯徵兆。雖在加里佛尼亞和澳大利亞發現金礦，雖有廣大的、沒有先例的移民運動，可是，要是沒有什麼特別原因來阻礙的話，那末在相當時候會有這樣的時機到來，就是市場底擴大不能趕上英國工業底擴充，而這一種兩不相稱的現象也同從前一樣，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機。可是如果有一個大市場忽然縮小，則危機之到來必然加速。而

現時中國的起義，對於英國正有了這樣的影響。英國需要開闢新市場或推廣舊市場，這是英國減低茶葉關稅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茶葉人口一增加，則輸出到中國去的布疋也有增加的希望。可是在一八三四年取消東印度公司底商業壟斷權以前，英國每年輸出到中國去的物品價值只有六〇〇、〇〇〇金鎊，一八三六年達到了一、三二六、三八八金鎊，一八四五年增加到二、三九四、八二七金鎊，一八五二年約有三、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從中國輸入的茶葉數量，在一七九三年不過一六、一六七、三三一金鎊，然而在一八四五年達到了五〇、七一四、六五七金鎊，一八四六年達到五七、五八四、五六一金鎊；現在大約爲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

最近一季，茶葉的採集不會比過去少。從上海的輸出表上可以看出，它比去年多兩百萬鎊。這種增長，是由於兩種情況促成的。一方面，一八五一年末，市場上發生厲害的停滯現象，於是剩下的存貨，從一八五二年起才輸送出去。另一方面，中國一聽到英國對茶葉輸入的法律改變的消息，便把全部現存茶葉按飛漲

的價格拋到市場上去。可是講到下一次的採集，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可以從倫敦最大的茶葉公司底通信中看得出來。

『上海恐慌達到了極點。金子漲百分之二十五，而且還有人加緊收買它作為儲存。銀子已經不見，以致完全不到銀子來為英國輪船償付中國關稅並取得海關通行證，因此亞爾可克先生曾同意向中國政府負責，說一接到東印度公司底支票或其他有担保的證券時，便繳納關稅。金銀底缺乏，是對於當前商業活動最不順利的條件之一，因為金銀底缺乏恰恰是在最需要它們的時候。沒有金銀，茶葉買主便不能到中國內地去實行訂購，因為訂購要先行大批現金，使得生產者得以繼續工作……。每年到這個時候，人們通常開始訂購新茶，可是現時，大家不講別的問題而祇講保護生命財產，因為一切事務都處於停頓狀態……。要是不設法在四五月間採集茶葉，則紅綠兩種上等早茶，必與到聖誕節時還未收割的麥子一樣，同歸於盡。』

當然，停泊在中國水面上的英美法各國艦隊都不能貢獻保證採茶的辦法，它

們的干涉却可以造成莫大的糾紛，足以破壞國內產茶的中心與輸出茶葉的海港之間的一切交易。因此，對於這一次的採集，價格有增長的可能，投機生意在倫敦已經開始了，——而對於下一次的採集，差不多一定會有大的虧本。可是問題不止於此。中國人，雖然也同革命震動時期的各國人民一樣，願意將他們的全部貨物批發賣給外國人，可是他們循照一切東方民族底慣例，由於害怕發生大變動的心理，將把他們的絲茶藏起來，而只憑現錢出賣。因此，英國不久將發生下面這種現象：就是英國的一種主要消費品漲價；現金外溢，它的棉織品及毛織品最主要市場之一大大縮小。『經濟學家』雜誌對於凡足以使重商社會人心不安的東西總是抱着樂觀態度加以摺斥，現在連這個雜誌也不得不發出下列的言論：

『我們不應當自欺，以為我們可以在中國替自己的出口貨找到以前那樣大的市場……。我們輪到中國去的出口貨要倒霉，曼徹斯特及格拉斯哥的產品底銷售將減少，這是很可能的。』

不要忘記了，像茶葉這樣的必需品底漲價，像中國這樣的重要市場之縮小，

是與西歐之歉收，亦即是與肉類、糧食及其他一切農產品之漲價同時發生的。這就會引起布疋市場之縮小，因為日用必需品一漲價，國內及國外的布疋銷路就相當縮小。英國各處都發出怨聲，說大部分糧食的收成一定不好。請看『經濟學家』雜誌關於這一點所說的話吧：

『英國南方，不但有許多土地將銼過時機留着不種，以至於沒有任何收穫糧食的希望，而且許多已耕種的土地亦將滿地雜草，或者竟根本沒有把田地耕好，所以不宜於糧食的生長。祇要看那潮溼而萎靡的麥苗，就可以看出歉收的明顯徵兆。現時栽種糖蘿蔔的時期，可以說已經過去了，它種得很少，同時栽種白蘿蔔的時期也快過去，然而沒有作過任何準備，來完成這種重要栽種……。燕麥底種植因雨雪交加而大受阻礙。早麥種得不够，而晚麥很難得到好的收成……。在許多地方，許多良種牲畜都死了。』

除了黑麥之外，其他農產品底價格都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三十或甚至五十。在歐洲大陸上，黑麥漲價比英國更高。它在比利時和荷蘭漲了百分之百。漲

價次於黑麥的，就是小麥及其他穀類。

既然有這樣的情形，同時英國工業又已經走過了通常的工業循環週底大部分，所以可以大胆地預先斷定說，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制度底那裝滿着炸藥的地雷上，並引起早已成熟了的總危機底爆發，這種危機，當它傳播到英國國境以外去的時候，就會直接在歐洲大陸上引起政治革命。你看，這將是一幅多麼奇妙的圖畫啊：中國引起西方的震動，而同時西方列強却在英法美軍艦幫助之下將在上海、南京以及運河口等處規定『秩序』。這些以秩序做買賣的列強，企圖扶助風雨飄搖中的清朝，它們難道忘記了：仇視外國人和驅逐外國人於中國境外，這在從前只是由於中國地理上和人種上的關係，自從滿洲鞭子征服中國以後，才成了一種政策。歐洲各國在十七世紀之末，爲着與中國通商而互相競爭，它們中間的劇烈糾紛，大大地促進了滿洲人所採用的非常政策，這是毫無疑義的。可是推動這種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害怕外國人會扶助很大一部分中國人在十七世紀前半期或大約在這時期內所有過的那種不滿意滿洲人奴役他們的

情緒。因爲這個原因，當時便禁止外國人經由其他一切交通道路與中國人發生來往，只讓他們經過與北京及與產茶區域相隔很遠的一個城市——廣州，而外國人的商業只限於與香港商人發生來往，政府給香港商人以專門與外國人通商的特權，以使用這種方法來使其餘的人民不與可恨的外國人發生任何來往。總之，在現在的時候，西歐列強底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帶有暴力的性質，並使商業停頓。

同時講到印度時須要指出一點，就是印度底不列顛政府，它的七分之一的收入都是由於出賣鴉片給中國人而得來的，而印度對英國布疋的很大部分的消費却是靠這種鴉片底生產爲轉移的。固然，中國人之不肯不吸鴉片大概也同德國人之不肯禁止抽煙一樣。可是大家都知道，新皇帝並不反對在中國本地種植罌粟和調製鴉片，這對於印度底鴉片生產及收入和印度斯坦底商業來源顯然會給予致命的打擊。雖然有利害關係的相當方面或許不會立刻感覺到這種打擊，但它在一定的時候會表現自己的影響，會促進普遍的財政危機底加緊和延長，關於這種危機底命運，我們在上面已經作過預測。

自從十八世紀以來，歐洲沒有一次嚴重的革命不是先經過商業危機及財政危機的。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都是這樣的。固然，我們不僅逐日看到統治強國與附屬國家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日益可怕的衝突徵兆，而且還看出現有列強相互間的衝突，這種衝突漸漸達到那樣緊張的程度，就是要動用武器和使用最後之手段。歐洲各首都每日都有消息，今天說世界戰爭快要爆發，明天又說和平有了保證，過了一星期又說起戰爭來了，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然而我們可以相信，無論歐洲列強之間的衝突如何激烈，無論外交界空氣如何險惡，無論某國的某個革命派進行何種運動，然而國君底忿怒與國入底憤激，總是由於經濟興旺而同樣趨於和緩的。無論是戰爭，無論是革命，都不能將歐洲捲入漩渦，如果戰爭和革命不是由於普遍的工商業危機底結果而產生的話；而這種危機之到來，總是應由英國先發信號，因為英國是歐洲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主要代表。

在現在這個時代，英國工廠數目空前增多，英國正式政黨極端腐化，法國全

部國家機體變爲一個巨大的、投機的交易所康采恩，奧國快要崩潰，到處皆有悖理的事情足以引起人民的報復，反動列強彼此間的利益互相對峙，俄國再次向世界顯示它的侵略野心；我們用不着來講，上述危機在現在這個時代將引起何等重大的政治結果。（『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三〇九——三一八頁）

馬克思作。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號『紐約

每日論壇』第三七九四期的社論。並未署名。

國會關於對華軍事行動的討論

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作於倫敦

有兩個議案斥責對華激對行動，一個是德爾比伯爵的，一個是科布登先生的，這兩個議案，根據事先的聲明，第一個是二月二十四號在貴族院內提出的，第二個是二月二十七號在衆議院內提出的。貴族院內的討論已經終結，同日衆議院內的討論就接着開始；貴族院內的討論，對於巴麥斯頓內閣給了嚴重的打擊，使它只得到了三十六票的比較微小的多數。衆議院內的討論，結果也許會使內閣失敗。可是無論衆議院內的辯論怎樣有趣，貴族院內的討論，已把這場辯論中雙方的理由講盡了，而德爾比爵士與林赫斯特爵士的妙論已經預先說出善於雄辯的

科布登先生、布里菲爾爵士、洛西爾爵士及其他許多人所說的話。

閣員中唯一的法學家——貴族院院長說過：『要是英國在亞羅船事件上沒有法律根據，則它的一切行動自始至終都是不正確的。』德爾比與林赫斯特無疑地證明了，英國在整個亞羅船事件上絲毫沒有法律根據。他們的論據，與英國電報第一次發表後『論壇』報底文章內所引的論據十分符合，所以我只須在這裏很簡單地轉達『論壇』報上的論據底意思。

英人爲要辯護砲擊廣州的野蠻舉動，而究竟加中國政府以什麼罪名呢？他們說中國政府破壞一八四三年善後條約第九條，該條上說，留居香港或英國兵艦和商船上的中國犯人，中國官廳不得逮捕，事先應當請求英國領事，英領事可以將犯人引渡給中國地方官廳。而中國官吏，却不經英國領事同意，在航行珠江的亞羅船上逮捕了中國海盜。因此就發生了亞羅船是不是英國輪船的問題。據德爾比說，亞羅船是『中國人建造的，是中國人依法沒收的，是賣給中國人的，是中國人所買的，船上水手是中國人，船是中國人所有的』。這隻中國船到底怎樣會變

了英國商船呢？這是因為他們在香港購買了英商通航證或航行執照。這種證書底法律根據就是一八五五年三月香港地方官廳所頒佈的命令。可是這個命令不但破壞了中英間的現有條約，而且還取消了英國法權底本身；因此它是不發生效力的。此項命令本來可以根據關於航海商業的章程，在表面上類似英國法律，可是這個章程只是在香港當局的命令頒佈兩個月後才頒佈的。而且，香港當局的命令從來沒有與這個章程底法律條款相符合。所以亞羅船所藉以取得航行證的這道命令，無非是一紙空文。但就是依照這個無效的文件，亞羅船也不得藉它來辯護，因為亞羅船不合該文件所規定的條件，而且它的執照已滿了期。這一點，遠鮑林爵士自己都承認了。可是，有人說，亞羅船不是英國船，這都沒有關係，但是船上豎的是英國旗子，而這面旗子却受了侮辱。第一，要是真的豎了旗子，那是豎得不合法的。第二，究竟是否豎了旗子，這還是問題。關於這一點，英國方面所說的與中國方面所說的情形互有出入。然而中國方面所說的情形，有葡萄牙八十三號船上的掌帆和水手經過領事所寄出的供詞可以證實。十一月十三號，英

文雜誌『中華之友』關於這些供詞說，『現在廣州大家都知道，在亞羅船被奪取之前，桅杆上六日以來沒有掛過英國旗子』。如此，法律理由既無根據，國家體面問題也不能成立。

德爾比爵士，在自己的演說中，很得當地完全禁止講俏皮話的習慣，而使自己的論據帶有純粹法律上的性質。可是，就算他本人絲毫不想譏諷，而他的演說還是充滿着極深刻的譏諷口氣。的確，德爾比伯爵，英國世襲貴族界底領袖，起來反對過去當博士現在做爵士的鮑林——本覃底得意學生，起來反對這位慈善職業家而擁護人道主義，反對這位堅持要遵守外交上的細禮節的正統的功利主義者而捍衛國家的實際利益，反對『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利益』的公式而主張『民意即天意』的公式。德爾比爵士是侵略家的後裔，當和平協進會會員宣傳用大砲去轟擊的時候，他反而出來宣傳和平，他用『卑鄙的行動』、『可恥的軍事行動』這類字眼來責斥英國艦隊的行動，而鮑林因該艦隊向毫無抵抗的居民實行無恥的進攻，却慶賀它為『光榮的成績，無上的勇敢行動，軍事藝術和英勇精神兩者絕

妙的配合」。這種彼此對立的情形表現出極惡毒的諷刺，——尤其因爲德爾比伯爵甚至感覺不到這一點，所以就更惡毒了。他進行了歷史上的大諷刺；這種諷刺的產生不是由於個別人物底聰明伶俐而是由於客觀情況之滑稽。英國全部國會史上或許還不曾有過這樣的貴族對暴發戶的精神上的勝利。

德爾比爵士一開始就聲明說，「他只得憑藉完全從他所打算責斥的那方面來的供詞與文件」，說，「他決計就根據這些文件來提出罪名」。可是上面已經正確地指明過，像政府所公佈出來的這些文件，使政府得以將全部責任卸在自己的屬下身上。這句話是十分正確的，所以議院內反政府派的攻擊，完全是反對鮑林及其同伴的，而且這些攻擊本可以得到政府本身的批准而無損於政府本身底地位。我引德爾比爵士底話：「我不願意對鮑林博士說不恭敬的話。也許他是一個很有人格的人；可是我覺得，他在關於准許他進廣州城去的問題上真正患了相思病（聽啊！聽啊！笑聲）。我相信，他在夢裏都看見他自己進廣州城。我相信，他朝相思，暮相思，夜裏醒來也相思（笑）。我覺得，由鮑林看來，只要他得到廣

州衙門正式接待，因此而獲得巨大利益，則任何犧牲不爲大，任何商業破壞不足憂，任何流血不足惜。」（笑）

再則林赫斯特發言：

「鮑林爵士不僅是著名的慈善家，而且是專使（笑聲），他自己承認通航證沒有效力，亞羅船也沒有權掛英國旗。可是請注意他說的話：「船當時不在我們保護之下，可是中國人不知道這一點。千萬不要把這一點告訴他們。」

「他還重複了這個意思，因爲他實質上說了：我們明知道中國人沒有犯破壞條約的過錯，可是我們却不要把這一點告訴他們；我們堅持主張要賠款，要依特別禮節送回被捕人。要是不依這種禮節送回被捕人，那就要採用何種辦法呢？很簡單的，那就要搶奪航船，搶奪兵船。要是這還不濟事，那就要佔領更多的東西，一直到強迫着他們屈服爲止，雖然我們明知道他們有理而我們不講道理。（聽啊！）在政府中充任要職的人，提出這種虛假的——我不說是欺詐而說是虛假的，在我們國內，人們認爲欺詐和虛假是同樣壞的——口實，這真是空前卑劣

的行爲。（聽啊！）很奇怪，鮑林爵士怎樣竟能認爲他有權宣戰。我自然懂得，處在這種狀況之下的人，於必要時有設法自衛的全權，可是以這種根據、用這種口實來實行進攻，——這是世界史上難能找到的極異乎尋常的一樁事！從案頭文件中十分明顯地看出，自從他就任現職以來，他的野心就立意要達到他的前任者所沒有達到的目的，這就是進廣州城。因爲一心一意要實現其進廣州城的計劃，所以他就盲目地使國家捲入了戰爭漩渦。結果怎樣呢？廣州城內英僑一百六十萬磅的財產，現在被沒收了；並且，我們的商場也被燒盡了，這都只是由於一個最有害的人所實行的最有害的政策。英國有這樣的一首詩：

你這個人得意洋洋，

其實你的權柄並不久長，

明明是毫無學識，却偏裝聰明人模樣。

跪如秋草，惡似虎狼，

光天化日之下幹那殘殺勾當，

天女見了也流淚心傷。」

最後格列伊爵士發言：

「爵士諸公看看文件便知道，鮑林爵士求見葉總督，總督應許了，並指定城外商人伍家爲相見之地。然而鮑林爵士却大抬身價，以爲不能隨便到那裏相見，而只能到總督衙門去。我希望通過決議時至少要得出一點結果——即立刻召回鮑林爵士。」

鮑林爵士在衆議院內也遇到同樣的斥責，而科布登先生發言，一開始就正式聲明斷絕「與這個人二十年來的友誼關係」。

遂字逐句摘引來的德爾比、林赫斯特和格列伊三爵士底演說，證明巴麥斯頓爵士政府爲要擋住打擊起見，只要犧牲鮑林爵士而把自己與這位「出色的慈善家」分開就夠了。

政府居然有這樣容易擺脫窘狀的可能，這不是由於反政府派底體諒和策略，而完全是由於呈交議院的那些文件；只要把這些文件以及所進行的討論稍徵攷察

一下，就可以明白看出這點。

鮑林爵士因想到廣州去而『害相思病』，這還有什麼懷疑的餘地？如倫敦『泰晤士』報所說，這個人『完全以自己的主意而採取這樣的方針，沒有與國內上司商量，也沒有顧及國內上司的政策』，這難道沒有證實嗎？巴麥斯頓政府已經動搖不定，政府正遇着各種困難——如財政困難，英波戰爭所引起的困難，秘密條約方面的困難，選舉改良方面的困難，聯合內閣的困難；巴麥斯頓本人也感覺到，現在議院注射於他身上的視線，『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帶緊張色彩而少帶贊揚神色』，——爲什麼他恰恰選擇這個時候，在自己政治生涯上第一次向別人，而且是向自己的屬下表現始終不渝的態度，而冒着危險使自己的地位不但更加惡化，而且完全損壞呢？他爲什麼把自己新近發生的熱情弄到這種地步，甚至不惜犧牲自己來贖什麼鮑林博士之罪呢？當然，沒有一個思想健全的人會認爲這位高貴的子爵能够走入這種感情主義的迷途。他在這些中國事件上所採取的政治路線，確實證明呈交議院的文件還不完全。除了已公佈的文件之外，一定還有秘

密文件和秘密訓令，這些秘密文件和秘密訓令一定說明：鮑林博士之所以想進廣州城而害『相思病』，就因為他的背後有鎮靜的政府元首懲惡他去相思，並為着自己的目的，而把這種相思由潛熱變為猛烈的火燄。

馬克思作。見一八五七年三月六號『紐約

每日論壇』第四九六二期。並未署名。

中英衝突

一八五七年三月三號星期三作於倫敦

關於中國事件的討論，帶有險惡的性質，巴麥斯頓爵士因今晚要舉行表決，心裏頗感不安。這些討論之所以有與趣，主要地是因為雙方都表現出不誠懇的態度，只有很少幾個真以英國對華行動為恥辱的人才說了實話。那裏所發生的事情實際上是大規模的海盜搶劫，因此鮑林爵士在亞羅船事件上是有理還是有罪，這個問題絲毫沒有意義，雖然他是議院內一切演說底唯一對象。『泰晤士』報明確提出一個問題而不帶任何感情上的色彩，這個問題就是：英國在遠東伸張勢力。

『英國營業精神底伸張，已與閉關自守的中國社會底結構相衝突。這種行為

是否合法，那種行爲是否適宜，這些瑣細地方都用不着提起。在世界底常態的和必然的發展過程中，勢必有這樣的時候，就是，如英國人這樣以航海爲生的具有營業精神的民族，要用暴力手段向軟弱的、不善於謀進步的民族，如住在富足的、適宜於我們經商的國家內的中國人發生來往關係。』

真正的實際情況就是這樣，如果我們承認文明的白種民族有權蔑視比較不進步的民族底權利，那末，凡遇有故意侵掠的機會時，就用不着每次都用高明的證據來證明英國有理或沒有理。

『泰晤士』報底論據，乃是從亞歷山大大帝起到窩克爾及上校第特爲止的一切侵掠家底舊論調；這個論據在『強權即公理』這句有名格言上表揚得更好。然而很注意的，就是參加討論的議員，誰也沒有把事情看得更遠大些，誰也沒有堅持要對英國的爲數甚多的外交代表下切實的訓令。這些代表輕舉妄動，輕易把國家捲入戰爭，如現時在中國和不久以前在緬甸那樣；或者故意使人家來侮辱自己或英國國旗，如波斯奧古斯特讓勒事件那樣。每個性格暴躁的公使或領事都可以

發動戰爭，雖然在理論上只有國王可以宣戰，——這當然是很嚴重的事情。要是英國官僚在這種輕狂的和可惡的行動上始終能夠得到援助，如他們總是從巴麥斯頓爵士那裏所得到的那樣，則決不能避免最危險的衝突，而這些好事的官僚就可以把國家捲入這種衝突，因為他們那種好慕虛名及極端驕傲的心理是和他們的智力成反比例的。毫無疑義的，如果明天保守黨起來代替自由黨操縱政府，則他們將極力進行戰爭，而巴爾克士領事和鮑林專使將被召回和撤職，雖然他們本來應當對這兩個人嘉獎並把這兩人奉為他們在東方的同僚們底模範。這屆議會上的大事件就是德爾比保守黨與比爾派之間發生和陸關係以及曼徹斯特派與他們的老對手保守黨之間開始產生友誼感情。這次和睦之所以產生，是由於史坦里爵士和布萊特底私人感情，是由於比金敦爵士在國民教育方面不斷努力實行許多辦法，最後，是由於比爾派出來担保，說從今以後保守黨營壘內將禁止提出一切關稅保護政策的方案。要是這次表決使內閣佔少數，那末，被已故的比爾爵士所分裂了的大黨底這種恢復，是會鞏固起來的。

從中國傳來的消息令人憤恨：也許我們很快就會聽到廣州完全毀壞的消息。廣州城郊約有五千棟房屋，已被英國人焚毀。歐洲大陸的郵電從中國得來的新聞彙刊載稱：

『人們日益感覺到更有迅速駭厲處置廣州之必要，那時就會消滅我們在廣州生存沒有保障的情況和一切不如意的事情。然而，我們懷疑只用海軍力量就足以恢復和振興商業並保證以後商業、財產及生命底安全。我們過去曾經深信我們可以開始，可以縱火，可以破壞，但結果只是使得我們敵人底勇氣和決心更加增加。』

中國人用野蠻手段進行戰爭，使用毒藥、放火和殺人，可是英國人轟擊和焚燒三百萬居民的城市，這種行動也並不見得好些。這段歷史自始至終只能令人厭惡。

馬克思作。見一八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紐約

每日論壇』第四九七〇期。並未署名。

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

幾年以前，在國會中揭破了施行於印度的那種可怕的拷打制度，那時候，詹姆斯·荷格爵士——可敬的東印度公司底督辦之一，——一口咬定說，國會中所提出的責問是毫無根據的。但是後來的調查，證明這種責問確有事實為其根據，而東印度公司底督辦們也不能不知道這些事實，因此詹姆斯爵士只有一個辦法，即或者承認『故意不聞不問』，或者承認『明明知道而不說出』那些歸咎於東印度公司的殘暴行為。現時英國首相巴麥斯頓爵士和外交大臣克拉倫斯伯爵，大概也處於同樣窘迫的情況。首相在市長爵士不久以前所舉行的宴會上，作了演講，企圖辯護對華人的殘暴行動，其中說了這樣一段話：

『如果政府在這個問題上贊同了那些不能加以辯護的辦法，那末，毫無疑義的，政府就走上了值得國會和國人加以斥責的道路。但是我們會深信，這些辦法是十分必要的。我們會認為：我們的國家遭受了很大的侮辱。我們會認為：我國國民，在遼遠的地方遭受了種種的侮辱、強迫和虐待，對於這樣舉動是不能置若罔聞的（贊同的歡呼聲）。我們會認為：我國根據條約所享有的各種權利，已被人破壞，而責在保護我國在該地（中國）的利益的人員，不僅有權利來對付這些暴力行動，而且務須採用一切辦法，毅然決然來對付這些行動。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不贊同我們所認為正確的那些辦法，那我們就辜負了我們的國民對於我們的信仰，如果我們自己處於相同的境地，我們也會認為我們應當採取這些辦法。』

（贊同的歡呼聲）

無論英國的人民和全世界人士怎樣為這篇花言巧語的演說詞所迷惑，而顯貴的爵士本人却絕對不會相信這是真實的言論，要是相信的話，那末就是『故意不聞不問』，這同『明明知道而不說出』差不多是同樣不可原諒的。自從英軍對華

軍事行動的消息傳出以來，英國政府報紙上和一部分美國報紙上，就連續不斷地指斥華人：如責備華人破壞條約上的條文、侮辱英國國旗、污辱旅華外人等等；可是除亞羅船事件外，不會舉出一定的罪名，也不會舉出一件事實來證實這些責難。可是，亞羅船事件底情節，也被國會中的花言巧語曲解到這種地步，致使那些認真要了解這個問題的人們也完全迷誤。

亞羅船是一隻不很大的中國船，水手都是中國人，但這隻船曾為幾個英國人所僱用。這隻船曾得到允許暫時懸掛英國旗航行；可是還在上述的『侮辱事件』未發生以前，允許懸掛英國旗航行的期限就已經滿了。據說，這隻船曾被利用來偷運私鹽，而且在該船的水手內，曾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中國的海盜和私販，當局視他們為久犯國法的人而早已企圖拘捕他們。當亞羅船收帆停泊廣州時，船桅上並未懸掛任何旗幟，此時制軍得到了消息，說船上躲有犯人，於是制軍就將他們拘捕了。如果我們的商港警察局，知道某些海盜和私販躲在近地本國輪船或外國輪船內，則我們的警察局定會實行拘捕，中國制軍正是做了這種事情。可是

因為這種拘捕行動，妨礙了主人們的商務，所以船長就向英國領事控告了。這位英國領事，是個年輕的人，就職不久，據說他的性格輕狂而急躁。當時他親身跑到了該船上，怒氣沖沖地與祇是履行自己直接職務的制軍講道理，可是，結果他一無所得。於是急忙忙的回到領事館向兩廣總督提出命令式的書面要求，要求釋放被捕者並實行道歉，同時他致書香港約翰·鮑林爵士和水師提督西穆爾，說他領事本人和英國國旗都受了不可容忍的侮辱，並非非常明顯地向他們示意，說期待很久的對廣州示威的良機終於到來了。

兩廣總督葉名琛客氣而鎮靜地答覆了失去鎮靜態度的英國年輕領事所提出的橫蠻要求。他解釋了拘捕底理由，並對於已發生的誤會表示抱歉；同時他堅決地否認有任何侮辱英國國旗的企圖並願意釋放被捕者，他明知拘捕合法，但不願意以如此嚴重之誤會為代價而扣留這些犯人。但是英國領事巴爾克士先生認為這一切還不夠：——他要求正式道歉並要求採取道歉的一切應有禮節，否則以後發生什麼變故應由葉總督負責。接着水師提督西穆爾就率領英國艦隊到了廣州，從此

就開始別一種書面通牒；英國水師提督下令式的文書並大肆威嚇，而中國大臣却溫和鎮靜而客氣地給以答覆。水師提督西穆爾要求在廣州城內親自與葉總督面商，葉總督答覆，說這種辦法會違反成例，並說約翰博享姆爵士曾答應：英國人不會提出這種要求。但是如果必須面商，葉總督極願意按照通例在城外一個地點相會，或者是採取其他與中國習慣和舊禮不相抵觸的方式而滿足英國水師提督底願望。但是這一切都不能使英帝國在東方之好戰代表稱心滿意。

這次十二分無理的戰爭，就是根據此地所簡單敘述（現時英國人民已能讀到）的正式報告完全證實了這種敘述）的理由而進行的。廣州許多無辜的居民及安分守己的商人，慘遭屠殺，砲彈炸毀了他們底房屋，一切人道的原理都在『華人底侵略行動使英人底生命財產發生危險』這種空洞藉口之下摧殘乾淨了！英國政府和英國人民——至少是那些願意弄清問題的人們——都知道這些罪名是如何沒有根據而虛構出來的。曾經有人企圖不去調查主要的問題而企圖鼓吹民意，硬說亞羅船事件未發生以前的各次侮辱英人的行動，本身已足以成爲充分的宣戰理由。

可是這些籠統的罪名，是毫無根據的，華人至少能够提出九十九個指斥英人的罪名，以答覆英人提出的每一個罪名。

英國報紙完全不提起旅華外人在英國保護之下每天大肆破壞條約的事件。違禁的鴉片貿易犧牲人命，傷風敗俗，而每年充實英國國庫，——關於這一點我們聽不到講什麼。人們經常收買中國下級官吏，使中國政府失去從商品輸出輸入中所應得的合法收入，——關於這一點我們也聽不到講什麼。許多受人欺騙而跑到外國去工作的華僑，在秘魯沿岸和古巴被賣去充當奴隸，過着最苦的生活，備受凌虐，『直至殘殺』，——關於這一點我們也聽不到講什麼。外人對於本性溫和的華人時常採取粗野行動，開放的商埠中，傳染華人以種種惡習，——關於這一點我們也聽不到什麼。人們之所以不講起這一切以及其他類似的情形，第一是因為外國人大多數很少關心中國的社會條件和風俗人情，第二是因為高明政策底規律之一就是不去提及那些不能給予實際利益的問題。英國的庸人，其眼光不出專賣殖民地商品的小舖子，他在那裏可以買茶葉，因此他在自己本國內就容易相

信內閣和報館強迫民意接受的一切顛倒是非的言論。

鴉片戰爭時期所爆發的、本來已經平熄了的、中國人對於英國人的仇恨火
餘，現在又猛烈起來了，而關於友誼和平的一切宣言都未必能够撲滅這種猛烈的
火餘吧。

馬克思作。一八五七年四月十日『紐約

每日論壇』第四八八四期上的社論。並未署名。

英人對華的新侵略

英人已找得了同華人爭執底藉口，如果這個爭執達於極點，那末結果會發生新的海陸侵略，與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二年因鴉片事件而進行的侵略一樣。當時英人輕易得來的勝利會強迫華人繳納大宗銀兩，這種勝利，會使英國人進行同樣的新試驗，因為英國人雖然怨恨美國人的海盜本性，然而他們自己却保留着很不少的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英美兩國祖先所特有的那種海盜的掠奪精神，而且較之美國人所保留的並不少些。但在賠款割地的鴉片戰爭以後，情勢已有重大的變化，因此人們就極其懷疑：現時這種相同的侵略，能否得到多少相同的結果呢？毫無疑義的，新侵略同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二年的第一次侵略一樣，將選定香港為自

己的策源地。參加第一次侵略的，有兩艘載有七十四尊礮的礮艦，八隻三桅兵船，許多大帆船和兩桅兵船，二十隻輪船和四十隻輪送船，連海軍陸戰隊一起，共計有一萬五千軍隊。新侵略之進行，大概不會發動較少的軍力；我們將要論及的某些情勢，甚至證明進行新侵略時所要調動的軍力，還要大得多。

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二年的侵略，是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由香港出發的；首先佔領了廈門，十一月一號接着又佔領了舟山島，把這個島變成了此後軍事動作底根據地。這種軍事動作底目的，在於侵入橫貫中部的大江——揚子江，並沿着揚子江上駛直達離江口約有二百英里之南京。揚子江劃分中國為兩個不同的部分——華北和華南。中國的大運河，約在南京東南四十英里的地方，流入揚子江並經揚子江北上，該運河是北方各省和南方各省之間的通商要道。英軍這種進攻步驟底用意，是要奪取這個重要的水道，置北京於死地，並逼迫清帝立即媾和。

一八四二年六月十三日，亨利·波廷格爾爵士統率英國軍隊到了黃浦江口，逼近吳淞。黃浦江由南流來，在揚子江入海之處流入揚子江。黃浦江入江之處，形成

上海商港，而上海城市還處在較南的地方。吳淞口兩岸，築有砲台爲其掩護，可是英軍進攻不費多大力量就佔領了這些砲台。接着就有一支軍隊向上海進攻，上海不作任何抵抗就失守了。揚子江兩岸和善的居民，過了約有兩百年之久的和平生活，現在才經受了第一次的戰爭經驗，因此英軍差不多沒有遇到抵抗。可是，江口本身和由海面接近江口的地方，却極難通過。揚子江口非常廣闊，其兩岸半爲黃泥所掩蓋，揚子江即在這兩岸之間流入黃海，兩岸的黃泥和海水差不多不能分清，因爲，海水在幾里路內呈現黃濁色。黃海因此命名。打算駛入揚子江的輪船，應謹慎地沿着南岸前進，不斷地用測水尺測量深度，以免遭遇足以阻礙前進的大沙灘。由江口起直達崇明島末端，到處都有沙灘；崇明島很大，處於江口中心，將江流分爲二。崇明島長約三十英里，過了崇明島，揚子江南岸，即開始高出水面，可是水道却十分曲折。海潮漲到鎮江，鎮江離南京大約還有一半路程，上駛船隻，在未到鎮江以前所看見的只是廣闊的江口或海灣，到鎮江後才看見江河。英國艦隊在未達到這個地點以前，曾遇到許多嚴重的困難，由舟山島停

泊地點到此地有八十英里的路途，航行了十五天，在崇明島附近，幾隻大船擱淺了，可是乘潮水高漲，得以駛開。在英軍克服了這些阻礙而逼近了鎮江城的時候，他們才知道：滿清軍隊雖然沒有軍事技術，可是決不是沒有勇氣和奮發精神的。那裏的滿清軍隊總共祇有一千五百人，但他們却勇敢拚死地應戰，直至全軍覆沒為止。在應戰以前，他們好像早已料到戰鬥底結局，而將自己的妻子兒女絞死或淹死；許多屍首後來從他們淹死的井中撈出，清軍副都統，看見戰鬥已遭失敗，遂焚燒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死了。在此次戰鬥中，英軍損失了一百八十五人。爲報復這個損失起見，他們在劫城的時候大肆屠殺，因爲英軍作戰時那種極端殘酷的手段，是和引起這次戰爭的貪慾無厭的私販行動完全相符合的。如果英軍在各地都遇到了同樣的抵抗，他們就不會取得南京。可是事實上却不是這樣。對岸的瓜州城投降了，並償付了三百萬元的賠款，英國海盜自然極滿意地將這筆款項放進腰包裏去了。

鎮江以上的江流深達二百四十英尺，航行漸見便利，可是某些地方的水流還

是非常湍急，每小時達六七英里以上。但是什麼力量都沒有能够制止砲艦進抵南京，八月六號，英軍終於在南京城下投錨了。所得到的結果，與所期望的完全相同。清廷恐懼萬分，祇得於八月二十九日簽訂條約；而現在就是拿似乎破壞這個條約的行動，作爲一種藉口來提出以新戰爭相威嚇的新要求。

這次戰爭，如果真正開始的話，那大概就會照第一次戰爭底榜樣去進行。可是，現在有許多原因，使英人不能希望得到同樣輕易的成功。那一次戰爭底經驗，華人不曾白白放過。不久以前在珠江的軍事動作中，華人在大砲射擊和防禦方法上，表現了這樣高度的技術，致使人們懷疑在中國軍隊中間，是否有歐洲人參加。在一切實際事務中，——須知戰爭多半也是一種實際事務——華人遠勝於一切東方民族；因此，毫無疑義的，在軍事上，英人在華人中間定會遇到自己的高材生。其次，英軍此次上駛揚子江的時候，定會遇到人工的障礙，而在上次他們大概不曾遇到這種阻礙。除此以外，——而這却是最主要的理由——第二次佔領南京，這在北京朝廷中未必會引起初次佔領南京時那樣的惶恐。幾年以來，南

京和江寧府底大部分地方都落在起義者手裏，而且起義者底一個首領甚至幾個領袖，都以南京爲自己的大本營；在這種條件之下英軍佔領南京，對於清帝，與其說是傷心事倒不如說是快意事。將起義者逐出南京，這倒是替清帝効勞，但要守住這個城市，對於英軍將是一件很困難、很擔心和很危險的事情，而且不久以前的經驗還證明了：縱使敵軍盤踞南京，這對於北京或清廷的政權也並不會馬上造成致命的惡果。

恩格斯作。一八五七年四月十七日，紐約

每日論壇』第四九九〇期上的社論。並未署名。

波斯與中國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作於倫敦

英人剛在亞洲結束了一個戰爭，現在又開始舉行別一個戰爭了。波斯人對於英國侵略的抵抗和華人對於英國侵略的抵抗，是值得我們拿來作一對照的。在波斯，歐洲式的軍事組織系統會像接木那樣接在亞洲式的野蠻制度上；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古的國家底正在腐化的半文明制度，却用自己原有的方法與歐洲人鬥爭。波斯被打得一敗塗地。而紛亂的、半瓦解的中國，却找到了一種抵抗辦法，這種辦法如能一貫施行，就使得第一次中英戰爭時英軍節節勝利的情勢再不能重複發生。

當時波斯的狀況，與一八二八至一八二九年俄、土戰爭時土耳其所處的狀況相同。英國的、法國的、俄國的軍官，曾輪流嘗試去組織波斯的軍隊。各種辦法，相繼採用，而每種辦法，都由於那些本應實行新辦法而成爲歐洲式的軍官和士兵的東方人之妬忌、陰險、愚昧、貪婪和賄賂行爲等等，而依次破壞了。新式的正式軍隊從未有過機會去在戰場上試試自己的組織能力和戰鬥能力。它底一切功勞，祇限於對庫爾得人、土爾克明人和阿富汗人的幾次討伐，在舉行這些討伐時，它做了波斯底爲數甚多的非正式騎兵底主幹或後備軍。當時作戰的軍隊，主要地是非正式騎兵，而正式軍隊祇利用其外表上可怕的戰鬥形式來向敵軍示威而已。但是現在它却不得不與英國作戰了。

英軍進攻布什爾，他們曾遇到勇敢的、可是未奏效的抵抗。但是在布什爾作戰的却是非正式軍，這種非正式軍是由那些未入伍的波斯人和阿剌伯人——那些住在海濱的居民編成的。正式軍隊當時祇是在距離約六十英里之遙的山嶺地帶集中起來。後來他們就向前進發了。英、印軍隊在中途與他們相遇了。雖然波斯人

極有把握地利用了自己的砲隊，並遵照兵法列成了方陣，但是僅僅一團印度騎兵底進攻就將波斯全軍——近衛隊以及普通步兵團——完全擊潰了。要知道在印度軍隊中人們對於這隊印度的正式騎兵的估計如何，那就祇要參看少校洛蘭討論這個問題的一部書就夠了。在英、印軍官中，人們認為印度的正式騎兵不僅是毫無用處，並且遠不如英、印非正式騎兵。洛蘭少校不能舉出實例，證明印度正式騎兵曾經在某一次戰役中顯過奇功。可是六百名這樣的騎兵竟能打跑一萬波斯軍隊。波斯正式軍隊竟這樣心寒胆裂，致使以後除砲隊外，他們在任何地方都不會抵抗過英軍一次。在摩哈麥拉附近，波斯正式軍隊是遠遠避開了危險的地方，讓砲隊獨自防守海濱砲台，在砲台停止射擊時，他們就立刻遠退，而當英軍在實行一次探試戰使三百步兵和五十非正式騎兵登陸的時候，波斯全軍即行退却了，拋棄了輜重車，軍糧和大砲奉送與戰勝者——不，不能稱他們為戰勝者，而祇能稱他們為侵略者。

但是根據這點並不能指摘波斯人是懦弱民族，並不能證明沒有可能使東方民

族學會歐洲式的戰術。一八〇九年至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二八年至一八二九年的俄、土戰爭中，這樣的實例極多。抵抗俄軍最力的，就是在築有城堡的城市中和多山的省份中所編成的非正式軍隊。而正式軍隊無論在什麼地方，一遇野戰即遭失敗，並且常常一見砲火即行逃跑。可是有一連阿爾拿烏特人的非正式軍隊竟能在瓦爾拉的山谷裏很奏效地抵抗了俄軍底圍攻，達幾星期之久。而在最後一次的戰爭中，土耳其的正式軍隊，已經在個別的戰役中，由鄂列特里茲和啓達特戰役起到加爾斯和營古爾戰役止，每次都擊潰了俄軍。

把新軍隊按照歐洲形式編制起來、武裝起來和操練成功，這還不算是在野蠻民族中辦妥了歐洲式的軍事組織。這祇是第一步。施行某種歐洲式的操典，這也是不夠的；歐洲式的操典不能養成歐洲式的紀律，猶之於歐洲式的教練本身不能產生歐洲式的戰術和戰略一樣。要有一大批按照最新式的歐洲教練法而教練出來的、完全擺脫了軍事上的民族成見和舊習的、並能振作新部隊精神的士官，——訓練成一大批這樣的士官，是主要的事務同時也是主要的困難，這一切都須要很

久的時間，大概還要遇到東方朝廷底東方式的愚昧無知、朝三暮四、墨守成見、權位無常和寵臣當權等現象最頑強的抵抗。如果士卒們在檢閱時，能夠走得步伐整齊，轉彎合法，能夠展開和排隊，而絲毫不亂，那末，土耳其皇帝或波斯皇帝就認為自己的軍隊已有準備，能應付世上的一切事變，這未免估計得太過份了。講到軍事學校，那末，此種學校教育所能收到的果實成熟得如此緩慢，致使在東方政府不穩固的情形之下，這種果實未必有完全成熟的希望。甚至在土耳其，受過訓練的軍官，數量也很少，如果在土耳其軍隊內不曾有過很多的異族人^①和歐洲軍官，則土耳其軍隊在最近一次戰爭中就不能有絲毫作為。

到處都成例外的唯一的一種軍隊，就是砲隊。東方民族在這方面簡直太無能為力，以致他們不能不將領導砲隊的事務，完全交給歐洲指導員。結果，無論七

① 土耳其軍隊裏一部分有才能的將領和軍官，曾是斯拉夫族人、阿爾巴尼亞人、阿爾及爾人、特人等等。他們轉奉宗教，在歐洲文獻上都把他們叫做異族人。

土耳其或波斯的砲隊，都比步兵和騎兵不知要好多少。

英、印軍隊是按照歐洲形式組織起來的一切東方軍隊中一支最老的軍隊，只有它不是服從東方政府而是服從純粹歐洲式的政府，它差不多完全由歐洲的軍官指揮，——很明顯的，這樣一支軍隊，在英國部隊和有利的艦隊爲其強固後盾的情形之下，當然容易擊潰波斯的正式軍隊。挫折愈是嚴重，則這種挫折所給予波斯人的益處也愈大。他們現在會知道土耳其人已經知道了的事情：歐式的服裝和檢閱式的操練本身還不是一種護符；而且也許經過二十年以後，波斯人也會成爲衆所共認的榮譽兵士，同土耳其人因自己最近各次勝利而博得榮譽一樣。

據說佔領了布什爾和摩哈麥拉的軍隊將立即調往中國。在中國，他們將遇到與波斯軍隊不同的敵人。與他們敵對的，將不是依照歐洲形式所進行的軍事動作，而是亞洲的非正式的軍隊。毫無疑義的，他們將容易應付這種軍隊；可是，如異華人開始進行民族戰爭來反對他們，如異不文明人決意運用他們現時善於運用的唯一武器，那英人又怎麼辦呢？

現時華人的情緒，大概與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戰爭時不同。當時民衆靜無動作，讓皇帝的軍隊去與侵略者搏戰，並在遭受失敗以後，抱着東方式的宿命主義的態度而服從了敵人的強力。現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現在衝突祇限於這些省份底領域以內——民衆是積極地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人的鬥爭。華人完全鎮靜地和有意地在香港歐人居住區域內將毒藥滲入大宗麵包（有些麵包，已送交李比赫加以分析。李比赫發現多量的砒霜，毒質已侵入麵包底全部，這證明在調製麵包時已滲入砒霜。但因毒藥分量太重，竟使麵包成了嘔吐劑，這樣就使毒藥失去效力）。華人暗帶武器，乘搭商船，而在中途就突出痛擊船長、水手和歐洲搭客，並奪取船隻。凡落到他們手內的歐人，一概被他們擄去和殺死。甚至乘輪船到外國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約定的一樣，在每個放洋的輪船上起來騷動，奪取輪船，他們寧願與船一同沉於海底或者是在船上燒死，而不願降服。甚至僑居國外的華僑，——他們向來是最聽命和最馴服的良民——現在也密謀起事，突然在夜裏舉行暴動，如薩納瓦克或新嘉坡就發生過這種情形，當局祇有嚴加戒備

並使用武力，才能壓服他們。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引起了華人對一切外人的這種憤激情緒，並使這種憤激情緒，帶有完全殲滅敵人的戰爭性質。

軍隊對於採取這種戰爭方法之人民能够有什麼辦法呢？軍隊應該在什麼地方侵入敵國呢？它深入地應該到什麼程度呢？它在那些地方如何支持下去呢？這些所謂文明傳播者向毫無防禦的城市開火，殺人之外又強姦婦女，這班人自然會稱華人的抵抗方法爲懦怯的、野蠻的、殘忍的方法，可是既然這種方法能生效力，那末華人那裏管得這些呢？如果英人將華人當作野蠻人對待，那末，英人就不能不承認華人有權利用他們的野蠻性所產生的一切優點。如果我們通常認爲華人綁架、襲擊和夜中毆打敵人是懦怯行爲，那末，這些所謂文明傳播者就不應忘記：他們自己就承認過，如果華人採取通常的作戰方法，就不能抵禦歐洲式的破壞工具。

簡而言之，我們最好是不要像英國貴族的報紙那樣去斥責華人可怕的殘暴行動，而來承認這是爭取自己生存的戰爭，這是謀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雖然

這個戰爭中具有中華民族底一切自傲的成見、荒唐的舉動、讀書人的愚昧無知和一味妄行的野蠻行動，可是這個戰爭，終究是真正的人民戰爭。對於奮起的民族在人民戰爭中所採取的手段，不應根據通常進行戰爭的公認法則的觀點或者根據某種抽象的標準加以估計，而祇應根據這個奮起的人民所已達到的那種文明程度的觀點來加以估計。

這一次，英人陷入了困難狀況。直到現在，中國的民族狂熱情緒，大概還祇流行於未曾參加大起義的嶺南幾省。這個戰爭，會不會超出這些省份底範圍呢？要是戰爭不超出這些省份底範圍，則這個戰爭，會得不到任何結果，因為中國一切要害的中心，將不會受到危險。同時，如果內地的人民也有狂熱情緒，則這個戰爭，對於英人將是非常危險的。英人能够把廣州城完全毀滅，並在一切有可能的地點砲擊海岸，可是英人所能調動的任何力量，都不足以奪取和保持廣東和廣西兩省。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將有什麼辦法呢？由廣州以北到滬寧一帶止握在中國起義者手上，要是英人激發這些起義者起來反對自己，那便是政策上的錯

誤，然而南京以北加以襲擊就會得到大結果的唯一要點，就是北京。可是由什麼地方能够調集軍隊，以便在海岸上造成有防禦並有駐防軍的作戰根據地，以便克服路途中的每個障礙，以便利用特別部隊來保障與海岸一帶之交通以及用比較雄厚的軍力來逼近這個大與倫敦相等並離海岸根據地一百英里遠的城市呢？另一方面，對京城的示威如有成效，就會深刻動搖中華帝國存在底本身，就會加速清朝底崩潰，就會不是給英國底進展開闢道路，而是給俄國的進展開闢道路。

新的中英戰爭，要引起極多的糾葛，使人簡直不能逆料這次戰爭所會引起的結果。因為軍力不足，尤其是因為決心不够，在幾個月內多少一定會使英軍毫無動靜，只是在幾個不重要的地點（在目前的情況下廣州也算是個不重要的地點）或許有些動作。

有一件事是毫無疑義的：古老的中國底死亡期正在迅速地到來。國內戰爭已使華南與華北分立，而駐在南京的起義首領，大概覺得自己不會受到清帝軍隊底危害（如果不受本派人陰謀危害的話），也同清帝在北京覺得自己不會受到起義

者的危害一樣。直到現在，廣州好像獨自進行着反對英人以及一般外國人的戰爭。但當英、法海陸軍正調到香港去的時候，西伯利亞哥薩克兵却慢慢地、但是不斷地把自己的屯駐地由大胡爾山移向黑龍江岸，而俄國海軍陸戰隊則在東三省很好的海灣周圍設立堡壘。華南人在反對外人的鬥爭中所表現的那種狂熱態度的本身，很明顯地指明中國人已覺悟到古老的中國遇着極大的危險。過了不多年以後，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臨死時的鬥爭，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底曙光。

恩格斯作。登於一八五七年六月五日『紐約

每日論壇』第五〇三二期上。並未署名。

鴉片貿易（第一篇）

關於聯軍全權代表逼迫中國訂立新條約的消息傳出以後，大概也產生了一種幻想，以為商業會有極大的擴充，這種幻想與第一次對華戰爭結束後一八四五年商人們的幻想一樣。即使彼得堡的電報社所傳的消息確係實情，但是否能够相信：通商口岸底數量一增多，對華貿易底總額就必定會增大呢？是否有什麼可靠的根據，能斷定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的戰爭會比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二年的戰爭造成更好的結果呢？祇有一件事是毫無爭論的：一八四三年的條約，不曾擴大美國和英國對華的輸出，反而祇是加速和加深了一八四七年的商業危機。現時的條約也是這樣，它引起一種幻想以為可以得到無窮的市場，它鼓勵投機事業，這

樣，它正是在世界市場從不久以前的總恐慌中漸漸復元過來的時候，會促進新危機底形成。除了這個惡果以外，第一次鴉片戰爭，還促進鴉片貿易底增大而使合法的貿易受到損失。如果文明世界底合力制裁，不能強迫英國放棄在印度強迫種植鴉片和在中國武力宣傳販賣鴉片，則第二次的鴉片戰爭，將發生相同的結果。我們不必細講這種貿易是不道德的，關於這一點，甚至英國人蒙哥米爾·馬耐丁說了以下的話：

『不必說，販賣奴隸同販賣鴉片比較起來，還是善良的事情。我們並沒有殺死非洲黑人，因為我們底直接利益，要求我們保存他們底生命；我們沒有改變他們底人的本性，沒有損壞他們的智慧，沒有消滅他們的心靈。可是鴉片販賣者却腐化了、降低了和毀壞了不幸的人底精神生活，而且還毒殺了他們的身體；鴉片販賣者時時刻刻向貪慾無厭的吃人神貢獻新的犧牲品，而充當兇手的英人和服毒自殺的華人，就彼此競爭，向吃人神底祭台上貢獻犧牲品。』

華人不能同時購買商品又購買毒藥；在現有情勢之下，對華貿易底擴大，就

是鴉片貿易底擴大，鴉片貿易底擴大與合法貿易底發展是兩不相容的，——這些原理，人們在兩年以前差不多到處都承認了。一八四七年衆議院曾選出一個專門委員會去調查中英貿易底狀況，這個專門委員會的報告中說：

『可惜我們應當承認一件事實：近來與這個國家的貿易，處於極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我們與這個國家的來往關係擴大底結果並沒有實現我們的合理的期望，而這種期望的根據，自然是我們能够與這個優美市場自由發生來往關係這件事實。我們認爲：貿易上的困難之所以發生，不是由於中國對於英國製造品的需要不大，也不是由於別國日益厲害的競爭；用銀子來支付鴉片，這就使華人底一般貿易遭受巨大的損失，而絲和茶事實上則應抵償其餘商品底價值。』

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八號的英文雜誌『中華之友』也講到這種情形，它說：

『鴉片貿易，不斷地增長着。如果英國和美國對於絲茶的需要增大，那末這祇是使鴉片貿易繼續增長；銷售工業品的機會是毫無希望的。』

一八五〇年正月間的英文雜誌『亨氏商人』雜誌上，載有旅華美國商人中一

位領導人物底一篇論文，這篇論文中把對華貿易底全部問題歸結於下述一點：

『究竟那種貿易應被取消：鴉片貿易呢，還是英美商品底出口貿易呢？』

華人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觀察也是這樣。

蒙哥米爾·馬爾丁記載道：

『我曾問過上海道台：增加我們對華貿易的最好辦法是什麼，當時英國領事瓦爾佛爾上尉也在座，該道台立即答覆道：「只要停止向我國輸入這樣多的鴉片，我們就能購買你們底製造品。」』

最近八年來的全部貿易史對於這個論點給了新的、彰明較著的說明；但是在未研究鴉片貿易對於合法貿易的有害影響以前，我們要簡單地敘述這種奇怪貿易發生和發展的概況。這種貿易循環不已地引起一些悲慘的矛盾，它影響到東西洋之間一般的關係，這是人類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輸出的鴉片不會超過兩百箱，每箱重約一百三十三磅。鴉片曾得法律許可當作藥品輸入中國，每箱鴉片繳納三元左右的關稅；往中國輸入鴉片的商人，當時差不多

都是葡萄牙人，他們將鴉片從土耳其輸入中國。

在一七七三年，上校岳德生和副董事長葉勒——這兩個人正配與愛爾曼特、巴列美爾以及其他全世界著名的毒藥商人佔居同等的位置——曾示意東印度公司開始和中國經營鴉片貿易。結果在停泊於馬口西南一個海灣裏的輪船上，開設了一個鴉片商棧。但投機事業遭了失敗。在一七八一年，孟加拉省政府派了一艘滿載鴉片的武裝船到中國去，而在一七九四年，東印度公司又派了一隻裝載鴉片的大船到黃埔，即廣州商港底停泊處。黃埔與馬口比較起來，大概是一個更適當的堆棧，因為過了兩年，中國政府就認為必需頒佈法令，禁止中國人私販鴉片，違者加以鞭笞和戴枷示衆。約在一七九八年的時候，東印度公司不再做直接輸出鴉片的生意了，可是該公司却成了鴉片底生產者。在印度當時施行了鴉片壟斷；而東印度公司所有的輪船表面上也在被禁止之列，不准經營鴉片貿易；同時在該公司給予對華通商的私人輪船的執照中，却列有一項條文，註明這些輪船除運輸東印度公司自己生產的鴉片以外，不得運輸任何鴉片，違則罰款。

在一八〇〇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已達二千箱。在十八世紀當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間的鬥爭所具有的性質，和外國商人與中國海關之間的一般爭執所具有的性質相同，而從十九世紀初葉起，這個鬥爭就具有完全特別的性質。中國皇帝爲阻止自己臣民的自殺行動起見，禁止外人輸入這種毒藥和禁止華人吸食這種毒藥，而東印度公司却將印度鴉片底種植及其向中國之私賣，變成自己財政系統中的組成部分。半野蠻人已站在道德的立場，而文明世界却拿搶劫的原則來與他們對立。這個幅員廣大的帝國，包含着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類，它不管時勢怎麼變遷，還是處於停滯的狀態，它受人藐視而被排斥於世界聯系系統之外，因此它就自高自大地以老天朝至善盡美的幻想自欺，——可是現在這個帝國，終究爲時勢所迫，不得不進行拚死的決鬥，在這個決鬥中，舊世界底代表以道德思想來鼓勵自己，而最新社會底代表却奪取那種以最賤的價格購買和以最貴的價格出賣的權利。這是一種多麼悲慘的情景呵！詩人底任何幻想，也未必能想像出比這更離奇的情景吧。

馬克思作。登載在一八五八年九月二十日

『紐約每日論壇』第五四四三期上。並未署名。

鴉片貿易（第二篇）

中國之禁止鴉片貿易，是由英國政府在印度施行鴉片壟斷而引起的。中國皇帝對於本國違禁臣民所頒佈的嚴懲法令以及對於中國海關所下的嚴禁鴉片入口的禁令，結果都是同樣毫無效力。英人收買中國當局，收買海關官吏和一般的官員，這就是中國人在法律上抵制鴉片的最近結果。賄賂行爲，和停駐黃埔的英國商船偷運來華的鴉片煙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腑，並破壞了宗法制度底基石。

東印度公司所扶助而北京中央政府所禁止無效的鴉片貿易日益增大，至一八一六年，鴉片貿易總額，竟達二百五十萬元。那一年，在印度允許了自由貿

易——茶葉貿易仍爲東印度公司底壟斷貿易，這是唯一的例外，——這給了英國私販們底營業發展以新的強大的推動。在一八二〇年，偷運來華的鴉片，達五千一百四十七箱，一八二一年——七千箱，一八二四年，——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九箱。在這個時候，中國政府，除向外國商人發出嚴厲的抗議書外，同時還懲辦了一些與外商同謀的香港商人，並非常努力地究辦了本國吸鴉片的人，在本國海關上，施行了更嚴厲的辦法。這些努力的最終結果，也和一七九四年一樣，就是鴉片商棧由不可靠的地點移往到更適當的營業根據地。馬口和黃埔統被放棄了，鴉片商棧移往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島上，該處所停泊着的那些有全副武裝並有極多水手的輪船，就成了鴉片底經常商棧。在中國政府禁止原有廣州商行使它們暫時不能販賣鴉片時，鴉片貿易祇不過轉到了別些較小的商人手裏，他們不惜冒着任何危險和採用任何手段而進行這種貿易。這樣一來，鴉片貿易就有了更大的銷路，所以在一八二四至一八三四的十年當中，由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九箱，增加到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五箱。

一八三四年，也同一八〇〇年、一八一六年、一八二四年一樣，在鴉片貿易發展史上，劃分了時代。當時東印度公司不僅失去了買賣中國茶的特權，而且一般地不能遏止和停止一切商務。東印度公司就由商務機關改組成了純粹行政的機關，因此對華貿易就變成了英國私人企業所完全能夠執行的事務。英國私人企業的對華貿易當時發展得很迅速，不管中國政府拼命抵抗，它們終於一八三七年順利地將價值二千五百萬元的三萬九千箱鴉片偷運到中國去。這裏有兩件事實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第一，從一八一六年起，在英國對華輸出貿易底每個發展階段上，偷運的鴉片貿易之份額不斷增長；第二，英印政府在鴉片貿易中純粹經商取利的利害關係逐漸消失，而英印政府在這種非法營業中以稅收為目的的利害關係却隨之增大了。在一八三七年，中國政府終於到了再不能將堅決辦法延擱下去的地步。鴉片輸入使銀兩不斷外溢，使國庫以及全國底金融開始破壞。中國最出色的國務要人之一許乃濟，曾提議使鴉片貿易成為合法的貿易而從中收稅；但是經過一年多的討論以後（中國底一切高級官吏都參加討論），中國政府就決定：『此種

貿易毒害人民，所以不應准予經營。」其實就在一八三〇年，值百抽二十五的關稅就可以使國庫得到三百八十五萬元的收入，而在一八三七年，就能得到加倍的收入，可是，野蠻「天子」當時却拒絕徵收此項稅收，而此項稅收，一定會隨着人民墮落底程度而增大。在一八五三年咸豐皇帝雖然處在愈加困難的條件之下，雖然完全明白禁止日益增多的鴉片輸入之一切努力毫無結果，但終於不改變自己先入底一貫政策。這裏我們還要附帶地指出：中國皇帝取締鴉片者和取締邪教一樣，他利用了宗教的宣傳來反對鴉片貿易。一八三七、一八三八、一八三九年中國政府所施行的非常辦法，——其中最激烈的辦法就是詔令欽差大臣林則徐赴廣州，遵照林氏的命令而實行沒收鴉片和焚毀鴉片——成了第一次中英戰爭底起因，這次戰爭，引起中國的起義，使國庫極端空虛，使俄國能够順利地在北方實行侵佔，使南方的鴉片貿易有極大的發展，——這都是這次戰爭底結果。英國爲擁護鴉片貿易而對華作戰，結果英國與中國訂立了一個條約，這個條約雖然禁止這種貿易，可是事實上，從一八四三年起，鴉片貿易却享有完全不可侵犯的權

利。一八五六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值三千五百萬元，英印政府在這一年內，在鴉片壟斷貿易上得到了二千五百萬元的收入，即估國家收入總額底六分之一。舉行第二次鴉片戰爭底藉口，完全是不久以前的事，用不着加以解釋。

在我們結束這個問題分析時，我們不能不指出戴着基督教假面具的、始終空談文明的英國政府所具有的一個特別露骨的内部矛盾。英國政府以帝國政府底資格，裝腔作勢，好像它與私販鴉片的事情絕無關係，它甚至訂立禁止這種貿易的條約。可是它以印度政府底資格却強迫孟加拉省種植鴉片，使該省底生產力受到極大的損失；它強迫一部分印度農民種植罌粟，用禁歛辦法來引誘別一部分農民也去種植，用嚴格壟斷的辦法操縱這種毒藥底全部生產，僱用整批的正式偵探來監督罌粟底種植，罌粟之交到一定地點，罌粟之蒸餾和鴉片之調製，使之適合於中國吸鴉片者底口味，使之裝入爲便於偷運而特別製成的箱子，最後並監督鴉片之運往加爾各答，在政府市場上，由國家官吏拍賣，賣與投機商人，以便由此落到私販手上，再由私販運往中國。英國政府在每箱鴉片上所化的費用約及二百五十

印洋，而在加爾各答拍賣時，却按照每箱一千二百一十印洋至一千六百印洋的價格發賣。可是，這個政府並不因它事實上參加這種事業而滿足，它直到現在，還與從事危險營業以毒害整個中國的那些商人和船主打夥，分享利潤並分担損失。

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祇依賴於對華的鴉片貿易，而且還依賴於這個貿易底偷運性質。如果中國政府使鴉片貿易成爲合法的貿易，同時允許在華種植鴉片，則英印國庫會遭受嚴重的損失。英國政府表面上主張自由買賣毒藥，暗中却保護自己對於鴉片生產的壟斷權。當我們詳細考察英國自由貿易底本性時，我們到處都能看到它的『自由』底基礎差不多就是壟斷。

馬克思作，發於一八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五四三八期『紐約每日論壇』上。並未署名。

中英條約（第一篇）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亨利·波廷格爾爵士所訂立的『中英條約』，也和新近與中國訂立的各條約一樣，是在砲口底威嚇之下訂立的。從商務觀點上看來，這個條約有了不好的結果，這是事實，——甚至英國自由貿易派富有威望的機關雜誌——『經濟學家』，現在都承認了這個事實。這個雜誌，曾深信不疑地起而讚揚不久以前侵略中國的舉動，但現在它却覺得自己應該『節制』其他各界人士所抱的熱烈希望。『經濟學家』雜誌，認為一八四二年條約對於英國對外貿易的作用，就在於該條約是『一種先例，指示我們應當避免那種不正當的軍事動作的惡果』。這自然是很慎重的。但是威爾遜先生舉出理由來解釋，爲什麼第一次

用武力擴大中國市場使西洋商品得以流入的企圖遭到失敗，這種理由，是決不能使人信服的。

他說：在波廷格爾訂立條約後頭三年中，中國市場上曾因投機事業而發生商品過多的現象，同時英國商人又不注意中國需求底性質，這兩件事實，是引起這個嚴重失敗的第一個重要原因。英國對華的輸出，在一八三六年達到一百三十二萬六千三百八十八英鎊，而在一八四二年却低落到了九十六萬英鎊。此種輸出，在此後六年中如何迅速而一往直前地增長，這可從下述的數字中看出：

一八四二年 九六九、〇〇〇英鎊

一八四三年 一、四五六、〇〇〇英鎊

一八四四年 二、三〇五、〇〇〇英鎊

一八四五年 二、三九六、〇〇〇英鎊

可是在一八四六年，對華輸出底總額，不僅降到了一八三六年的水平以下，而且除此以外，一八四七年危機時期從事對華貿易的倫敦商行底倒閉還證明了：

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六年對華輸出總額底名義價值，即如官場報告表中所載明的價值，完全與實際價值不相符合。這樣看來，如果英國輸出尚在銷售給中國人的商品底數量上固然有了失算，而且，他們在商品種類底挑選上也同樣有了失算。爲證明後一種說法起見，『經濟學家』就引出培克先生——前倫敦『泰晤士』報駐上海和香港的通訊員——底下面一段言論：

「在一八四三、一八四四和一八四五年，北方各商埠剛開放的時候，英國商人就發生異常興奮的情緒。雪萊爾德一個有名的高行當時同華輸出大批西人吃飯用的刀和叉，並聲明它決計把這種商品供給全中國。它當時出賣這種商品所得的，幾乎不能抵償運費底價值。另一個極著名的倫敦商行向華輸出了大批的鋼琴，這些商品也遭受了這種厄運。刀叉和鋼琴所遭到的厄運，毛織布和棉織布也同樣遇到，不過不那樣顯而易見罷了。在開放了各商埠的時候，曼徹斯特盲目地作了一番極大的努力，可是這番努力却遭受了失敗。從那個時候起，這個城市陷入了蕭條的狀態，而祇希望偶然碰到機會。」

最後，『經濟學家』雜誌證明貿易底減少、穩定和興旺要以考察消費者之需求為轉移，它爲了證明這一點起見，還引用了上述那位作者所作的一八五六年的報告表。

	一八四五年	一八四六年	一八五六年
毛織布(疋數)	13,569	8,415	74,428
織貢呢	13,371	8,031	4,470
嗶嘰	91,530	75,784	36,642
毛織品	62,761	56,936	88,588
印花布	100,615	81,150	281,784
染色布	2,908,126	1,851,740	2,817,624
棉紗(以英磅計)	2,630,038	5,324,050	5,570,000

但是，這一切理由和例證，除表明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五年當中過於膨脹的貿易以後所起的反應作用以外，再不能夠解釋什麼問題。這種現象，完全不是對

華貿易所特有的現象。這種現象底實質，就在於貿易底驟增，接着就是貿易底驟減，或者就在於：當開闢新市場的時候，新市場上商品過於充斥，輸出商品時，並不精確地估計到消費者底實際需要和購買能力。實際上，這是世界市場史上永久不變的現象。拿破崙倒台以後，當歐洲大陸開放的時候，由英國輸出的商品，與歐洲大陸底銷售能力竟這樣不相稱合，致使「戰爭之轉到和平」倒比歐洲大陸封鎖英國的經濟政策本身有了更不好的結果。甚寧之承認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獨立，也曾引起了一八二五年的商業危機。適應莫斯科那種氣候而製造的商品，當時曾運往墨西哥和哥倫比亞。最後，那怕現在這個時代怎樣隨機應變，然而，連澳大利亞都沒有能夠逃脫一切新市場所同遭的厄運：市場的供給大大超過了消費能力和支付能力。中國市場所特有的現象，就在於自從根據一八四二年條約而將中國市場開放以來，中國絲茶向英國的輸出額日益增長，而英國布疋對華的輸入額，整個講來却沒有變化。中國在中英貿易中總是佔優勢，而且這種優勢不斷增長，這與英俄之間的貿易狀況相同，不過在後種情形中，一切都是由於俄國施行

保護關稅政策所致，而中國的進口稅却較與英國通商的任何國家爲低。在一八四二年前，中國對英輸出底總價格，約及七百萬英鎊，在一八五六年，却達到了九百五十萬英鎊左右。但是輸入英國的茶葉總數量，却從未超過五千萬鎊。在另一方面，中國絲向英國的輸入額，祇是在一八五二年才有了巨大的意義。這種輸入額增加的情形，可從下列的數字中看出：

年 代	絲底入口額 (磅單位)	其價值 (英鎊)
一八五二	二、四一八、三四三	
一八五三	二、八三八、八四七	
一八五四	四、五七六、七〇六	三、三一八、一一二
一八五五	四、四三六、八六二	三、〇一三、三九六
一八五六	三、七二三、六九三	三、六七六、一一六

我們現在根據下列的數字來考查英國對華輸出額底變動：

年 代

英鎊

在一八四二年市場開放和英國取得香港以後的時期中，我們有下列數字：

年 代	英鎊
一八四五	二、三五九、〇〇〇
一八四六	一、二〇〇、〇〇〇
一八四八	一、四四五、九五〇
一八五二	二、五〇八、五九九
一八五三	一、七四九、五九七
一八五四	一、〇〇〇、七二六
一八五五	一、一三二、二四一
一八三四	八四二、八五二
一八三五	一、〇七四、七〇八
一八三六	一、三二六、三七八
一八三八	一、一二〇、三五六

『經濟學家』雜誌企圖用外國競爭來解釋英國布疋對中國市場輸入底停滯和相對的減少，並且援引枯克先生的言論為證明。據這位有威望的枯克先生講來，英人在中國市場上，在許多商業部門內，都因競爭而遭受失敗。他說，美國人在輸出粗布和被單布到中國去的事情上，打垮了英國人。在一八五六年，輸至上海的，有二十二萬一千七百一十六疋美國粗布，而英國的，却祇有八千七百四十五疋；有一萬四千四百二十疋美國細棉布，而英國的，却祇有一千二百四十疋。另一方面，在毛織品方面，據說德國和俄國大大地排擠着他們的競爭者——英國商人。除這些例子外我們用不着別的證明，就是以相信，枯克先生以及『經濟學家』雜誌對於中國市場的估計是錯誤了。他們將某些特點專門加到中英貿易上面去，其實中美貿易也帶有這些特點。在一八三七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超過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約及八十六萬英鎊。在一八四二年條約成立以後的時期中，美國每年平均得到二百萬英鎊的中國商品，而輸到中國去的商品則祇有九十萬英鎊。

一八五五年上海的輸入總額，達一百六十萬零二千八百四十九英鎊（現金和鴉片不在內）；其中英國所佔有的份額，爲一百一十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一英鎊；美國所佔有的份額，爲二十七萬二千七百零八英鎊；其他國家所佔的份額，爲二十萬零七千九百英鎊。然而上海的輸出額，則達一千二百六十萬零三千五百四十英鎊；其中英國所佔有的份額，爲六百四十萬五千零四十英鎊；美國所佔有的份額，爲五百三十九萬六千四百零六英鎊；其餘國家所佔有的份額，爲十萬二千零八十八英鎊。我們只要把美國輸至上海的出口額（價值二十七萬二千七百零八英鎊）與美國超過五百萬鎊的輸入對比一下。假使美國的競爭不管上述的情形而終於使英國的商業受到某種重大的損失，那末，這是表明中國市場對於外國全部的商業是非常有限的。

最後，人們還舉出一個原因來解釋，爲什麼自一八四二年中國入口市場開放以來，中國入口市場之意義這樣微小，他們說，這個原因就是中國革命。可是，一八五一至一八五二年對華的輸出額，在貿易一般增長的情況之下，曾不顧中國

革命之影響而相對增長了，並且鴉片貿易，在發生革命的整個時期中，不但沒有衰落，反而迅速提高。無論如何，至少應該承認一件事實，就是由於最近這次海盜式的戰爭和清朝所遭受的屈辱的緣故，中國境內的紛亂對於外貨輸入所造成的
一切阻礙，定會增加而不會減少。

仔細考查中國貿易史的結果，我們覺得中國人底消費能力和支付能力一般地說來會被人誇張過甚。現時中國社會底基本核心是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在中國社會現有經濟制度底範圍以內，談不到什麼外貨底大宗輸入。可是中國畢竟能逐漸消費比現時更多的英美商品，其數量可達到八百萬英鎊，即等於中國對英美貿易中的出超總額，（約略的計算起來）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鴉片貿易應被取消。從下面這個簡單的事實中，就一定作出以上的結論，這個事實就是：雖然有出超的商業，而中國的財政和金融，因鴉片輸入總額約達七百萬英鎊之多而陷於厲害的破壞狀態。

但是慣於誇耀自己道德高尚的英國人，却寧願用海盜式的藉口經常向中國勒

索軍事賠款來彌補自己商業底入超。他祇是忘記了：迦太基式的和羅馬式的榨取異邦資財的方法兼取並用，這必然會引起這兩個方法之間的相互衝突和相互消滅。

馬克思作。一八五八年十月五日『紐約每日

論壇』第五四四六期上的社論。並未署名。

中英條約（第二篇）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正式簽字

英國外務部，終於正式發表了中英條約底撮要，這個撮要，大體上祇是稍稍補充了輿論界早已由其他方面得來的消息。實際上，條約中第一款和最後專條，包含祇對於英國有利告關係的條款。根據第一款底規定，『南京條約』成立以後所規定的『善後舊約和通商章程』『作爲廢紙』。以前這個善後條約曾規定：香港和五個爲英國商業開放的高埠中的英國領事，凡遇裝載鴉片的英國輪船抵港時，必需幫助中國當局處置此項案件，這樣，當時的條約中在形式上是禁止了英國商人輸入這種偷運的毒藥，而英國政府在某種程度內是坦負了中國海關官吏底職

務。第二次鴉片戰爭底結果，解除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對於鴉片貿易所加的表面上的桎梏，這在那些特別熱心歡迎巴麥斯頓擊廣州城的英國商界看來，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結果和希望得到的成績。可是，如果以為英國這種正式放棄阻止（雖然本來就是假阻止）鴉片貿易的行動，不會引起與原來的希望完全相反的結果，那就大錯而特錯了。中國政府當時責成英國政府協助取締鴉片貿易，這樣，中國政府即承認了自己不能專靠自己的力量來達到這個目的。當時補充的『善後條約』，乃是企圖藉外人底幫助來制止鴉片輸入的、最後一次的和拚命的努力。既然這種努力也遭了失敗，而且現時已被公開承認失敗，既然鴉片貿易現在已被法律所允許，（法律允許英國販賣鴉片）那末，中國政府將試行那種從政治上和財政上設想都同樣要求中國政府施行的辦法，即是頒布法令允許在華種植罌粟並徵收外國鴉片底關稅，這是未必可以懷疑的。無論現時中國政府底主張怎樣，中國政府因『天津條約』而陷入的情況，本身就要它實行這個辦法。這個辦法一經施行，印度的鴉片壟斷以及印度的國庫一定要受到致命的打擊，而英國鴉片貿易會

縮小到通常貿易底範圍並會很快地成爲虧本的貿易。在此以前，這會是英國利用假紙牌來進行的賭局。因此第二次鴉片戰爭底最明顯的結果大概就是：這次戰爭不會達到自己的目的。

寬懷的英國對俄宣佈了『正義戰爭』，但在訂立和約時，曾拒絕要求任何軍事賠款。另一方面，英國雖然不斷申明它與中國處於和平狀況，但是它不能不強迫中國給自己抵償這次戰爭底耗費，而這些耗費，甚至據英國現時許多國務大臣底意見講來，是由英國的海盜行爲引起的。可是當華人行將償付一千五百萬或兩千萬英鎊的消息一經傳出時，這種消息却安慰了『最清高的』英國人的良心。『經濟學家』雜誌以及財政問題論文底一切作者，都高興地去計算銀條對於商業出入對照和英國銀行現金存額所將發生的良好影響。然而可惜得很，巴麥斯頓派報紙曾竭力企圖給讀者造成的那些印象，原來却過於脆弱，經不起事情真相之揭露對於這些印象所給的打擊。

『專門條文規定』中國應償付『二百萬兩』抵償『英國商民因廣州當局底辦

理不善而遭受的損失，此外又償付二百萬兩抵償軍費」。這兩筆款項總共等於一百三十三萬四千英鎊，而在一八四二年，中國皇帝會應償付四百二十萬英鎊，其中一百二十萬抵償曾被沒收的私運的鴉片，三百萬英鎊抵償軍費。由四百二十萬英鎊——再加上香港一島，降到一百三十三萬四千英鎊的小款項，這到底是一種很不好的交易，可是，最壞的東西我們還沒有講哩。中國皇帝說：既然你們不會與中國作戰，而祇與廣州一地作了『地方性質的戰爭』，那末，請你們自己去向廣東省索取損失費，我被你們的軍艦逼得不過會替你們估定這筆損失費了。當沒有取得這筆款項之前，你們的著名的斯特羅賓茲將軍可以估領廣州作為物質上的担保，並依舊使英國軍隊為中國婦孺所恥笑。與致勃勃的英國人，要得到這一百三十三萬四千鎊小款，却要忍受這些苛刻條件，始而覺得冤屈，終於放聲大哭起來。倫敦有一家報紙寫道：『不僅沒有可能將我們的五十三隻軍艦調回，使它們載滿幾百萬銀條凱旋而歸，而且我們還要遣派五千軍隊去重新估領和保守廣州並幫助海軍去進行那副領事所宣佈的這個地方性質的戰爭。可是這個地方性質的戰

爭，除了使我們的商業由廣州移到其他商埠以外，再不會引起其他的結果嗎？繼續進行這個戰爭，（地方性質的戰爭）不會使大部分的茶葉貿易落到俄國手裏去嗎？歐洲大陸以及英國本國不是要依靠俄國和美國去取得茶葉嗎？『英國人害怕『地方性質的戰爭』對於茶葉貿易會發生惡果，這種害怕心理，並不是完全無根據的。從馬克格里哥爾底商業調查表中可以看出：在英國第一次對華戰爭底最後一年內，俄國經過恰克圖運到了十二萬包茶葉，在『中英和約』成立後一年內，俄國對於茶葉的需要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五，總共祇購買了三萬包。無論如何，要佔領廣東，英人還得耗費偌大的款子，這種耗費大概會增加入超，使得第二次對華戰爭未必能彌補自己的耗費，——據愛美爾松先生底確當的說法，在英國人看來，這是空前未有的大失策。

條約上的第五十一款，曾載明英國侵略舉動底別一個大勝利，據這一款底規定，在中國當局所發表的任何正式文件中，對於英國政府和英國人，不得用『英夷』字樣。中國當局自稱『天朝』：英國並不堅持要求稱自己為神國或仙國，而

祇以在正式文件中除去『英夷』字樣爲滿足，這樣，它在中國當局心目中表示如何謙遜啊！

該條約的條文所給予英國商業享受的利益，英國的競爭者也都是享受了的，而且這些條文，在現時條件之下，祇是一種無定的允諾，大部分竟不及寫成該條約的毛皮紙所值的價值。第十款中規定一個條件：『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隻，俱可通商，惟現在江上下游，均有賊匪，除鎮江一年後立可通商外，其餘俟地方平靖，大英欽差大臣與大清特派之大學士尙書會議，准將自漢口溯流至海口各地，選擇不淪三口，准爲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因爲這一款底規定，英人實際上不能走遍中國全國的通商大道，不能走遍『這條唯一的路徑』，祇有沿這條路徑英人才能將自己的工廠製造品運往內地，——英國『晨星』報這樣說，是極正確的。如果他們能夠安分守己幫助皇帝政府將起義者逐出他們現時佔領的區域，那時他們或許能夠航行大江不過祇能駛抵特定的港口。至於開作商埠的新港口，那末，最初曾經宣佈的『一切』港口，現在除『南京條約』所規定的五個商埠

外，縮減到總共祇開放五個港口，這些港口，據倫敦一家報紙稱，『一般地說來都很遼遠或者是在島嶼上』。此外，還有一種騙人的思想，以為商業底發展是與開作商埠的港口數量成正比，——這個思想，現時應該拋棄。請看英國、法國和美國海岸上的港口，其中會發展成爲真正商業中心的，是何等稀少啊！在第一次對華戰爭以前，英人經商祇限於廣州。後來准許五口通商，然而這並沒有造成五個新的商業中心。而祇是使商務逐漸由廣州移至上海，——這一點可以從關於一八五六一八五七年各地商業狀況的國會藍皮書中下列一表（表見下頁）看出來。同時還應該記起一件事情，就是廣州的輸入額中，也包含着由廣州駁運至廈門和福州的商品額。

『條約中所規定的商務條件，不能令人滿意』，——巴麥斯頓底最下流的捧場者『每日電訊』所作的結論就是如此；同時，該報用嘻笑的筆墨描寫『該條約中最妙的一款』，就是：『英國公使將牢牢坐在北京，而某個中國大官將駐在倫敦，或許會邀請英國女皇赴阿爾別爾特·納依特街的跳舞會吧。』無論英國人在

這個玩笑中怎樣快樂，可是有一件事是毫無疑義的，就是：如果在北京真能伸張政治影響的話，那末，這正是俄國底影響，俄國因最近的條約得到了大與法國相等的領土，而且這塊領土底邊境大部分祇離北京八百英里。英國人進行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果就使俄國與中國訂立一個條約，該條約允許俄國航行黑龍江並在邊

由英國輸入貿易額

向英國輸出貿易額

輸入廣州的

輸入上海的

由廣州輸出的

由上海輸出的

年代	(銀元)	(銀元)	(銀元)	(銀元)
一八四四	一五、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七、九〇〇、〇〇〇	二、三〇〇、〇〇〇
一八四五	一〇、七〇〇、〇〇〇	五、一〇〇、〇〇〇	二七、七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四六	九、九〇〇、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〇〇	一五、三〇〇、〇〇〇	六、四〇〇、〇〇〇
一八四七	九、六〇〇、〇〇〇	四、三〇〇、〇〇〇	一五、七〇〇、〇〇〇	六、七〇〇、〇〇〇
一八四八	六、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八、六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四九	七、九〇〇、〇〇〇	四、四〇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一八五〇	六、八〇〇、〇〇〇	三、九〇〇、〇〇〇	九、九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五一	19,000,000	24,400,000	12,100,000	11,400,000
一八五二	9,900,000	21,000,000	6,500,000	11,500,000
一八五三	4,000,000	21,900,000	6,000,000	13,300,000
一八五四	3,300,000	1,100,000	6,200,000	11,200,000
一八五五	6,600,000	2,800,000	2,900,000	19,900,000
一八五六	9,100,000	8,100,000	6,100,000	25,400,000

疆區自由經商；英國人進行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果就使俄國取得了韃靼海峽和貝加爾湖之間最富足的廣闊領土。俄國早已渴望佔領這個區域，自俄皇阿勒克塞·米海洛維亦起到尼古拉第一止，俄人曾不斷地企圖取得這個區域，英國人想起這一點，決不能自慰。倫敦『泰晤士』報極沉痛地感覺到了這個打擊，所以當它登載從彼得堡傳出的極其誇大英國所佔便宜的消息時，故意將電報中說到據約將黑龍江流域讓給俄國的一段刪去。

馬克思作。登於一八五八年十月十五日

第五四五五期『紐約每日論壇』上。並未署名。

俄國在遠東之成功

法國和英國曾使俄國在塞佛斯托保遭受軍事上的失敗，現在俄國報復了法國和英國。雖然赫季松里斯半島上頑強持久的戰鬥，降低了俄國的國威，使俄國損失一塊不大的領土，但是俄國在戰爭結束後，仍舊處於顯然有利的地位。「病夫」底狀況已大大惡化；歐洲土耳其內的基督教人民——希臘人以及斯拉夫人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其努力地企圖擺脫土耳其的束縛而視俄國為自己唯一的保護人。毫無疑義的，在波斯尼亞、塞爾維亞、黑山和克里特島現在所發生的一切暴

動和陰謀中，都有俄國代辦們底作用。但是土耳其在戰爭中所暴露了的而爲和約義務所加深的毫無能力的狀況，本身就足以說明土耳其皇帝底基督教臣民中這種普遍的憤怒情緒。這樣，俄國以暫時犧牲一小塊領土爲代價——因爲十分明顯的，在一有可能時，俄國必將收回這塊領土，——而作了澈底實現其侵略土耳其計劃的一大進步。俄國在戰爭初期所抱定的目的，是要更加削弱土耳其，並實行自己對於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保護權；現在這種保護權之屬於俄國比任何時候都更確定，——關於這一點誰敢否認呢？

這樣，甚至在戰爭失利的情形之下，俄國還是佔了大便宜。但是俄國却不能不力謀補救，因此它選定了那一塊沒有人與他競奪勝利的地方，即選定了外交方面。在英國和法國進行代價甚大之對華戰爭的時候，俄國保持中立；祇是在戰爭快完時，它才出來干預。結果，竟使英國和法國對華作戰，祇是爲了俄國的利益。真正的，俄國在這個事件中的地位，是再順利不過的。這些動搖不定的亞洲帝國，一個一個地正變成歐人營業精神底犧牲品，我們這裏又看到這樣的一個亞

洲帝國，這個帝國，極其衰弱，極其殘破，它甚至沒有力量來渡過人民革命底危機，甚至武裝起義底劇烈爆發，在這個帝國內也變成了慢性的和顯然不可治療的痼疾。這個帝國，已極其腐化，它未必能够在什麼地方約束本國民衆或抵抗外國的侵入。當英人在廣州與中國下級官吏紛爭不決並在英國討論一個重要問題，討論葉名琛總督底行動是否遵照該國皇帝意旨時，俄人已奪取了黑龍江以北的領土和東三省黑龍江南岸底大部分土地，他們已在該地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測量了建築鐵道的路線並擬定了開闢城市和港口的計劃。當英國終於決計打到北京，法國希望得到某種利益而站到英國方面去的時候，俄國却乘機向中國奪得面積等於法德兩國的領土和長度等於多腦河的河流，同時還狡猾地出來充當衰弱的中國底公正保護者，而在訂立和約時，差不多當了中間人。如果我們將所訂立的各種條約比較一下，那末我們就應該承認，這次戰爭的結果，並非利於英國和法國而是利於俄國，這是非常明顯的。

戰勝者所得到的，而俄國以及美國均分得一份的這些利益，純粹是商業上的

利益，而且大部分完全是虛空的，——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了。在現時的條件之下，除了鴉片和某些東印度的棉花以外，對華貿易主要的仍應是中國商品——茶和絲——之輸出，這種輸出，多半以外國的需要為轉移而不以中國政府所給予的或大或小的便利為轉移。在『南京條約』未訂立以前，世界各國已能從中國購得絲茶，而在這個條約訂立以後，由於五個商埠開放的結果，廣州底一部分商業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商埠中差不多沒有什麼商業，而至少是有若干意義的唯一商埠——汕頭，却恰恰不在開放的五個商埠之列。至於揚子江上游商業底開放，那末，這種開放曾被機巧地延攔到中國皇帝在揚子江上游暴動區域內完全恢復自己政權的時候，即是說延攔到不可知的將來。可是關於這個條約底價值問題，還發生了別種的懷疑。某些人說中英條約第二十八款中所規定的子口稅之所以存在，祇是因爲華人不很需要英國商品，因此這種商品完全不曾深入內地，而某幾種足以滿足華人需要並經過恰克圖或西藏輸入的俄國紙，銷行各地甚至達於海濱。人們沒有注意到，如果這種子口稅是存在着的，那末，它們之施於俄

國商品，應和施於英國商品一樣。可是有一件事實終究是毫無疑義的，這就是：曾被特別派往中國內地的楊格羅夫·枯克先生，未能找到這種擬行徵收的『子口稅』，而在人們公開向他詢問這個問題時，他很莊重地承認說：『我們不悉中國實情，正和暗中摸索一樣。』在另一方面，在一封公佈的信內簡單而明瞭地答覆了『有沒有關於這種子口稅確實存在的材料？』這個問題，在那封信上說：『我無法給你們以你們所詢問的關於在中國確實存在子口稅的材料。』因此，除了下面這個十分不愉快的觀念，即額爾金爵士在要求賠償英國損失時，不會規定償款期限而將戰事由廣州移至北京以便訂立一個使英國軍隊由北京調回到廣州去作戰的條約，——除了這不愉快的觀念而外，英國人底腦子裏還發生了一種含糊的疑慮，以為英國本身將不能不從自己的荷包內出資償付條約中所規定的賠款，因為條約第二十八款將大大推動中國當局去對英國製造品規定百分之七點五的關稅，那時這種稅收，將遵照要求變為百分之二點五的進口稅。倫敦『泰晤士』報為使英國人不必過於深刻地考慮自己的條約起見，曾認為必須假裝自己極其仇恨

美國公使而開始加以猛烈的攻擊，說他破壞了英國底一切事務，雖然實際上他對第二次中英戰爭底失策毫無關係。

這樣，和約成立底結果——就英國的商業講來——產生了新的進口稅和許多的條件，這些條件，或者是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或者是華人所不能遵守的，因此在任何時候都有成爲新戰爭藉口的危險。英國沒有增多什麼領地，英國也不能提出這種要求，因爲這會成爲一種口實去使法國也提出這種的要求，——如果英國進行戰爭的結果却使法國在中國海岸上得到領土，這對於英國是完全不利的。至於俄國，那末，它的地位却完全不同。它除了分佔彷彿曾由英法獨佔的一切利益以外，還取得了黑龍江沿岸的全部領土，它絲毫不露形迹地佔領了這些土地。俄國還並不以此爲滿足，它已做到成立中俄劃界委員會。可是我們知道，握在俄國手內的這種委員會是什麼東西。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委員會在土耳其亞洲邊界從事活動的情形，這個委員會在二十多年內把土耳其底領土一塊一塊地割去，一直到這個委員會底活動爲最近一次戰爭所阻斷時爲止；現在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應從

新開始。其次，在中俄條約中，條文規定整頓恰克圖與北京之間的郵務。從前那種只有中國當局才能忍受的不經常的交通路綫，現在將變成根據法定權利實行的組織得當的經常的郵務交通。並擬定在兩個地點之間每月舉行一次郵務交通；約及一千英里的路程，祇須費十五天的時間；此外，在這段路程中，每三月將有一次駱駝的商運。但是很明顯的，華人或者不肯執行或者不能執行這個職務；既然郵務交通之權現時已賦予俄國，那末結果這種交通會逐漸轉入俄人之手。我們知道，俄人會怎樣經過基爾吉茲荒原而設立了自己的郵務路綫；我們毫不懷疑，經過幾年以後，相同的路綫將跨過蒙古大沙漠，那時英國統治中國的幻想將一去不返，因為俄國軍隊天天能夠開始向北京進發。

在北京設立常駐使館將有何種結果，這是不難想像的。請看一看君士坦丁堡或者鐵格蘭吧。凡是俄國外交和英國外交或法國外交相競爭的地方，俄國外交總是獲得效果。經過幾年以後，俄國公使會在離北京一月路程的恰克圖地方擁有充分強大足以達到任何目標的軍隊以及為直接調動軍隊而築成的鐵路，這一點誰能

够懷疑呢？這種俄國公使在北京一定是威武十足的，這一點誰能够懷疑呢？

俄國正迅速地成爲亞洲的頭等強國，它很快地會在這個大陸上將英國推到次要的地位去。中亞細亞底佔領和東三省之吞併，使面積與全歐（俄羅斯帝國本部除外）相等的土地歸俄國所有，使俄國由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進到溫帶。在今後不久的時間內，中亞細亞各種江河流域和黑龍江流域，會由俄國移民屯居。這樣獲得的戰略陣地對於亞洲的重要，正和波蘭對於歐洲的重要一樣。土耳其斯坦底佔領足以威脅印度，東三省底佔領足以威脅中國，而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和印度現時是亞洲的有決定意義的國家。

恩格斯作。登於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五四八四期的『紐約每日論壇』上。並未署名。

新的對華戰爭（第一篇）

當英國得以從中國人民方面搶得『天津條約』而到處受人慶祝的時候，我曾設法指明：實際上從海盜式的中英戰爭中取得實利的唯一強國是俄國，而英國根據條約所得到的商業利益是很微小的；同時我在當時又說過：這個條約，從政治上的觀點看來並不能鞏固和平，它使戰爭必然重起。事變底進程，完全證實了這個觀點。『天津條約』已成過去的歷史，在戰爭的森嚴情況之下，和平的景象已經烟消雲散了。

首先讓我們來敘述最近歐陸郵電傳來的各種事實。

可敬的普魯斯先生，已偕同法國的全權代表布爾布隆先生起程出發，英國遠

征艦隊已得到命令沿白河西進，護送兩國公使進京。該遠征艦隊是由海軍將領阿布統率的，編入該艦隊的，有七隻輪船、十隻江艦、兩船兵士和軍糧以及幾百陸戰隊和英國工兵隊。華人方面，反對公使經由這條道路進京。因此海軍艦隊長阿布到白河口時，見白河已被大木頭和木椿所阻塞；阿布在河口停留了九日——由六月十七日至六月二十五日，在兩國公使於六月二十日趕上該海軍艦隊以後，他就企圖用武力開路前進。海軍艦隊長進到白河時，才知道在最近一次戰爭中所拆毀的大活砲台，已經恢復了，——我們應附帶地指出，這個事實，海軍艦隊長早應知道，因為『京報』上記載過這個事實。

六月二十五日，英人企圖用武力進攻白河口時，約有二萬滿清軍隊做後盾的大活砲台，居然出現而向英國艦隊實行猛烈的轟擊。陸戰水戰，同時並作，結果，進攻者完全失敗，遠征隊祇得退却。在這次戰鬥中，英國戰艦沉沒三艘：『海鷗鷺號』、『破風號』和『呼潮鳥號』，死傷四百六十四人，當時，參加作戰的六十個法國人當中，死傷十四人。英國軍官死五人，傷二十三人，甚至海軍

將領阿布也受了傷。此次失敗以後，普魯斯和布爾布隆兩先生就回到了上海，而英國艦隊，就不得不停泊在寧波附近的鎮海對面。

當這些不愉快的消息傳到英國時，擁護巴麥斯頓的報紙就馬上大作咆哮，一致要求實行充分的報復。不錯，倫敦的『泰晤士』報在慫恿本國人民流血行動時還設法保持外表上的和藹態度，但巴麥斯頓派的下流報紙曾荒謬絕倫，一味主張戰爭。

例如倫敦『每日電訊』寫道：

『大不列顛應攻打中國沿海各地，佔領京城，將皇帝逐出皇宮並得到物質上的保證，担保以後不再發生襲擊……。我們應該鞭打每一個穿蟒袍而敢於侮辱我國國徽的官吏……；應該把這些人（中國將軍們）個個都當作海盜和兇手，吊在英國軍艦底桅桿上。』

『把這般渾身絛鈕滿面殺氣、穿着丑角服裝的壞蛋，吊在桅桿上示衆，藉風煽動，倒能警戒人心。無論如何應該實行恐怖手段，再不能從容了！……應該教

謂華人重視英人，英人高出於華人之上，英人應成爲華人底主人翁……。我們至少應該奪取北京，如果採取更勇敢的政策，則應於奪取北京以後永遠佔領廣州。我們能把廣州保留在自己手裏，和我們現在領有加爾各答一樣，我們能够把廣州變爲我們遠東商業底中心，來抵抗俄國在中國東三省邊境所已取得的勢力，並奠定新領地底基礎。」

然而我們姑且擱下巴麥斯頓派賣文字者底這些放肆言論而論到各種事實，以便根據現有一點材料來說明這個不快事件底真實意義。

即使『天津條約』規定允許英國公使立即前往北京，此地首先應該回答一個問題：如果中國政府反抗英國艦隊用武力駛入白河，那末中國政府是否破壞了這個條約，破壞了這個用海盜式的戰爭逼迫中國政府接受的條約呢？

據歐洲大陸的郵電傳來的消息，中國政府當時並不反對外交使節前往北京，可是反對英國軍艦護送公使由白河西進，中國政府曾經請普魯斯先生由陸路入京，無須用兵力護送。中國人民因爲清清楚楚地記得不久以前砲擊廣州的事件，

所以，認爲這種兵力是實行侵略的工具。難道法國公使留駐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法公使以率領法國遠征隊武力侵入泰晤士河的權利嗎？

這裏應該承認：英人如此解釋英國公使前往北京的權利是極其奇怪的。在上一大對華戰爭發生時，英人曾存了一個發明，說砲擊中國的一個城市，這不是與中國本身作戰，而祇是與中國一個省份發生地方性質的衝突，——前種解釋與後種發明至少是同樣奇怪的。據英人自己的記載，爲對付華人所提出的要求賠償損失起見，英人『曾採取一切辦法，以便在必要時用武力進抵北京』，就是說統率威武十足的艦隊由白河西進。即使華人應該讓英國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華人抵抗英人底武裝遠征隊，毫無疑義地也是有理的。華人這種行動，並沒有破壞條約，而祇是破壞了英人的侵略企圖。

第二個問題是：雖然『天津條約』賦予英國以設立使館的抽象權利，但是額爾金爵士難道沒有至少在目前時期拒絕實際應用這種權利嗎？

如果，翻閱一下『英皇特諭刊行的關於額爾金伯爵專使赴華的文件』，每個

公正無私的人都能深信：第一，允許英使前往北京原不應於現時實行，而應於較晚的時候實行；第二，英使留駐北京的權利，是以各種條件為轉移的；最後，第三，英文條約底本中關於允許公使前往北京的一條，即有絕對意義的第三條，會根據中國代表底要求，在中文條約底本中加以修改了。額爾金爵士本人也承認條約兩個底本之間的這個參差之處。但是額爾金爵士——就據他本人的話講來——「根據自己所得的訓令，會不能不要求華人採用他們一字不識的條約底本，作為務須遵守的國際條約底本。」華人的行動不是根據英文條約底本而是根據中文條約底本的，同時據額爾金爵士底承認，英文條約底本與「條約底稿確意思」本來稍有出入。試問能否根據這一點就來斥責華人呢？

在結束本文時，我要援引前任駐香港的英國財務代表齊斯霍姆恩斯第底正式聲明，他在致倫敦『晨星』報經理的信中寫道：

「無論這個條約是怎樣的，但既然英政府及其官吏採取了強力行動，它早已失了效力，因在英國方面，至少是喪失了這個條約所賦予他的優先權和特權。」

印度的糾紛，使英國不斷地感受不安，同時英國不能不極力武裝自己以備歐洲戰爭之發生，而在中國發生的新變故——這大概是巴麥斯頓自己幹出來的——也許會使英國受到巨大的危險。其最近將來的結果應當是：現政府倒台，因為，該政府底首領是最近對華戰爭的罪魁，而該政府中的主要閣員却因這次戰爭而指斥了該政府底首領。至少，米勸爾·吉卜生先生和曼徹斯特派應該採取下列行動：或者是退出現有自由派的聯合政府，或者是——這很少有實現的可能——與約翰·洛西爾爵士、格拉斯頓先生及其同伴們比爾派聯合，逼迫自己的領袖服從他們的政策。

馬克思作。登於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紐約每日論壇』第五七五〇期上。並未署名。

新的對華戰爭（第二篇）

一八五九年九月十三日作於倫敦

閣議定於明日舉行，以求決定應付中國事變的行動方式。法國『新聞報』和倫敦『泰晤士』報底言論，使人關於巴麥斯頓和拿破崙第三將採取的決定，不能有任何的疑問。他們還要舉行一次對華戰爭。我從可靠方面得到一種消息，說米勒耐·吉卜生先生擬於行將舉行的閣議上採取這樣的態度：第一，辯駁主戰的理由；第二，反對未得國會兩院同意以前宣佈戰爭；如果他底意見不為列席多數閣員所採納，他即退出內閣，這又是一個向巴麥斯頓政府施行新攻擊的信號和使自由派聯盟瓦解底信號，這個聯盟，從前曾引起德爾比內閣底辭職。據說米勒耐。

吉卜生先生行將發表的言論，引起巴麥斯頓相當的不安，因為在巴氏同僚中，祇有吉卜生能引起巴麥斯頓相當的畏懼，巴氏曾不止一次地說吉卜生這個人特別善於『破壞』自己政敵底『信用』。大概在你們收到此信時，同時會從利物浦接到關於閣議結果如何的消息。而現時評斷實際情況，最好不要根據報上發表的材料，反之，倒要根據巴麥斯頓底報紙在發表歐洲大陸郵電傳來的消息時所故意瞞過的那些事實。

總之，第一，他們瞞過了一個消息，這個消息就是：中俄條約已經批准，中國皇帝已經諭令自己的官吏迎接美國公使並引領美國公使入京，以便交換中美條約底已經批准的底本。其所以瞞過這些事實，是要使一種完全自然會產生的疑慮不致發生，這種疑慮就是：俄美公使在執行自己的使命時，並未遇到阻礙，而英法公使，却遇到了阻礙，因此應對此種事件負責的不是北京朝廷，而是英法公使。另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最初亦為『泰晤士』報和巴麥斯頓派的報紙所瞞過，可是它們現在已經宣佈了這個事實，這就是：中國當局會表示願意引領英法公使

前往北京，說中國官吏現時已在白河口底一個地方等待英法公使到來並担任保護他們的責任，祇要英法公使同意離開自己的軍艦和軍隊。既然『天津條約』中並沒有明文規定英人和法人有遣派艦隊進入白河之權利的條文，那末，非常明顯的，破壞條約的並不是華人而是英人，英人早已決定在未到交換批准約文的預定時期以前，即找到發生爭執的藉口。誰都不以為普魯斯先生會企圖掩飾最近一次對華戰爭所抱定的完全明顯的目的，而由他自己負責行動，恰恰相反，他祇是執行了他從倫敦得到的祕密訓令。不錯，普魯斯先生，並不是由巴麥斯頓派出而是由德爾比派出的，可是，這裏我應當提醒你們的，就是在羅伯特·比爾爵士成立第一次內閣，愛比爾登爵士任外交大臣的時候，英國駐馬德里公使亨利·布里菲爾爵士，曾尋找與西班牙王室發生爭執的口實，結果，他不能不離開西班牙；在參議院討論這個『不幸事件』時，曾經證明了：布里菲爾並未服從愛比爾登底正式訓令，而是遵照當時處於在野派地位的巴麥斯頓底祕密訓令而行動的。

在最近幾天內，巴麥斯頓底報紙玩弄一種手腕，這種手腕，至少使那些知道

最近三十年來英國外交祕史的人們毫不懷疑地斷定誰是白河慘案和勢將爆發的第三次中英戰爭底真正罪魁。『泰晤士』報暗示道：大沽口安設的大砲，使英國艦隊受了極大的損害，這些大砲是由俄國製造並且是由俄國軍官指揮的。巴麥斯頓底別一個機關報，還說得更其明顯。現在我們且引出下述一段議論：

『現在我們知道，俄國底政策與北京底政策如何緊密地相互錯綜着：我們在黑龍江一帶看到極積極的活動；我們看到大隊的哥薩克兵遠在貝加爾湖以東、在冰天雪地的奇異地方、在老大帝國底陰暗邊境上走動；我們發現無數駱駝隊底足跡；我們看到俄國專使木喇夫岳福將軍（東西伯利亞總督）如何遵照祕密計劃由東西伯利亞底遼遠地帶來到閉關自守的中國京城；如果我國輿論想到我們之遭受失敗和我們海陸兵士之陷於死亡，一部分是由於外國人參加的影響，那自然是會怒氣沖天的。』

這一切都不過是巴麥斯頓底一種老伎倆。當俄國想同中國訂立商約的時候，巴麥斯頓却進行鴉片戰爭使中國投入該國北方鄰邦底懷抱中去。當俄國要求割讓

黑龍江的時候，巴麥斯頓舉行了第二次對華戰爭，使俄國底願望見諸實現。現時俄國想鞏固自己在北京的勢力，巴麥斯頓却挑動第三次對華戰爭。巴麥斯頓在其與亞洲弱國——中國、波斯、中亞細亞、土耳其——的一切來往關係上經常不變地抱定下列的方針，就是表面上反抗俄國計劃，同時却不去與俄國爭執，而去與一個亞洲帝國爭執，採用海盜式的襲擊方法使這個亞洲帝國離開英國，並這樣間接地使這個帝國不能不向俄國實行那些它本來不願意實行的讓步。你們可以相信，巴麥斯頓過去所採取的對於亞洲的政策，議院將重新加以審查，所以我請你們注意到根據一八三九年六月八日衆議院底命令而發表的『阿富汗文件』。從一切發表的文件中，從沒有一種文件能像『阿富汗文件』這樣明顯地表明巴麥斯頓那種產生惡果的政策和最近三十年來的外交史。簡單地講來情形如下：一八三八年巴麥斯頓開始舉行戰爭，反對喀布爾底執政者——多斯特·謨罕默德，結果英軍完全覆沒。他舉行這個戰爭底藉口，是說多斯特·謨罕默德和波斯以及俄國訂有祕約反對英國。爲證實這種斷語起見，一八三九年巴麥斯頓曾將一卷『藍皮書』

送交國會，這卷藍皮書中的主要內容，就是英國駐喀布爾代表亞力山大·伯恩斯爵士與加爾各答政府之間的來往文件，在喀布爾發生暴動以反對英國侵略者時，伯恩斯被殺，他生時因不信任英國外交總長，曾將自己某些正式的文件草稿寄到倫敦給自己的兄弟伯恩斯博士。一八三九年由巴麥斯頓所編成的『阿富汗文件』發表時，伯恩斯博士就起而責備巴氏『刪改已故亞力山大·伯恩斯爵士底文件』，伯恩斯爲證明自己的聲明起見，就發表了亞力山大·伯恩斯文件底某些原稿。可是這一切情形，祇到去年夏天才暴露出來。在德爾比內閣存在時，衆議院曾根據加菲爾德先生底提議命令將關於阿富汗的一切文件完全發表出來，而執行這個命令的方式，就使得最愚鈍的人們都明瞭：指斥巴麥斯頓爲俄國利益計而刪改文件的這種責備是正當的。第三次『藍皮書』底第一頁上，載有下述一段話：

『附註。在前次報告書中祇是局部發表的文件，本卷中已完全發表出來，而且前次所漏掉的地方，現在亦用（ ）符號表示出來。』

担保文件確屬真實的官員名字是「特·菲·開依，政治樞密部秘書」，開依先生，也是一個『研究阿富汗戰爭的公正歷史家』。

據巴麥斯頓講來，他因為反對俄國而舉行了阿富汗戰爭。爲要說明巴麥斯頓對俄國的真正態度，祇要舉出一個實例就夠了。一八三七年到喀布爾的俄國代表菲科維赤，曾將俄皇的信遞給多斯特·謨罕默德。亞力山大·伯恩斯爵士覓獲了這封信底一份抄本，並將這份抄本寄給了印度總督奧克林爵士。伯恩斯在他自己的通信中以及在他所附上的各種文件中，曾多次提到這回事情。可是俄皇信底抄本却不會列入一八三九年巴麥斯頓所提出的文件之內，而在每一次提到這封信的電報中，都會加以必要的更改，以求隱瞞『俄皇』與駐喀布爾公使之間曾有聯系的事實。這種偽造行爲，目的是要消滅那種證明俄皇與菲科維赤之間曾有聯系的證據，而在菲氏回到彼得堡時，尼古拉却認爲有正式聲明把責任卸在菲氏身上之必要。舉例來講吧：在第二次發表的『藍皮書』第八十二頁上可以找到致多斯特·謨罕默德信底譯文，譯文中載有下述一段話，同時括弧內的字句是表示當初

曾被巴麥斯頓刪去的話：

『俄國的（或者俄皇派來的）公使（由莫斯科）到了鐵格蘭，他得到命令要在康達加爾附近的森達爾地方等等，以便由此再向阿富汗國王的所在地進發。他隨身帶有（俄皇底密函和）俄國駐鐵格蘭公使底書信。俄國公使介紹，說這個人極其可靠並有全權（用俄皇名義和他自己的名義）進行任何談判等等。』

巴麥斯頓之所以實行這些和這一類的刪改是要保全俄皇底名譽，而這些刪改，並不是『阿富汗文件』中唯一的特色。巴麥斯頓辯護侵入阿富汗的行動，說亞力山大·伯恩斯爵士會主張侵入阿富汗作爲一種手段來破壞俄國在中亞細亞之陰謀。可是亞力山大·伯恩斯爵士底行動，却恰巧相反，因此他主張保護多斯特·讓罕默德的地位所作的一切呈文，在巴麥斯頓所編成的『藍皮書』中就完全被刪除了，而且所發表的文件，因故意刪改的結果，就有了與原稿完全相反的意見。現在藉口阻止俄國對華侵略而打算開始第三次對華戰爭的這個人底面目，就是如此。

馬克思作。登於一八五九年十月一號

『紐約每日論壇』第五七五四期上。並未署名。

新的對華戰爭（第三篇）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作於倫敦

英國行將舉行新戰爭以反對中國人民而擁護『文明』，這個問題擦差不多所有的英國報說來，大概已經定奪了。但是，自從上星期六閣議以來，正是在那些過去呼聲最高而要求流血的報紙上，却發生了顯著的變動。倫敦『泰晤士』報，最初顯然是表現愛國主義的狂熱而大發雷霆以反對兩重的背約行動：第一，怯懦的滿洲人曾努力改變自己陣地底外形，並掩蔽自己的砲隊而誘騙了直爽的英國海軍將領；第二，北京朝廷曾極其無恥祇顧目的不擇手段，而指使上述的吃人的滿洲人，利用他們那種可惡的軍事詭計。倫敦『泰晤士』報在熱情奮發中暴跳欲

狂，但在轉載正式報告書時，却終能非常仔細地把對於衆人所斥責的華人有利的
一切事實刪去，我們看到該報底這種情形，也覺得是很可笑的。在熱情奮發
時，可以淆亂事實，可是要捏造事實，却需要冷靜而清醒的頭腦。無論怎樣，
在九月十六日，祇在閣議前一日，『泰晤士』報已作了急劇的轉變而安然放棄了
自己所提出的兩種罪名之一。『泰晤士』報寫道：『我們恐怕不能責備會抵抗我
軍對白河砲台之攻擊的滿洲人』，可是『泰晤士』報同時却設法彌補這個不好意
思的讓步，而更憤怒地硬說『北京朝廷故意用狡猾手段來破壞條約』。在閣議後
三天，『泰晤士』報又根據新的理由，而認為『如果普魯斯和布爾布隆爾先生曾
堅持要求中國官員導引他們前往北京，則他們就能實現批准條約的手續，——這
是不容有懷疑餘地的』。既然這樣，那末還有什麼根據來責備北京朝廷底背約行
動呢？絲毫也沒有破壞條約的行動。但『泰晤士』報並不這樣想，它却有兩點懷
疑。該報論道：『當時企圖依靠這樣薄弱的艦隊，替自己開闢前往北京的道路，
把這種企圖當作軍事上的辦法，——這是否處置適當，也許值得懷疑。更可懷疑

的一個問題就是：當時一般地採用武力作爲外交上的辦法，是否妥當。」「居領導地位的機關報」在怒潮奮激之後，竟作出這樣不一定的結論；但是他却根據非常特別的邏輯，一方面不能指明開戰的理由，而另一方面却不放棄戰爭的本身。自從威爾生受任爲印度財長以來，別一個官辦機關報過去特別熱烈擁護過他擊廣州之舉動的『經濟學家』雜誌，現在也好像是進而採取少作花言巧語多作經濟考慮的觀點了。『經濟學家』雜誌關於這個論題載有兩篇論文，一篇帶有政治內容，一篇帶有經濟內容；第一篇論文結束時，作了下述的結論：

「總之，關於上述一切的考察，非常明顯地指出，規定我們公使有權前往北京或留居北京的條文，簡直是強迫中國政府接受的；如果以爲站在我們的利益上，十分須要應用這個條文，那末，我們認爲在當時要求履行這一條文時，却完全可以表現審慎而忍耐的態度。毫無疑義的，人們會向我們說：如果同中國這樣的政府來往時，採取延期和忍耐的態度，這就會被認爲是積弱的表現，因此這會成爲我們方面的不適當的政策。但是，根據這一點，我們是否有權利在我們同這些政

府發生來往時改變我們在同一切文明國家發生來往時所遵守的原則呢？既然我們會利用他們的畏懼心理而強迫他們去作他們本不願意實行的讓步，那末，我們仍應利用他們的畏懼心理，用對於我們最方便的手段去強迫他們立即履行已經訂立的條文，這或許會是最澈底的辦法。可是，如果我們這種辦法不成功，如果華人在這個時期中將克服自己的畏懼心理，而用相當的實力作爲自己言論之後盾，要求我們同他們商議履行條約的應有辦法，——那末，我們是否有根據來責備他們背約呢？他們對我們所採用的方法，正是我們自己所採用的說服方法，——這樣說難道不對嗎？中國政府曾打算引誘英國落入這個致命的陷阱而並沒有打算履行條約，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這種推測確是正確的，那末英國就應該要求賠償。可是保護白河口以防備去年那種武力侵略重新發生（去年的事件已由額爾金爵士處置妥當），這也許並不是打算破壞自己對於條約上一切條文所負的義務。既然進攻的主動完全出自我方，而我們司令官會能在任何時候將軍隊調出致命的砲火線以外（華人開火的目的祇是保護自己的砲台），那末我們就不能證明華人方面

曾有破壞自己約言的絲毫企圖。在我們沒有得到證據來證明確有破壞條約之圖謀以前，我們覺得我們是有根據暫時不要有什麼決定，並在這個時期內考慮一下：我們對付野蠻人時所採用的原則不是極像野蠻人對付我們所採用的原則嗎？」

在論到同一論題的第二篇論文中，『經濟學家』雜誌堅持英國對華貿易有重大的直接和間接的意義。在一八五八年，英國對華出口總額，達到二百八十七萬六千英鎊，同時英國由華輸入總額底價值，在最近三年內每年達到平均九百萬英鎊以上，因此中英間的直接貿易總額，約及一千二百萬英鎊。可是除了這些直接的來往關係以外，還有其他三種重要的貿易，英國經過交換而與這些貿易多少發生密切的聯系，這就是中印間的貿易、中澳間的貿易和中美間的貿易。

『經濟學家』雜誌寫道：『澳大利亞每年從中國購得大宗茶葉，可是不能輸出能够在華銷售的物品以爲交換。美國也向華購得大宗茶葉和相當數量的絲，絲茶的價值大大超過美國對華的直接出口額。』

這兩種中國商業出超，應由英國給以彌補，由於這種交換上的彌補，英國就

從澳大利亞取得金子，由美國取得棉花。因此，英國除中國出超數應加以償付之外，還須取給於澳大利亞輸人的金子價值和美國輸入的棉花價值而以大宗款項償付中國。英國、澳大利亞和美國付給中國的這筆入超額，大部分由中國轉注於印度，因為中國應以這筆款項去購買印度的鴉片和棉花。這裏我們順便地指出：中國輸至印度的輸入額從來沒有達到過一百萬英鎊，而印度輸至中國的輸入額則約及一千萬英鎊。『經濟學家』雜誌，根據這些經濟上的事實而作出結論，說如果英國對華貿易遇到什麼重大的破壞，那末，這是『極大的損失，這種損失比較祇根據出口額和入口額之數字而一眼看來所能看出的損失要大得多』，由這種破壞所引起的困難，不僅會表現在英國直接的絲茶貿易上，而且應『影響到』英國與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商業關係。在上一次對華戰爭發生時，軍事動作之妨害商務，未曾達到人們所慮及的那樣厲害的程度，在上海商埠中，甚至不曾感受到戰爭底影響，——這種情形，『經濟學家』雜誌自然是知道的。可是，這裏『經濟學家』雜誌注意到『現時爭論中的兩個新特點』，這些特點能切實地改變新的對華戰爭

對於商業關係的影響；這兩個新特點就是：第一，現時的衝突帶有『全國的』，而不是『地方的』性質；第二，在開始的時候，華人對於歐洲的武力獲得『很大的勝利』。

這種議論，和這個『經濟學家』雜誌在亞羅船事件發生時所作的那種挑撥的戰鬥號召比較起來是多麼不同啊！

在上次閣議上，米勒爾·吉卜生先生起來抗議戰爭並實行威嚇，說如果巴麥斯頓同意法國『新聞』報上的結論，吉卜生就退出內閣，——這一點正如我在我的上一篇通信裏所預見的一樣。巴麥斯頓暫時得以用自己的聲明來阻止了內閣和自由派聯盟底瓦解，他聲明道：雖然爲保護英國貿易所必需的軍力將集中於中國水面，可是在未接到英國公使更詳盡的呈文以前，關於開戰問題不會採取任何決定。這樣，這個緊張問題就被擱下了。但是，巴麥斯頓真正的用意，却在其權騙的機關報『每日郵電』底言論中表現得很明顯：該報在最近一期中寫道：

『如果某種事變使政府在最近一年內得到不信任政府的表決，那末，大概就

不能不訴之於選舉人了。衆議院將通過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來表明自己工作底結果，同時它將願計到，申明滿洲人完全有理的大同主義者應當歸入第七萊利先生所領導的搗亂分子之列。」

保守黨人會讓人將事件的責任加到他們的身上，而這些事件却是由巴麥斯頓主謀，而由巴麥斯頓兩個代辦：額爾金爵士和普魯斯先生（額爾金爵士底兄弟）所執行的；至於保守黨人，因為這個緣故所遇到的困難，那末，也許我還找得到機會來談論這一點。

馬克思作。登於一八五九年十月十日

『紐約每日論壇』第五七六一期上。並未署名。

新的對華戰爭（第四篇）

一八五九年九月三十日作於倫敦

我在過去的一封信上肯定地說過，白河衝突之發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額爾金爵士預先準備好了的；額爾金爵士遵照巴麥斯頓密示而行動，並要挾馬利姆斯伯里爵士——保守黨的外交大臣——採納當時充任在野黨首領的顯貴的子爵底計劃。第一，說中國『意外事件』之發生由於不列顛首相所下的『訓令』所致，這種觀點已不算新穎，因為在討論戰爭問題（由亞羅船事件引起的戰爭問題）的時候，衆議院裏面一位通曉真情的人物第士萊利先生已經說出了這種觀點，而且恰恰巴麥斯頓本人也證實了這一點——這是特別有興味的。一八五七年二月三日，

第士萊利先生用以下的議論來警告衆議院：

『我不能不相信，中國所發生的事件，不是此地所說的那種原因底結果，而實際上是好久以前從英國發出的各種訓令之結果。如果情形是這樣的話，那末，我覺得現在衆議院要是百般推託，不去認真研究一個問題，那就違背自己的天職。這個問題就是：衆議院有沒有方法來控制這樣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如果保持下去，依我看來足以危害吾國的利益。』

巴麥斯頓爵士用非常鎮靜的態度回答道：

『可敬的縉紳先生說，在他看來，事變底行程是英國政府預定的一種政策之結果。無疑的，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現在，我們約略看一下『藍皮書』中『關於一八五七至一八五九年額爾金伯爵專使赴華赴日之文件』，就會知道，六月二十五日發生的白河事件，是額爾金伯爵在三月二號就打定主意要實行的。在該書第四百八十四頁上，我們可以讀到下面兩個電報：

『額爾金伯爵致水師提督馬基·西穆爾電。一八五九年三月二日發於「猛烈號」輪船。』

『關於二月十七日我給貴將軍的電報，我敢作以下的聲明：我有幾許希望，認為英王政府關於英使常駐北京問題所通過之決定（在昨天的談話中，我已將該決定告知貴將軍），可以促使中國政府在英王代表駕臨北京交換『天津條約』批准文時，加以相當招待。同時，這種希望也許有不能實現之可能，因此我想，英王政府將願意在我國公使駕臨天津時有雄厚的軍力護送。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特請貴將軍解決一個問題：既然普魯斯先生到華日期不能久延，則在儘量短促的期限內將充分雄厚的巡江艦隊集中於上海以作此用，這一點是否妥當，請指教。』

額爾金和金家騰啓

『馬利姆斯伯里伯爵致額爾金伯爵電。一八五九年五月二日發於外交部。』

『我已接到貴伯爵在本年三月七日所發之電報，現應告知貴伯爵，即英王政府同意通牒（通牒底稿附後），貴伯爵曾在該通牒中告知中國皇帝欽差大臣，謂

英王政府將不堅持英使常駐北京。

英王政府亦同意貴伯爵向水師提督西穆爾所作之建議：將巡江艦隊集中於上海一帶，以便護送普魯斯先生由白河進京。

馬利姆斯伯里啓

總之，額爾金爵士知道，不列顛政府，『將願意』有『雄厚的兵力』——『巡江艦隊』來護送他的兄弟普魯斯由白河進京，因此額爾金爵士命令水師提督西穆爾實行準備軍力『以此用』。馬利姆斯伯里伯爵在其五月二日的電報中，同意額爾金爵士向水師提督西穆爾所建議之主張。來往的文件都表明額爾金爵士充當主人，而馬利姆斯伯里爵士則充當從僕。額爾金爵士經常站在主動地位，根據先從巴麥斯頓爵士方面得到的各種訓令而行動，甚至於不等對外交部新訓令之到來；而馬利姆斯伯里爵士呢，却心滿意足服從其有勢力的屬下所早已猜到的他心裏的『志願』，額爾金說，在條約未批准以前英人無權進入中國內河；馬利姆斯伯里聽了點頭贊成。額爾金以爲英人在履行關於駐京使館的條約時，對華人應持

更其容忍的態度；馬利姆斯伯里聽了也點頭贊成。額爾金公然違背其過去所作的聲明，而主張英人有權帶領『雄厚的巡江艦隊』攻入白河口；馬利姆斯伯里聽了也不加思索而就點頭贊成。他之點頭贊成，和道格伯里對於掘墓人提議之點頭贊成完全相同。

馬利姆斯伯里爵士之所以顯出可憐的樣子和唯命是聽的態度，其原因是不難找到的：當保守黨內閣上台執政的時候，『泰晤士』報及其他有聲望的報紙議論紛紛，說額爾金爵士正要遵照巴麥斯頓的指示在中國達到大成績，可是保守黨政府要實行與巴麥斯頓相反的政策，並證明保守黨責備巴氏轟擊廣州的決議是正確的，即使在這點上講起來，也要使上述成績歸於烏有。馬利姆斯伯里害怕這種議論，所以顯出可憐的樣子和唯命是聽的服從態度。同時他還沒有忘掉愛倫巴羅爵士底可憐命運。愛倫巴羅爵士竟敢公然反對顯貴的子爵之對印政策，並因自己愛國熱忱而做了德爾比內閣裏而同僚們的犧牲品。因此，馬利姆斯伯里就聽命於額爾金而放棄一切主見，結果使額爾金能夠履行巴麥斯頓底計劃，而將責任卸在巴

麥斯頓正式對手——保守黨身上。正是這一種情形，現在向保守黨提出了一個兩者之間必擇其一的麻煩問題：對白河事件究持何種態度。他們或者是和巴麥斯頓發表同樣的論調，這樣就是使巴麥斯頓繼續掌權下去；或者是和馬利姆斯伯里背道而馳，雖然在最近一次意大利戰爭的時候，他們對馬利姆斯伯里抱了令人厭惡的諂媚態度。

這個兩者之間必擇其一的問題，因為行將爆發的第三次對華戰爭很少得到不列顛帝國商界方面的同情，所以更難解決。一八五七年，商界願意實行戰爭，因為他們當時希望用武力開放中國市場以獲得巨大的商業利潤。現在正是相反，現在他們看到條約底一切果實忽然又從他們手裏搶去，自然覺得傷心。他們知道，縱使對華戰爭不致引起其他糾葛，歐洲和印度的局面本就危殆萬分。他們沒有忘掉，在一八五七年，茶葉底進口減少了二千四百萬英鎊以上，須知茶葉幾乎完全是從廣州輸出的，而廣州當時却是唯一的戰場，因此他們害怕由戰爭引起的商業停頓現在可以普及到上海及中國其他各商埠。既然英國人爲着私販鴉片而對華舉

行了第一次戰爭，既然英國人爲着保護某海盜船隻而對華舉行了第二次戰爭，那末，現在他們只有走到極端，硬要中國人容許各國公使常駐北京，再挑撥一次戰爭，故意使中國人忿恨。

馬克思作。登於一八五九年十月十八日

「紐約每日論壇」第五七六八期上。並未署名。

對華貿易

過去有個時候曾流行過一些最離奇的觀點，說由於中國門戶開放（當時是這樣說的）之故，美國和不列顛帝國商業的發展定會得到莫大的推動，但當時我們却提出了一個任務，就是去詳細考察十九世紀初期中國對外貿易情形而指出，這些虛張的希望沒有其可靠的根據。我們證明了，鴉片買賣之增加和西歐工廠製造品底銷路成反比例；除鴉片買賣以外，我們會認為中國進口迅速擴大底主要障礙是中國社會底經濟結構，中國社會底經濟結構，是由小農業和家庭工業配合而成的。爲要證實我們當時的斷語起見，我們現在，可以引證一卷『藍皮書』：『關於額爾金爵士專使赴華赴日之文件』。

當輸入亞洲各國的商品之實際銷路和假定銷路之預測（這種預測大半根據於極其約略的統計，如新國家——新市場疆土之大小、新國家人口底多寡、幾個頭等商埠對於外貨的銷售範圍等）兩不相稱的時候，力謀擴充交換範圍的商人，就認為自己失望底原因在於野蠻政府所故意造成的通商條件阻擋他們的道路，因此這些條件可用強力加以剷除。這種不正確的解釋，現時已使不列顛商人變成爲那些答應用海盜襲擊方法來強迫野蠻人締結通商條約的總長們底絕對擁護人。這樣一來，外國商業從中國當局方面所遇到的障礙，即他們認為故意造成的障礙，就成爲一種重要的口實，來在商界面前袒護對中國所施行之每次橫暴行動。『藍皮書』中額爾金爵士所發表的寶貴材料，在一切毫無成見的人們底腦海裏足以打消這些危險的幻想。

『藍皮書』中載有一八五二年不列顛駐廣州代辦米特切爾致喬治彭特拉姆的報告書。從這個報告書中，我們引出下面一段話來：

『我們和這個國家（中國）所締結的通商條約到現時（一八五二年）約有十

年了，條約完全生效，而且各種可能的障礙都已剷除，替我們開放了一千英哩的新海岸帶，並在出產區域底門口和最便利的海岸上，都建立了新市場。然而，在我們工廠製造品的銷路之增長（過去所希望的增長）方面，究竟有什麼結果呢？簡單講來其結果如下：十年過了以後，商務廳底彙報指出：在亨利·波廷格爾爵士一八四三年簽訂善後條約的時候，當時的貿易範圍，比一八五〇年年底他締結條約的時候更加擴大些。而且這裏所指的是我們本國的生產品，就是說，我們在此地所注意的唯一對象。」

印度與中國之間的通商差不多純粹是用銀子換鴉片的交易。米特切爾先生承認，這種交易，從一八四二年的條約締結以來，已經大大地發展了；但關於這種交易，米特切爾也補充道：

「這種交易在一八三四年和一八四四年之間的發展速度，與一八四四年和本年之間的發展速度成正比例，而且第二個時期正是這樣一個時期，當時通商似乎是在條約保護之下進行的；另一方面，我們在商務廳底統計表中看到一件彰明較

著的事實，即在一八五〇年底，我們輸到中國去的工廠製造品，和一八四四年年底比較，幾乎減少了七十五萬英鎊。」

一八四二年的條約在促進不列顛對華輸出方面沒有任何影響，這一點可從下表看出。

報 關 的 價 值

年 代	棉織品	毛織品	其 他	總 計
一八四九	一、〇〇一、二六三	三七〇、八七六	一六四、九四八	一、五三七、一〇九
一八五〇	一、〇三〇、九二五	四〇四、七九七	一四八、四三三	一、七七八、一五五
一八五一	一、五八八、八三九	三七三、三九九	一八九、〇四〇	二、一六二、二六八
一八五二	一、九〇五、三二一	四三四、六二六	一三三、六三三	二、五〇三、五九九
一八五三	一、四〇八、四三三	二〇三、八七五	一三七、二八九	一、七九八、九九七
一八五四	六四〇、八三〇	一五六、九九九	二〇三、九九七	一、〇〇〇、七二六
一八五五	八三三、九八五	一三四、〇七〇	二九、八八九	一、一七七、九四四

一八五六 一、四四、三五 二六、六四三 四三、二四六 二、三六、二二
一八五七 一、七三、九〇九 二六、三五 四二、三三 二、四九、九三二

根據米特切爾底調查，一八四三年中國人對於英國商品的需求等於一、七五〇、〇〇〇英鎊。我們把上引的這些數字和一八四三年中國人對於英國商品的需求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在最近九年當中，有了五年，不列顛的輸出大大低於一八四三年的水平，而在一八五四年，輸出額祇佔一八四三年輸出額十七分之十。米特切爾先生首先用一些原因來解說這件驚人的事實，這些原因過於籠統，不能確切證明什麼東西。他說道：

『中國人的生活如此儉樸，如此守舊，以致他們穿着他們祖先穿過的衣服，就是說他們所用的只是必不可少的東西，其餘概不需要，無論向他們出賣的某種商品多麼便宜。每個中國勞動者的衣服至少要穿三年，不上三年不換新衣，而且這套衣服，雖做極粗縫的工作也能經穿三年。因此，這種衣服所需的棉花，比我們運到中國去的最重的棉織品所需要的棉花至少要重兩倍；換句話說，這種材料

要比我們可以運到中國去賺錢的最重的厚布還要重兩倍。」

節省消費，寧願穿着父親和祖父的古服——這些阻礙文明貿易的障礙物，在各個新市場中都可以遇到。至於講到粗布底緊密結實，那末，不列顛和美國的工業家難道不能使其商品適應中國人底特殊要求麼？但現在我們要講到本問題上最重要的一點。一八四四年，米特切爾先生將各種中國土布底料樣送到英國去，並註明各種土布底價格。英國商行接到米特切爾先生的信以後，就告訴他說，他們不能在曼徹斯特依照他所指定的價格製造這種商品，更不能輸送這種商品到中國去。世界上最先進的工廠出賣其工廠製造品，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織車上手織的土布便宜，這畢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我們上面已經指出過的那種小農業和家庭工業之配合情形，足以解答這個謎案。我們還是引舉米特切爾先生的話吧：

「收穫完結的時候，各農家的一切工作人，小的老的都去梳理棉花，紡紗、織布；這種家庭製造的、重笨而結實的、能够經受兩三年內粗糙穿用的土布，中國人就用來縫製自己的衣服，而把剩餘的土布拿到近城去出賣，城市商販就購買

這種剩餘土布去供給城市居民及內河船夫底需要。此地的居民，十個有九個是穿着這種土布製成的衣服。布料底質量，從最粗的印度布到最細的大布都有，這種土布，都是在農民小屋內織成的，生產者所費的簡直只是原料底價值，確切些說，只是他用土布換來的那種糖底價值，而這種土布却是他自己的產品。我們的廠主，只要稍微考察一下這個制度底這種駭人聽聞的節省性，考察一下這種制度與種田人的其他的經濟過程之聯絡關係，那末他們立刻就會相信：如果講到比較粗糙的製造品，那末他們就沒有任何希望與這種制度競爭。世界各國中，也許祇是在中國可以看到每個富裕的農家都有一架織車，這是值得注意的。在其他各國，人們祇限於梳理棉花和紡紗的工作，他們的生產過程到這裏為止，他們把紡成的紗交給織匠去織成布疋。祇有富裕的中國人，才一定要把一切手續做到底。中國人不僅要梳理棉花和紡成棉紗，而且還與自己的老婆和女兒以及家庭女工一起織成布疋；他的生產不僅只為自己家庭的需要，而且其一部分的工作時期是用來生產一定量的布疋去供給鄰城和內河的居民的。

『例如福建的農民不僅是一個農民而已。他又是種田人，又是小手工業者。他生產布疋簡直是不費分文的（如果原料底價值不算在內），他在自己農莊屋子裏而用自己的妻女和女工的手織成布疋；這種土布底織成，不費特別的勞動，也不費特別的時間。在田苗未熟的時候，在收穫完結之後，在天雨不能出外操作的時候，他就使農莊的工人紡紗織布。總之，一年當中祇要有一些空閒的時候，這個家庭勤勞底模範人物便從事生產什麼有益的東西。』

除了米特切爾先生這一段敘述之外，我們還值得來看額爾金爵士在其週遊揚子江上流時所看到的農民狀況，他寫道：

『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不得不這樣推想，即一般講來，中國鄉村居民是過着足衣足食的生活，滿意於自己的命運。我曾用各種方法想從他們那裏得到一些關於他們田地面積、擁有性質、納稅多寡以及諸如此類的可靠材料（不錯，我這種努力沒有得到特別的成績）。我得出了一個結論：他們往往擁有一塊極小的、完全私有的（不受皇上支配的）土地，他們每年不得不負擔一些不很繁重的負擔，

這些優點再加上他們的勤懇，就完全滿足他們那種儉樸的衣食上的需要。」

這種農業和家庭工業之配合，在長時期內曾妨礙了而且現在還妨礙着不列顛商品之輸入東印度，然而在東印度，這種農業和家庭工業之配合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底特殊情況上面的，英國人以國內至高無上的土地所有人底資格，曾有可能來破壞這種土地所有制之基礎，這樣去強迫印度一部分自給的村社變成簡單的農場，出產鴉片、棉花、靛青、亞麻以及其他原料去交換不列顛的商品。在中國，英國人現在還沒有達到這樣的雄厚勢力，而且將來也未必能達到這一點。

馬克思作。登於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三日

『紐約每日論壇』第五八〇八期上。並未署名。

中國事件

在桌子開始跳舞^①以前不久，在中國，在這塊活的頑石上，開始了革命醞釀。這個現象，就其本身講來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因為在東方各國，我們經常看到這種情形：社會基礎不發生變動，同時將政治上層建築奪到自己手裏的人物和種族則不斷更迭。在中國，現時當朝的是外族。滿清統治已有了三百年，爲什麼經過三百年以後不開始那種以推翻這個朝代爲目標的運動呢？目前的運動一開始就帶有宗教色彩，但這是東方各種運動所共有的的一個特點。引起風潮的直接

① 這是指一八五〇年代初，歐洲貴族界中很流行的「請仙扶乩」，使「桌子跳舞」。

原因顯然是：歐洲人的干涉，鴉片戰爭，因鴉片戰爭所引起的現時國家制度之震動，銀子外溢，因外貨輸入所引起的經濟平衡性之破壞以及其他等等。鴉片不會發生催眠的作用而倒發生了驚醒的作用，這是很矛盾的。在這次中國革命中，中國革命底代表才真是奇特哩。除了換朝代以外，他們沒有抱定什麼任務。他們沒有提出什麼口號。他們所給予民衆的驚惶比給予舊有當權者的驚惶還更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於用奇形怪狀的破壞，用全無建設工作萌芽的破壞來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對立。爲要形容這種『天災』起見，我們從卡爾維先生（寧波的英領事）給北京英公使普魯斯先生的一封信中摘引一些話。

卡爾維先生寫道：寧波在革命太平軍之手已有三個月了。此地和這些強盜們統轄的其他地方一樣，破壞便是他們統治底唯一結果。他們有沒有抱定其他什麼目的呢？在他們看來，自己握有無限權力，橫行無忌，這與消滅他人生命一樣重要。太平軍這種觀點，和英國傳道師的幻想完全不相符合，英國傳道師曾傳說太平軍將『解放中國』，『復興中國』，『拯救人民』及『推行基督教』。十年以

來太平軍那種喧曠一時和空洞的活動，把什麼都破壞了，什麼都沒有建設起來。

卡爾維先生接着又說道：不錯，和外國人發生正式來往時，太平軍比較中國舊官僚是要好些，他們的行動比較直爽和果斷；可是他們的優點祇盡於此。

太平軍如何供養自己的軍隊呢？他們的兵士得不到兵餉，而是以戰利品過活的。如果太平軍所奪得的城市是些富足的城市，那末兵士們就豐衣足食；如果城市是些貧乏的城市，那末他們就表現模範式的耐苦態度。卡爾維先生問過一個衣冠楚楚的太平軍兵士，問他喜歡不喜歡自己的職業。那個兵士答道：『爲什麼不喜歡，凡我所喜歡的東西我都拿來，誰要是抵抗，那……』——他作了一個手勢，表示『歛頤』的樣子。那的確不是一句空話。在太平軍看來，人頭不比菜頭貴些。

舊有的、服務多年而在游擊戰鬥中鍛鍊出來的正式軍隊，構成革命軍底核心。其餘的兵士是些新招來的青年或出征時強徵來的農民。統領們總是不斷地把某個已征服的省份內所徵來的隊伍派到其他遙遠的省份裏去。如在寧波，現時太

平軍所講的話有四十種各不相同的口音，而寧波口音則初次發現於其他遙遠的區域。地方上的一切流氓無賴都自願歸附太平軍。軍紀只要求兵士在服務時服從命令。太平軍禁止結婚和禁吸鴉片，違者處以死刑。只到『天下太平』時候才可以結婚。而在天下未太平以前，太平軍在佔城市以後三天之內，乘着市民來不及逃避的機會，有完全行動的自由，去強姦婦女。過了三天以後，追令一切女子都離開城市。

引起恐懼，這便是太平軍底全部戰術。他們的成功完全是看這個辦法是否發生效力為轉移的。他們嚇人的方法，首先就是在某一個地方，一下子出現大隊人馬。他們起初遣派探子去打聽消息，散佈驚人的謠言，到處放火，如果滿清官僚能抓住這些探子並處以死刑，那末立刻就有其他的人來代替，直到滿清官僚以及居民逃出城市為止，或是——如寧波地方所發生的那樣——直到所發生的驚惶現象促成暴動者獲得勝利為止。

最主要的嚇人方法，便是太平軍穿着五花八門的丑角穿的服裝。歐洲人看見

這種服裝只會置之一笑，而中國人却以為這是一種護身符。太平軍作戰的時候，這種可笑的服裝所給予他們的優勢比新式大砲所能給予的更要大些。此外他們還有一頭長而黑的或染黑的亂蓬蓬的頭髮，一雙瘋狂的眼睛，他們作出悲慘的叫喊，裝出兇惡的模樣——你看，這就足以把規矩端正的老實和氣的中國人嚇得死去活來。

隨着那散佈驚惶消息的探子而來的，還有故意從鄉下驅逐來的逃難人，他們也誇大行將到來的太平軍之人數、實力和兇猛。當城裏起火而城市駐軍在這種可怕的印象之下出城作戰的時候，從遠處就出現嚇人的光怪陸離的怪物，把防守軍嚇得魂不附體。在適當的時候，成千成萬的太平軍，就拿着大刀長矛和獵槍，向嚇得半死半活的敵軍作兇猛的衝鋒，只要不遇到抵抗（不久以前在上海就遇到過這種抵抗）就沿路殺打個乾淨。

卡爾維先生說道：

『太平運動實質上乃是一種完全空洞的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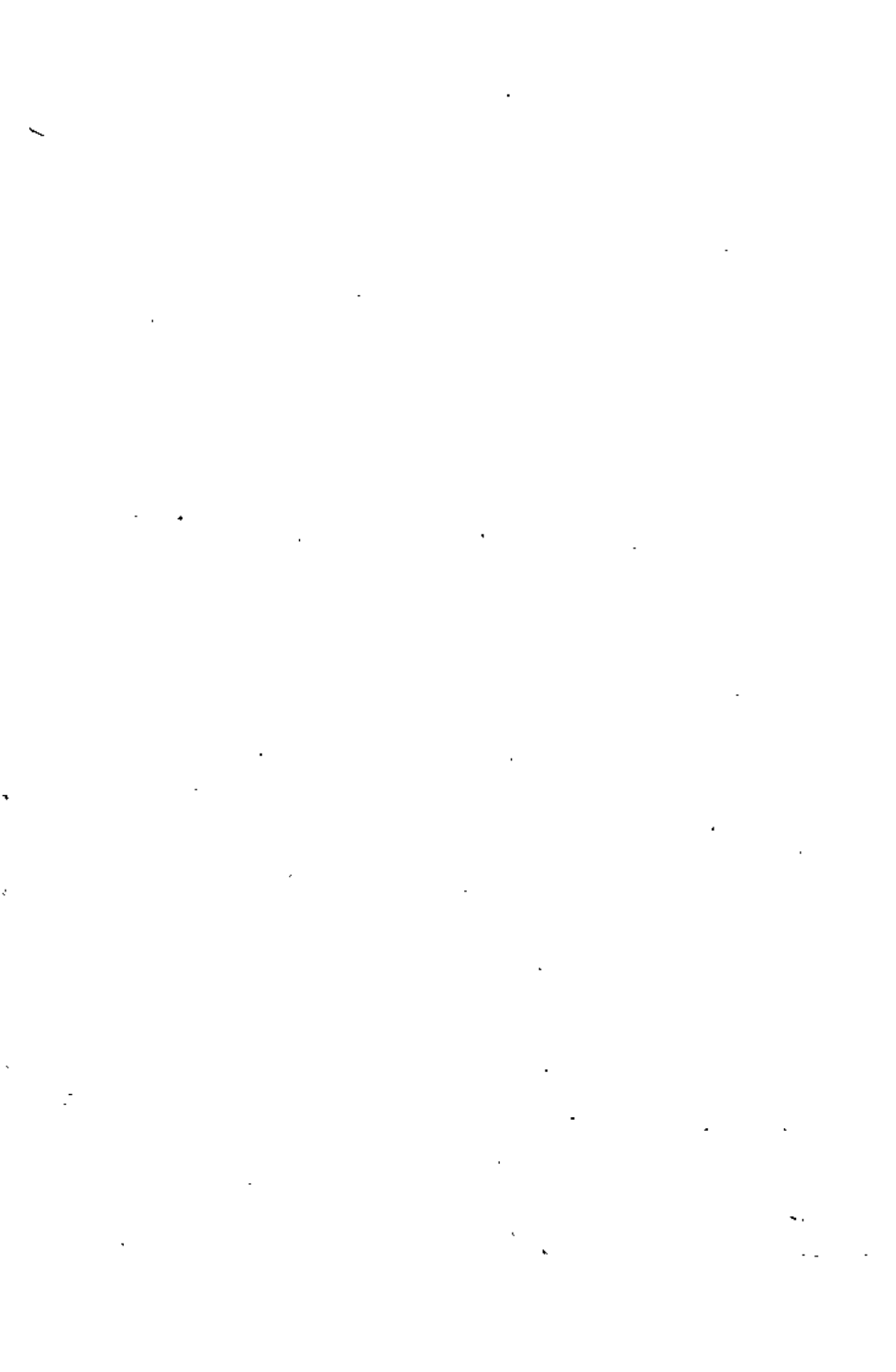
太平軍大概就是中國人腦子裏所幻想的那種現身的魔王吧。但祇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的魔王。這類魔王是停滯的社會生活之產物。

馬克思作。登於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的

『潑萊塞』報第一八六期上。並未署名。

第三篇

世界商業與對華政策



歐洲人之『發現』中國

殖民地制度助長了商業及航業底不自然的發展。"GesellschafTen Monopolia" (握有壟斷權的公司，這是劉鐵爾底說法) 曾是資本集中底强有力的槓桿。殖民地替新產生的手工工場保證了銷售市場，而獨佔這些市場就保證了加緊的積累。在歐洲以外用掠奪、奴役、屠殺土人等等辦法所獲得的財寶，流入了宗主國，在那裏變成了資本……

現在，工業上的霸權（優勢）引起商業上的霸權。反之，在真正手工工場時期，商業上的霸權保證工業上的優勢。於是殖民地制度當時就起了顯著的作用。

（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六四七頁）

美洲以及環繞非洲航路底發現，給興起着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通工具以及一般商品的增加，給予了商業、航海業和工業一種空前未有的刺激，因而也就使崩毀着的封建社會裏所產生的革命原素迅速地發展起來。（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解放社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版，四三頁）

開採美洲的金銀鑛，殺戮、奴役和活埋土人於鑛山之中，着手估額和搶掠東印度，把非洲變成狩獵黑人的圍場，——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時代之晨霞。這些掠奪過程就構成原始積累底主要原素。隨着這些過程而起的，是歐洲各民族底商業戰爭，於是全地球就成了這種商業戰爭底戰場。這個戰爭是由尼德蘭之脫離西班牙開始的，這個戰爭在英國反雅可賓派的戰爭中採取巨大的規模，而且到現在，在這樣強盜式的征伐中，如對華的鴉片戰爭等等中，還是繼續着。（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六四五頁）

因為機器日益減低了工業品底價格，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舊有手工工場制度

或舊有工業制度，各處都被破壞了。一切半野蠻的國家，過去多少是離開了歷史發展的，其工業向來是依靠於手工工場的，現在已迫不得已而走出閉關自守的狀況。這些國家已開始購買比較便宜的英國貨而使手工工場中的本國工人一定歸於滅亡。這樣一來，像印度這樣數十年來未曾有過什麼成績的國家，就處處起了革命，而且甚至中國現在也走近革命。事情已弄到這個田地，就是今天在英國發明的新機器，經過一年以後就會剝奪中國千百萬工人底飯碗。這樣一來，大工業就把世界各民族聯系了起來，把一切小規模的地方市場統一成了一個世界市場，使文明進步普及各地，並產生了一種結果，即在各文明國中所發生的現象一定要影響到其餘各國。（恩格斯著：『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四六九頁）

……資產階級社會第二次遭逢了自己的十六世紀，這是不能否認的；我希望，現在這第二個十六世紀將葬送資產階級社會，正如第一個十六世紀產生了資產階級社會一樣。資產階級社會底真正任務，就在創造世界市場，——至少是在

大體上創造世界市場，並創造以世界市場爲基礎的生產。既然地球是圓的，那末，移民於加里佛尼亞和澳大利亞以及中日門戶開放，大概是完成了這個過程。（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三六二頁）

劉華戰爭給了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國家的閉關自守已不可能；鐵道之敷設，蒸氣機和電氣之使用以及大工業之創辦，即爲着軍事防禦的目的已成爲必要的了。於是舊有的小農經濟制度也隨之而日益瓦解（在舊有的小農經濟制度中，農家自己製造必要的工業品），同時，可以安插比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陳舊的社會制度，亦隨之而崩壞。千百萬人將無事可做，將不得不移往國外；他們將打開到歐洲去的道路，他們將大批湧入歐洲。大批的中國人的競爭，無論在你們國家裏或我們國家裏，都會迅速地使事變開展起來。因此資本主義之征服中國，同時也將給予歐美資本主義之崩潰以一個推動。（恩格斯致佐爾格的信，——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日。『恩格斯信札集』，俄文版，三四六頁）

會用這種方法。替英國商業所開闢並會能引起一時興旺的最後一個新市場，就是中國。唯其如此，英國資本家才這樣堅持主張要在中國建築鐵路。但在中國建築鐵路，這就是破壞中國小農業及家庭工業底全部基礎；而且在中國，就是發展本國大工業也絲毫不會在相當程度內彌補這種害處，因此數萬萬民衆將處於完全不能生活的狀態。結果將發生空前的大批的出國僑居的現象，使被人仇恨的中國人充塞歐、美、亞各洲。這一個在勞動方面的新競爭者，將和美洲人、亞洲人及歐洲人的勞動開始競爭，競爭的基礎就是中國人關於滿意生活的認識；而大家都知道，中國人的生活程度是世界上最低的。所以，如果歐洲的整個生產制度不會在這個時機未到以前就加以改變，那末，它就須得在這個時機到來的時候着手進行這種改變。（恩格斯致達尼愛松的信，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恩格斯信札集』，俄文版，三二八頁）

『對華商業』

『東印度公司。對華商業和一八五七年的危機』

大家都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除了握有東印度的政權以外，還把茶葉貿易以及一般的對華貿易完全操縱了，此外，輸出和輸入歐洲商品之壟斷權也會集中於英國東印度公司手裏。（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八四六頁）

……在一八一三年，東印度公司已不能繼續抵抗商界底壓力了，它的對華貿易的壟斷權雖然還保留着，但對印貿易則在相當條件之下讓給私人去競爭了。

（馬克思著：『東印度公司及其歷史與結果』，一八五三年七月二十日。
『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三五九頁）

一八二九年的輸出額，尤其是對印輸出額，超過過去各年。一八三〇年，市場上商品充斥，貧困擴大，一八一一到一八三三年，停滯情況繼續存在；東印度公司被剝奪了對東亞（對印度及中國）的商業壟斷權。（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三七六頁）

一八四二年底，英國工業從一八三七年所幾乎不斷遭受的那種停滯情況，已開始和緩。在以後的兩年中，國外對於英國工業品的需求更增加了；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是商業興旺達於極點的一個時期。一八四三年，鴉片戰爭替英國商業開闢了中國市場。新開闢的市場，尤其是給了紡織業之發展（紡織業當時已處於完全興旺的狀態）以新的推動。（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一部，三六三頁）

在英國銀行倉庫中積蓄了空前巨量的存金。本國各種交易所證券的價值提

高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因此怎麼能錯過良機呢？怎麼能不趕快着手來幹呢？爲什麼不把凡能製造的各種商品輸到渴望着英國貨的各國去呢？爲什麼廠主自己不去獲得兩重利潤——由於在遠東出賣紗線和布疋而獲得的利潤以及由於在英國出賣從那裏換來的商品而獲得的利潤呢？

於是就產生了一種制度，即只預付一部分價格而將商品大批運到印度和中國去，這種制度很快就發展成爲專爲了取得預付的一部分價格而運送商品的一種制度……其結果會必然是市場上大批商品之充斥和倒閉現象之發生。（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一部，三六四頁）

至於專講到中國，那末我仔細考察了一八三六年以來的商業發展情形之後已經深信：第一，一八四四到一八四六年間英美輸出額底增長，到一八四七年已經成了純粹投機的事業，在此後的十年當中，這種輸出額平均說來幾乎沒有變動，而中國對英對美的輸出額却增長得非常厲害；第二，五大商埠底開放及香港之佔有，結果祇是使商業中心從廣州移至上海。其他的『通商口岸』不能上算。這個

市場崩壞底主要原因大概是：鴉片貿易（向中國輸出貿易之不斷增長實際上也就是鴉片貿易之增長），其次就是中國內部的經濟組織，小農業制度等等；而要劃除這小農業制，就須要很長的時間。（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三六二——三六三頁）

一八四九年紡織工業大大擴充的結果，使得在這一年的最後幾個月中，人們又企圖以商品充塞東印度市場及中國市場。可是遠東大批舊有的、未賣出的存貨，很快地限制了這個企圖。同時，由於對原料及殖民地商品的需求之增長，對這種商品也作過投機底企圖；可是，因為運到的商品驟然增長，因為回憶到一八四七年的創傷尚未復元，所以這種投機企圖很快也就中止了。

因為與荷蘭殖民地來往便利，因為在太平洋上行將開闢新航綫（關於這點我們以後還要講到）以及因為一八五一年將舉行盛大的工業展覽會，所以工業將更加興旺起來。在一八四九年，整個大陸還會幻想着革命，在這個時候英國資產階級就已宣佈（用非常冷靜態度宣佈）舉行這次展覽會。這次展覽會底意思，就是

召集英國資產階級附屬國——從法國起到中國止——去實行大考試，在這個大考場上，這些附屬國應當表明它們幹了什麼……。 (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國際概況』，——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一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八卷，二二八——二二九頁)

……但首先威脅英國底『秩序』的並不是從巴黎方面來的危險；威脅英國『秩序』的倒是這種秩序底新的、直接的結果，是英國自由樹底果實：商業危機……。

……生產縮小；各工廠幾乎一律都減少開工日子。人們曾指望從歐洲大陸上來的春季定貨，結果會使工業有暫時的活潑，可是國內市場、東印度和中國以及立凡德（地中海東岸各國底舊名稱——譯者）原來的定貨大部分被取消，同時從歐洲大陸上來的、通常會能供給兩個月工作的定貨則幾乎完全沒有……。 (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國際概況』，——一八五〇年四月十八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八卷，二一五——二一六頁)

……加里佛尼亞的金子源源流遍於美洲及太平洋底亞洲沿岸，並將頑強的野蠻民族捲入國際貿易漩渦中，捲入文明漩渦中……。

……過幾年後，我們將看到經常的航路交通，一方面往來於英國與恰格列斯、恰格列斯與舊金山之間，另一方面往來於西德尼、廣州與新嘉坡之間。由於加里佛尼亞的金子及美國人底努力不倦，太平洋兩岸將來也會入烟稠密，商業興旺，工業發展，與現時由波士頓對紐阿連斯的沿岸一帶一樣。那時太平洋所起的作用，將與現在大西洋所起的作用以及古代和中世紀時代地中海所起的作用一樣——就是成爲世界交通底大航路。（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國際概況』，——一八五〇年正月三十一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八卷，二〇九頁）

太平洋其實祇到現在才被發現它快要成爲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洋。到太平洋的通商要道，今後要經過巴拿馬地頸。開闢橫跨這個地頸的交通道路，鋪設大馬路，建築鐵道和開濬運河，現在已經成了國際貿易上最迫切的需要。

……歐洲與恰格列斯之間輪船交通底擴大，日益成爲必要，而亞洲、澳洲和美洲之間來往關係底頻繁，要求開闢從巴拿馬和舊金山到廣州、新嘉坡、西德尼、新西蘭以及太平洋上最重要的一站——山特維基島新的大航線……

……不管倒閉的公司有多少，可是輪船還將保留着，這些輪船將加倍擴大西洋上的交通，將開闢太平洋作爲交通孔道，將把澳洲、新西蘭、新嘉坡、中國與美洲聯系起來，將把環繞全球所需的時間減少到四個月。（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國際概況』，——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一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八卷，二三四及二三六頁）

在中國革命最初的一個時期我就要讀者注意一件事情，即中國革命大概將給大不列顛底社會經濟狀況以一個致命的影響。『考察家』雜誌現在傳出這樣的消息：『中國人的起義，正在產茶區域裏擴大起來，結果，倫敦市場上茶葉漲價，而上海市場上洋布跌價。』我們在利物浦布斯皮公司底週刊上讀到這樣一段話：『在上海，茶葉開市的時候，其價格超過去年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存貨所剩無

多，而新貨却到得很慢。」據最近從廣州傳來的消息說：『起義逐漸普及全國，使商業有全部消滅的危險；結果，各種布疋幾乎一律都跌了價，而且有幾種布疋，跌價跌得很厲害。存貨很多並且迅速增加着，希望在最近的將來市況能够改善，大概是不可能的。在廈門，進口貨底貿易（如果幾箱鴉片不算在內的話），現時似乎沒有。』上海各市場的情況如下：『紅茶和生絲都已暢行無阻的上市。可是賣主提出這樣的條件，以至於營業大受限制；賣主並沒有購買工廠製造品的心思，他們主要的是按極低的價格去購買鴉片，此外還去購買廣州的銀條。從廣州運出了大批的銀條，但因為存銀很快就運盡了，所以我們要從其他地方去找得銀子和糧食。如果進口市場的局面不大改善，則沒有銀子和糧食，我們就快要不能收買農產物了。在這個市場上，生意極有限制，而主要的只是拍賣沿途受損的貨物。』

曼徹斯特基布松公司十月二十一日所發表的商業報告書中，載有一個消息，說目前停滯底主要原因，『不僅是由於從中國廣大市場上現在傳出一些壞消息，

而且是由於以後還有得到這些消息的可能，這是因為那種對貨幣交易採取不信任的態度，而對於貨幣交易的不信任態度，是這個大國家中政府及其機關大概要根本變更所必然產生的結果，而且這種結果將保持很久。」（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生活昂貴』，——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一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二一九——二二〇頁）

杜菲公司（曼徹斯特地方）在某報告書中，認為十二月間英國與印度及中國的商業週轉規模極大。上而已提到過的那種貨幣充足的情形，促進了遙遠市場上的商業，並使商業參加人能夠彌補了年初的前夜他們在工業品及殖民地商品方面所受的損失。現在，各種農業的、鑛務的以及其他的新計劃都引起投機商人及資本家底注意。（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商業興旺』，——一八五三年正月四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七六頁）

至於講到中國市場，那末各種報告都一致證明，中國人現在極願出賣商品，但同時却極不願意購買商品，因為金銀都收藏起來了；在這個古怪帝國內的革命

運動尚未結束以前，就談不到這種情況能有任何的改變。（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英國銀行』，——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三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二〇四頁）

至於講到茶葉，那末大家都知道，中國革命及由中國革命所引起的商業混亂，結果產生了投機式的需求，這種需求是由於害怕將來而不是由於目前的需要所引起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英國，繁榮，工人問題』，——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二三三頁）

金子比銀子跌了價，這一點現在已經不容有什麼懷疑了。銀子的確不見了，不過我並不完全明白，它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大概在這些混亂局面之下，埋藏和收藏的銀子在中國一定很多。其次就是在最近來，商業出入對照之對於印度及中國，比對於英國、歐洲大陸及美洲（合併起來計算）一般地是要良好些。無論如何，一英鎊損失六便士，現在對於英國人已經是很高興的了。（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

二卷，一五八頁）

這一次危機發展得有些別開生面……。投機事業除了包括股票之外，還包括了各種原料和殖民地商品以及一切紡織品；這些紡織品底價格中，原料底價格起很大的作用……。在絲織業中，我們這裏從八月起就到了危機底前夜……。在過去，沒有一次危機是很快地一下子就被消滅的，而這一次的危機，既是在十年來的繁榮和投機以後發生的，自然更不能指望它會立刻消滅。同時，現在已經再沒有什麼新發現的澳洲或加里佛尼亞來作補救了，而中國呢？自己也墜入了陷穽，經過二十年後或能爬出來。可是，這第一次的打擊底力量，却表示出事情底規模何等宏大。其實，在金子大批的出產以及工業巨大的擴充以後，事情也不能不如此。（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二五二——二五五頁）

在這次危機中，生產過剩之普遍是為從來所沒有的；生產過剩對於殖民地商品以及對於穀類都是必不可免的。這倒是很好的現象，而且一定有很大的結果。

當生產過剩還只限於工業時，這還是半倒霉，可是當它也包括農業，而且包括熱帶和溫帶時，那末一切都會有宏大的規模。（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二六八頁）

……這裏（指曼徹斯特——譯者註）的事業非常順利；六星期以來，紡紗廠主出賣一磅劣等的和中等的紗線，要比近三年來最高的價格多得一便士到一又四分之一便士……。利物浦的棉商出賣棉花，甚至未能多得四分之一便士，而曼徹斯特的棉紗市價就已漲了一便士……，所有的紗廠主多有長期之內才能完成的定貨，然而需求還是很大，所以價格不致於跌落……

……這一切情形看去都非常樂觀。誰也不知道這種情形將繼續多久，如果不發生因指望印度及中國的銷路而產生的大規模的生產過剩的話。在印度，現在商業大概非常繁榮；上一次從孟買發出的郵電，載稱在兩星期以內出賣的棉織品有三十二萬疋，而最近一次的郵電，則說又出賣了十萬疋。商人們已把在曼徹斯特買得的一切貨物都預先賣出去了（這是根據從那裏來的報告而知道的），甚至把

尙未裝上輪船的貨物也事先出賣了。根據此地居民底議論及市場情況，我覺得，印度和中國將成爲最近將來的生產過剩之直接近因，如果冬天市況良好，那末，春天一定又將開始不可靠的信用交易和投機的期票交易……。〔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三五九——三六〇頁〕

從『論壇』報方面我得到了一些安慰。這個可惡的報紙，竟把我關於中國的一切論文（中英通商全史等等），作爲社論登了幾個月，甚至還收到了人家的恭維之辭。在中英條約正式條文終於發表了的時候，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其中說，現在中國人將公開准許鴉片進口並將實行徵收鴉片進口稅，歸根結底，大概也將准許在中國內地種植鴉片，因此『第二次鴉片戰爭』遲早將給英國的鴉片商業，尤其是給印度的國庫以致命的打擊。真好啊！唐納先生竟發表了這篇論文，把它當作『偶然通訊員』從倫敦寄來的通信，並且自己還寫了一篇毫無精采的社論，反駁自己的『偶然通訊員』。可是（在星期一那天），在衆議院裏，菲茨捷拉爾

和史坦里以外交部名義完全證實了我的預言。星期二那天，我以『偶然通訊員』資格又寫了一篇文章，稍微嘲笑了——當然是用溫和的論調——自己的『反駁者』。（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三七二——三七三頁）

……中國條約簽訂的結果，使目前從鴉片貿易中獲得的收入也受到威脅，而這筆收入每年却達四百萬英鎊。壟斷無論如何是要失敗的，在中國內部不久將發展鴉片底種植。從鴉片貿易中之所以獲得收入，正是因為它是一種違禁品……。（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五九年四月九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三九五頁）

對華商業，和一八五二年以前的情形比較自然是增長了，可是增長的程度，還遠不如其他各市場在發現加里佛尼亞及澳洲以後的增長情形。此外，在過去的報告書中，曾把香港和中國劃分而把香港當作英國的領地，所以歸在『中國』項下的出口額總是（從四十年代起）少於全部出口額。最後，一八五九年以後的增

長，在一八六一年又降落到過去的水平。（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六二年三月六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六一頁）

從對華貿易中是希望不到什麼的。最近商務廳底報告書證實了這一點。

一八六〇年

一八六一年

中國

二、八七二、〇四五

三、一一四、一五四

香港

二、四四五、九九一

一、七三三、九六七

總計

五、三一八、〇三六

四、八四八、一二一

這樣看來，出口總額是減少了。直接的出口是增加了，而經過香港的出口却減少了。（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六二年三月三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五八——五九頁）

棉業危機時期機器迅速的改良，曾使英國廠主們能够在美國內戰結束以後馬上很快地重新把商品充塞世界市場。一八六六年下半年，布疋就差不多已經完全不能出賣了。於是開始向中國和印度發貨，結果自然使市場更形充塞。一八六七

年初，廠主們採用自己的慣技，即減低工資百分之五。工人們起來反抗並聲明道：——這種聲明在理論上是完全正確的——唯一的補救方法，就是減少工作天數，一星期做四天工。經過長期反抗以後，自命爲工業指揮者的老爺們，曾不得不同意這個要求，同時在有些地方，工資減少了百分之五，而在有些地方工資則仍然沒有改變。（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三五七頁）

工人和廠主的關係是這樣：印度、中國、立凡德（地中海東岸各國底舊名——譯者註）以及其他地方，商品堆積得非常厲害，半年以來，粗洋布幾乎無人購買，因此，個別省區內的廠主們有減少工作天數的企圖。可是，這些企圖還不過是一些個別零星的企圖，而且經常遭到失敗。同時廠主們把此地無人購買的商品運到印度、中國等處，這樣也就是增加商品之堆積。但這也無濟於事，於是他們就向工人們提議減低工資百分之五。工人們提出反提案，要求一星期內只做四天工。廠主們底鼓動遭到失敗。最後，最近兩星期來在織布廠及爲織布廠工作的紡紗廠裏面，逐漸實行了（而在最近幾天內各處都實行了）縮減工作天數的辦法——

一星期做四天工——同時有的減低工資百分之五，有的却沒有這種減低。這樣看來，工人們在理論上是有理的，而在實際上也是有理的。（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一八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三九四——三九五頁）

這裏的工商業終究還處於極端蕭條的狀態。由於廠主們發貨的緣故，在印度及中國，商品堆積如山。司託克埠發生了兩萬人的罷工。縮減工作天數的現象普遍流行，假使這種情形不會很快的改變，那末五月間我們這裏將發生最厲害的生產過剩危機。這對於主張革新的急進運動祇有幫助。（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一八六七年三月十三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三九七頁）

這裏發生着極厲害的危機，而且這一次的危機純粹是生產過剩（雖然也是相對的生產過剩）。差不多在接連兩年當中，紡紗廠主和工廠主，將此地找不到銷路的商品自出運費運到印度及中國去，這樣一來就加倍充塞了本來就已充塞了的

市場。現在這件事情已經失敗了，因而他們就到處破產。（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四卷，一四二——一四三頁）

內部市場不斷擴充的中國，大概將要再一次地挽救——至少是暫時地挽救——紡織業。雖然許多商品已經運到那裏，可是從那裏來的報告還是樂觀得多；從那時起，這裏又發生了轉變，因而各工廠工作很忙。當然，這種情形又會使棉價騰漲，而全部利潤就會落入進口商底腰包中。可是他們在此地的工作至少是不虧本的。（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九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四卷，二六八頁）

本可以延長到半年以上的繁榮時期，已經告終。要事業有起色，——至少直接使鐵底生產，間接使其他部門有起色，——只有在中國建築鐵路（這是能做到的事）才有可能，這樣一來，以農業與手工業相互配合為基礎的最後一點閉關自守的文化就將被消滅了。但是只要半年的工夫，就能把這種可能性利用完，而過

些時候又會發生（這是有可能的）極厲害的危機，除了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底倒塌以外，新的交通工具：電報、鐵路、蘇彝士運河以及輪船之排擠航船也促進了十年一次的工業循環週底破壞。如果中國將被開放，那末，不僅是最後一個防險器會歸消失，而且移民底巨浪會從中國湧來，而這一點在全美洲、澳洲和印度底生產條件之下，就會引起革命，而且或許會驚動歐洲——要是歐洲的情形會繼續到那個時候的話。（恩格斯給伯伯爾的信，——一八八六年三月十八日。『馬克思與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一（六）卷，三三九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展底結果，使全世界的工人們受到國外競爭底影響；目前（一八七三年）由於國外競爭的緣故，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了更進一層的認識。現在的問題，已不在使英國工資降到歐洲大陸的工資水平，而在使歐洲的工資水平在不久的將來降到中國的工資水平。英國國會議員斯特卜萊登先生，在其關於將來勞動價格的演說中會向自己的選舉人指出這樣的前途。他說：『假使中國成爲一個大工業國，那我就不知道，歐洲從事工業的居民，如果不將自己降到自己

競爭人底地位，如何能够經受得住和這些競爭人底鬥爭。」（一八七三年九月三日的『泰晤士』報）（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五〇八頁）

在英國工業區域以及農業區域中，成年男女工人對於鴉片的消費日益增加。『推廣鴉片銷路……是某些積極的批發商底主要目的。藥商們承認，鴉片是一種最流行的商品』。（見亨利·久林·韓特爾博士底『報告書』，四五九頁）中鴉片毒的嬰孩，『皺皮盛額，像個小老頭子，或者灣腰曲背，像隻小猴子』。（同書第四六〇頁）印度或中國就是這樣向英國復仇的！（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三二五頁附註）

『銀子底流入及其在中國之意義』

關於金銀流入溢出的問題，必須指出下列一點：

……要把下述兩方面分別清楚：一方面是在不產金銀的區域裏面的金銀消漲，另一方面就是金銀之從金銀出產地經過其他各國的以及這種補充金銀在這些

國家間的分配……。

（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二部，五〇〇頁）

技術和交通工具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發現擁有金銀的新國家，就有重大的影響。在古代的亞洲，金子和銀子底對比曾是六與一之比或者是八與一之比，後面這種對比，在十九世紀初期的中國和日本還存在過。（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俄文版，一五二頁）

從本世紀初期起，一直到俄國、加里佛尼亞和澳大利亞的金鑛發生影響的時候為止，金銀方面的供給只够補償逐漸消耗的錢幣，只够普通對於金銀這種奢侈品的使用，只够輸出到亞洲去。

然而，從那個時候起，隨着歐美對亞貿易底增長，銀子之輸入亞洲首先就非常增加了。歐洲輸出的銀子，一大部分會由補充的金子所代替。（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二部，五〇〇頁）

在西伯利亞與中國間的商品交換上，銀子是作爲價格底標準的，雖然這種貿易實際上是交換性質的貿易。（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俄文版，八一頁）

恰克圖一帶的邊疆貿易，事實上是而且根據條約也是帶有交換性質的一種貿易，在這種貿易中銀子只是價值底標準。一八五七年到一八五八年的戰爭，會強迫中國人只賣而不買。於是銀子馬上就成了一種購買工具。俄國人爲要拘泥於條約的原文，於是把五個法郎一塊的法幣改鑄成了粗糙銀塊，充當交換工具。銀子經常是用作歐美與亞洲之間的購買工具的，而在亞洲，銀子則被收藏起來作爲寶貝。（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俄文版，一四五頁）

正是在商品流通底初期，變成貨幣的祇是剩餘的使用價值。這樣，金銀自然也就成爲剩餘或財富底社會表現。這種財寶積累底簡單形式，在下列那種民族中鞏固起來，在這種民族裏，固定的消費範圍是與那種世傳的、只爲了自身消費的生產方法相符合的。例如在亞洲人中間，尤其在印度人中間，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萬德林以爲商品價格是由該國所有的金銀量來決定的，他自己問道：爲什麼印度商品這樣便宜？答覆是：因爲印度人埋藏自己的貨幣。他說道，從一六〇二年到一七三四年止印度人埋藏了一萬萬五千萬英鎊的銀子，這些銀子起初

是從美洲運入歐洲的。從一八五六年到一八六六年止，就是說只在十年之內，英國輸至印度及中國的過去是用澳大利亞的金子換得的銀子（輸至中國的銀子一部分又運到印度去）有一萬萬二千萬英鎊。（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八五頁）

印度一個大公司底經理亞力山大，說到五十年代中葉銀子源源流入印度及中國的情形，說銀子源源流入的原因，一部分是由於中國內戰阻礙了英國棉織品在華之銷路，一部分是由於歐洲瘟疫的結果使意法絲業大大縮小。亞力山大這樣說到當時的情形：

『現在是否看到銀子流入中國或印度的現象呢？你們把銀子運到印度去，用一大部分銀子去購買鴉片，而鴉片就完全運到中國去成爲買絲的基金；所以印度的市況是如此（不管那裏有銀子底積累）：運銀子到印度比運布疋及其他英國貨，對於商人比較有利。法國銀子曾否大批溢出而使我們得到了銀子呢？當然，溢出的很厲害。我們不僅不輸入法意的絲，反而將孟加拉以及中國的絲運到那裏去。』

總之，不運商品而運銀子（亞洲底貨幣金屬）到亞洲去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這些商品在出產這些商品的國家中（英國）是漲價了，而是因為在輸入這些商品的國家中，由於這些商品進口過多的緣故而跌價了；英國把銀子運到亞洲去，雖然銀子是由英國從法國得到的，而且一部分是用金子來償付的。根據流通論講來，在這種輸入亞洲的情形之下，商品價格在英國本應當降落，而在印度及中國則本應當增漲。（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二部，四八九——四九〇頁）

金銀之溢出，大部分是對外貿易狀況變更更底一種徵兆，而這種變更本身又是一種預兆，表示一般情況又在造成危機底條件。

支付對照表也許對於亞洲有利而於歐美不利。『假使你們把印度和中國合併起來看，假使你們注意到印度與澳大利亞間的商品週轉，注意到中國與北美合衆國間更重要的商品週轉——而在這些週轉中，商業是三方面的，而且是經過我們來實行清算的，……——那末，貿易對照表的確是不僅於英國不利，而且於法國

及北美合衆國也是不利的。」（『新行程』）（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二部，五〇四頁）

金子跌價是印度及中國需要銀子的結果；現在，這種甚至極小的和暫時的跌價，在法國大規模地引起了同樣的現象，即銀子出口，金子把銀子排擠出流通範圍。在一八五五、一八五六及一八五七年當中，金子之輸入法國比金子之輸出法國超過了四千一百五十八萬英鎊，同時銀子之輸出却比銀子之輸入超過了一千四百七十萬零四千英鎊。在法國這樣的國家裏，法律規定這兩種金屬都是價值底標尺，在支付時候必須通用，而且各人都可隨意使用某種金屬作為支付工具；事實上，在這樣的國家裏，價值增漲的金屬就帶有貼水，並好像其他一切商品一樣，要用那種估價最高的金屬來衡量自己的價格，而當作價值標尺的祇是估價最高的金屬。這一方面的全部歷史經驗，祇歸結為一個原理：凡是法律規定兩種商品同時執行價值標尺底職能的地方，實行這個職能的，事實上只是這兩種商品中的一種。（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俄文版，八二——八三頁）

印度向澳大利亞及北美的輸出，是用匯票在倫敦償付的，因此就影響到期票的市價，其影響的情形和印度直接向英國輸出商品時完全相同。其次，如把印度和中國合併起來看，那末商業對照就於英國不利，因為中國經常要向印度支付大量的購買鴉片的錢，而英國則向中國實行支付，因此這樣轉了一個彎之後，財源就從英國流入印度。（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二部，五一—二頁）

關於銀子的事情，或者更確當些說，關於本位幣制的事情，是利物浦做棉花生意的一些投機商人所空想出來的。既然在印度和中國商業上的實際流通工具祇是銀子，而銀子在十年當中又從金價成一與一五點五之比降到一與一七點五之比，以至於降到一與一八之比，那末，這種情形，當然又更加劇了因棉織品加緊輸出到遠東而在棉織品市場上所引起的危機。第一，因供給日益增加，價格已經

● 這裏恩格斯是指便印度盧比高度市價穩定的計劃而言。

——編輯部註

跌落，而且對於英國的出口商，這種價格之表現為金子，現在比過去少些。思想奧妙的利物浦商人，總不能想像棉花也會跌價，因此他們曾把貨幣底差別來解釋一切，並以為什麼都很順利，以為只要這裏一有決議，說銀價應該重新等於金價底十五分之一點五，就是說英國人應容許把銀價勉強提高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五，以便棉花出口商能把這種貼水放到腰包裏去，——他們以為只要一有這樣的決議，中印商業就會興旺。這就是幾個富於發明思想的商販們的所不斷進行的欺騙。這種欺騙從來不曾有過多少重大的意義。然而近幾天來，『泰晤士』報變得這樣和氣，它竟聲明道：對於德國這樣的貧國，金幣制是不適宜的，最好是變為比較方便的銀幣制；這種聲明底用意，是想為倫敦的貨幣市場造成一個貯蓄池，以便能夠把已經跌價的銀子按高價運到那裏去。當然，這與我們的朋友俾斯麥癡想恢復雙本位幣制並在一切支付中又把泰列兒（德國幣名——譯者註）當作足價貨幣（雖然它們的實價要低百分之十五），是同樣良好的願望。然而，德國的財政家在俾斯麥朋友底保護之下已經變得這樣聰明，以致這件事情未能成功，而已

經發行的泰列兒就非常迅速地回到銀行和國庫裏去了。（恩格斯給威廉·李卜
克內西的信：——一八八〇年一月十日。『馬克思與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一
卷（六），一七一頁。）

「列強與太平革命」

我們要提起一件事情，即剛巧在全世界似乎都處在沈靜狀態的時候，中國和桌子都開始跳舞起來鼓勵大家了。（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三三頁）

……末了，還有一樁標本式的奇聞，這樁奇聞乃是一位著名的德國傳教師古士拉夫從中國帶來的。中國的人口過剩是慢慢地、但是不斷地增加着，這種人口過剩早已使地方上的社會條件成了對於國內極大多數人極其困苦的一種條件。那時就來了英國人，用武力奪得了五大商港中的自由貿易權。千百隻英國和美國的輪船開到了中國去，而在很快的時期內，中國市場上就被充滿了英國和美國的便

宜的機器製造品。以手工勞動爲基礎的中國工業，競爭不過機器工業。於是穩固的中國就遇到了社會危機。賦稅不復源源而來，國家頽於破產，大批民衆變爲赤貧，起義，大批殺戮皇帝底官吏及佛爺底和尚之舉動也開始了。國家已處於千鈞一髮之際，而受着強力革命之威脅。而且這些反正的平民中間，有些人曾指出貧富之分，曾要求根據他種原則把財產重新加以分配，曾要求而且現在還在要求完全消滅私有制。當古士拉夫先生隔了二十年之後又回到文明人和歐洲人環境中來的時候，他聽見人家講到社會主義便問道：什麼叫做社會主義。當人們向他解說了這一點的時候，他便驚喊道：『這樣說來，我就永遠不能離開這個危險的學說了！須知中國平民中間，有許多人從不久以前起正是鼓吹着這種學說！』

就讓中國的社會主義與歐洲的社會主義之相差，像中國的哲學與黑格爾的哲學之相差一樣吧。可是有一件事終究是值得我們高興的，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堅固的帝國，因受了英國資本家紡織品底影響，八年來已處於社會革新底前夜，這種社會革新對於文明無論如何應有非常重大的結果。我們歐洲的反動派，在最近

的將來勢必向亞洲逃跑，一跑到到中國的萬里長城，跑到這個最保守的堡壘底門口，那時候，安知他們在那裏不會碰到『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Republique Chinoise—Liberte, Egalite, Fraternite*）與恩格斯合著：『國際概況』，——一八五〇年正月三十一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八卷，二一〇——二一一頁）

……俄國也許可以指望西藏及中國滿清皇帝做它的同盟者，如果滿清皇帝不得不退回東三省而不做關內皇帝的話。你們都知道，中國的起義者，進行了真正的十字軍征討來反對佛教，搗毀廟宇和打死和尚。但滿洲人底宗教是佛教，而承認中國主權並為大喇嘛所在地的西藏，則在信佛教的人看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因此，如果太平王能把清朝趕出中國，那麼以後他就要和信佛教的滿洲進行宗教戰爭。既然佛教在喜馬拉亞山前後一帶都佔着統治地位，而英國人不能不援助中國的新朝代，那末俄國皇帝定會站在滿族方面，定會慫恿他們來反對英國並設法在尼泊爾激起宗教暴動。最近東方郵電告訴我們：『中國皇帝因預料到北京快要

失陷，已詔諭各省巡撫將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現時的行宮所在地熱河，該地距萬里長城東北約八十英里之遙。總之，在最近的將來，漢人與滿人之間可以發生大規模的宗教戰爭，這種宗教戰爭也將蔓延到印度。（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亞洲與俄國』，——一八五四年三月三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六六一頁）

……爲要正確估計波斯以及中國的亂事，必須把這些亂事和巴姆（即巴麥斯頓——譯者註）在這些國家裏面的初期工作比較一下，因爲這些內亂祇是過去的亂事之重演。在巴姆執政的整個時期中，第一次對華戰爭，除了增加俄國與隆的茶葉貿易以及俄國在北京的勢力以外就是繼續一百年也沒有別的結果。祇有在羅伯爾特·比爾爵士執政的時候，愛倫巴羅才使這次戰爭有了『利於英國的』轉變。（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五七年三月十八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一八二頁）

……我並不以爲現駐波斯的軍隊很快會調赴中國。條約上明明規定着，在波

斯人未從黑拉德撤退以前，現駐波斯的軍隊不從波斯撤退。巴姆是不去利用不好時機的。（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二〇四——二〇五頁）

『俄國與中國』

……現在正進到投機事業最後一個階段：俄國正在輸入資本，同時亦即輸入投機事業；俄國版圖廣闊，而每條鐵路之長度，僅達百英里，在這種情形之下，投機事業定會採取很大的規模，以至於很快就會歸於破產。而當我們一聽見要築依爾庫茨克大鐵路並有支路到北京的時候，那我們就要整裝出發了。這一次的破產將是空前的；各種因素都具備着：破產帶有緊張的性質，它帶有全世界的性質，一切有產的和統治的社會階層都參加這次破產。（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一三四頁）

……據我看來，目前的中英條約是由巴麥斯頓同彼得堡內閣協商起草的，草就的條約已送交起程赴華之額爾金爵士；這個條約從頭至尾都是凌辱中國的。

你能不能把你關於俄國人進逼中亞的材料來源告訴我？我參考這些材料，至少爲的是拿到『自由報』上去發表。（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三六三頁）

我關於中亞問題所收集的材料來源，就是新出版的布洛加索甫的『我們時代』（它是從『普魯士週報』上抄寫來的）和彼得曼主辦的『地理彙報』。這一切材料都是從俄國官場的刊物上轉載來的。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在星期二或星期三以前寫一篇關於中俄條約（對於英法是何等的恥辱啊！）的文章……。〔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三六四頁）

……俄國人又佔領了靠近高麗沿岸的一個很好的島嶼，此外他們又在爪哇實行新的佔領，因此你會看到，俄國人在太平洋北部的統治地位已有保障。英國一

切報紙如何受着巴姆的影響而親俄，這一點，最好是由英國一切報紙對於俄國在這一方面的成功之鴉雀無聲以及英國各報對於波蘭之消極態度來證明。（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六二年三月三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五九頁）

靠近高麗的一個俄國島嶼是什麼島呢？在爪哇（抑是在日本？）實行佔領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我完全不知道。（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一八六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六〇頁）

在寫給你的一封信中把日本寫成了爪哇。這些事實是我從『紐約每日論壇』上引來的，該報登載了俄國各種官場消息以及美領事底報告書；英報對於這一切消息却默不作聲……。我記地名的記憶力何等薄弱，你是知道的。因此我現在不能叫出地名來。第一個島正介乎日本西南端與高麗半島之間。該島具有一些巨大的海港，據美領事報告書所說，這些海港能夠成爲塞佛斯託堡海港第二。至於其他直接隸屬於日本的各島嶼，那末要是不記錯的話，其中有一島叫做蝦夷。

但是我要設法把這些材料拿回來……。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六二年三月六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六〇——六一頁)

假使今後俄國還是像最近十年來那樣迅速地在亞洲步步進展，一直到能够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於印度爲止，那末英國人底世界市場將歸於終局，而且這種終局還將由於北美合衆國底關稅保護政策而加速，北美合衆國，至少爲着對英復仇起見，現在大概也不會這樣輕易放棄關稅保護政策。此外，英國人驚惶不置，發現英國本國日益成爲主張自由貿易的國家，而北美洲及澳大利亞英屬各主要殖民地却日益成爲主張實行關稅保護政策的地方。英國人頌揚巴姆對亞對美『積極政策』時的那種自滿自足的愚蠢態度，將償付非常大的代價。(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六二年三月六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六一——六二頁)

俄國的先生們在不久以前——這是鮑格蓋在莫斯科的一份報上讀到的消息，——曾向高麗岸旁的一個島嶼實行射擊以作娛樂，英報對於這樁事情一字不提。

如果事情這樣繼續下去，這些先生們很快也會佔領日本。（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四卷，二四七頁）

俄國人在亞洲的事業有順利的進展。他們已經順利地開始了和喀什噶爾汗的戰爭，喀什噶爾汗過去是受中國人統轄的，而現在却已宣佈獨立了。假使俄國人能夠征服喀什噶爾汗，那末他們將近已在英國保護之下的各個國家（俾路支、喀什米爾），這些國家離英境有二百英里之遙。你當然注意萬伯里的通訊（這篇通訊是英國各報從阿格斯堡『通報』上轉載來的），說到布哈拉、阿富汗等處所發生的挑撥行動（在布哈拉地方條約規定對俄國貨徵收關稅百分之三，而對英國貨則徵收關稅百分之四十！）。自滿自足的英國人變得日益愚蠢了。（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四卷，二四八頁）

俄國人的論調稍微和緩了一些；他們將逐步施行其陰謀詭計，首先將反對英

國及亞洲——土耳其斯坦和中國。這樣看來，這一年內，戰爭危險已經沒有了。
（恩格斯致伯因施坦的信，——一八八六年八月二十日。『馬克思與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一卷，三七五頁）